當代中國史學目錄

當代中國史學

引論

從今年(民國三十四年)逆數一百年,是清代道光二十五年,即公元一八四五年。那時中國在外交上,剛締結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在國內,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正在萌芽。此後的中國,便開始遭受着狂風暴雨的襲擊,我們的國家就在這狂風暴雨之中,作猛烈的掙扎;到今年,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中國的歷史,從此又將走入一個新的階段。在這新舊交替的當兒,我們回顧過去一百年中的中國文化,不禁感慨系之:這一百年中,中國人雖不能說絕無進步,但是進步得這樣的慢。一百年前,我們對於西洋的文化,望塵莫及;一百年後,我們的文化,仍是迂緩地隨在人家的後面,與別人家比較起來,依舊相去很遠,我們眞覺得對不起我們的祖宗。

但是話說回來,這一百年之中,我們各部門的文化,也有比較進步迅速的,史學便是其中的一門,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績的一門,我們在現在——這新時代開始的時期,對於百年中最有成績的學術——史學來作一個總結算,怕不是件沒意義的事吧!

這百年來的史學,可以分作前後兩期,大致民國成立以前爲前期,民國成立以後爲後期。前期

的史學界，學者們依然走着過去的大路，繼續前此學者的工作，對歷代正史，加以補作或改作，對歷代正史的表志，更用心地加以補充或修訂，同時那時的史學界，還有三種新的趨勢，就是一、金石學的考索，二、元史和西北邊疆史地的研究，三、經今文學的復興。

金石學的考索，一方面固然是繼承宋人的餘緒，另一方面，却也是乾嘉漢學的支流，那時研究經學的人亟於獲得實證，古器物學和古文字學，就都漸漸的展開了。元史與西北邊疆史地，有着不可分的關係。元史的研究是繼承前此的成績；西北邊疆史地的研究，一方面固由於元史研究的影響，一方面又由於西北邊事的緊急，許多學人要求獲得實際的知識，以資應用；又要求獲得歷史的知識，以明彼此強弱的積因。經今文學的復興，是乾嘉漢學迷信漢人的一大反動，要求直接得到春秋戰國時的經籍的原本，並直接看到春秋戰國時的人物的面目；雖然他們所求到的，並不是眞正的原本所看到的，也並不是眞正的面目；但終比從前人前進了一步。

後期的史學，方向更多，大要言之，除繼承前期的成績，加以發展外，又多出：一、考古學和史前史的研究，二、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三、敦煌學的研究，四、小說、戲曲、俗文學的研究，五、古史的研究，六、社會史的研究。這六項當中，社會史的研究成績較少，我們將併在「史籍的撰述和史料的整理」一章中敍述，不另列一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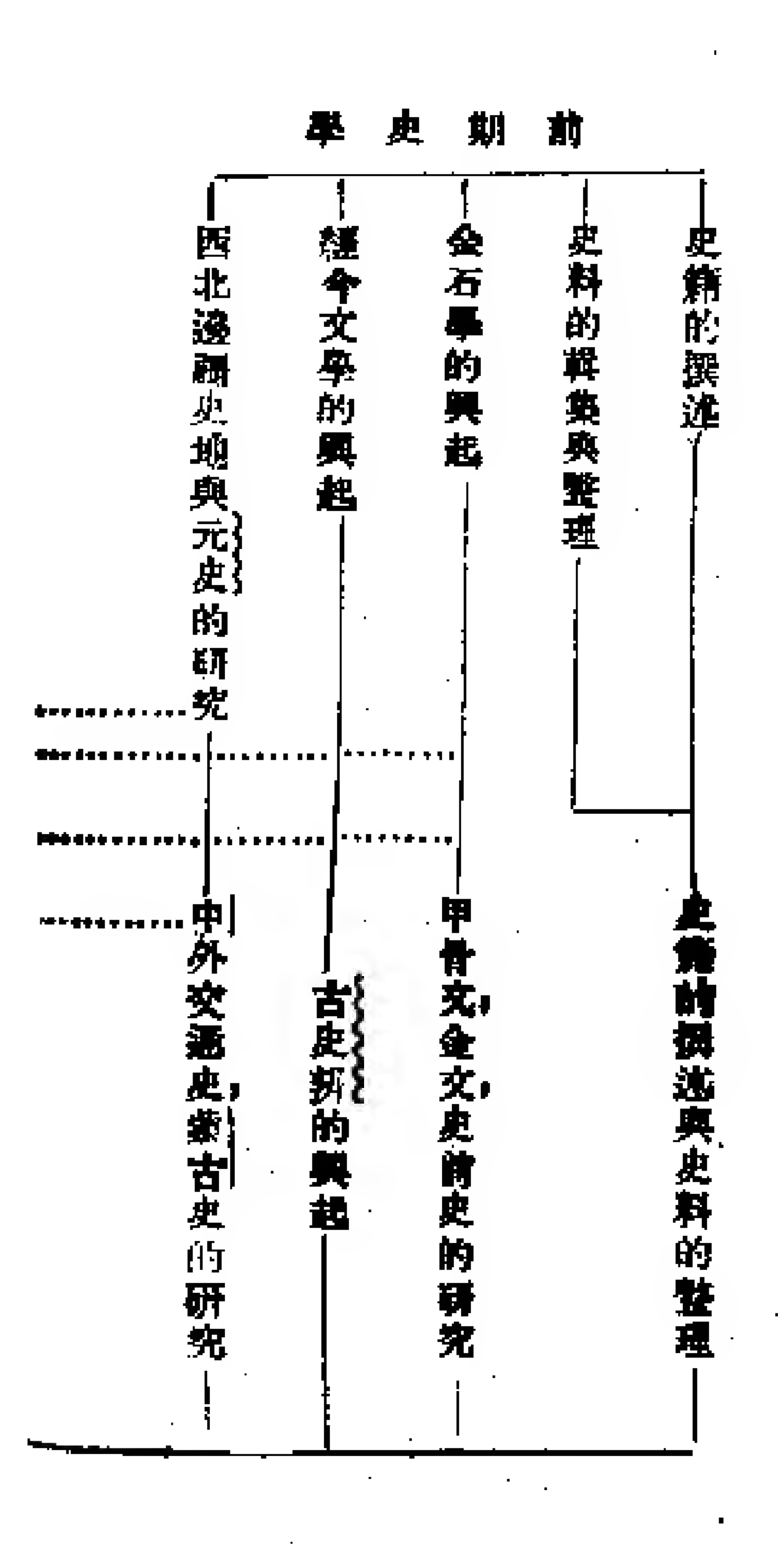
後期史學的面目，是頗爲新穎的，他所以比前期進步，是由於好幾個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的輸入。過去的乾嘉漢學，誠然已具有科學精神，但是終不免爲經學觀念所範圍，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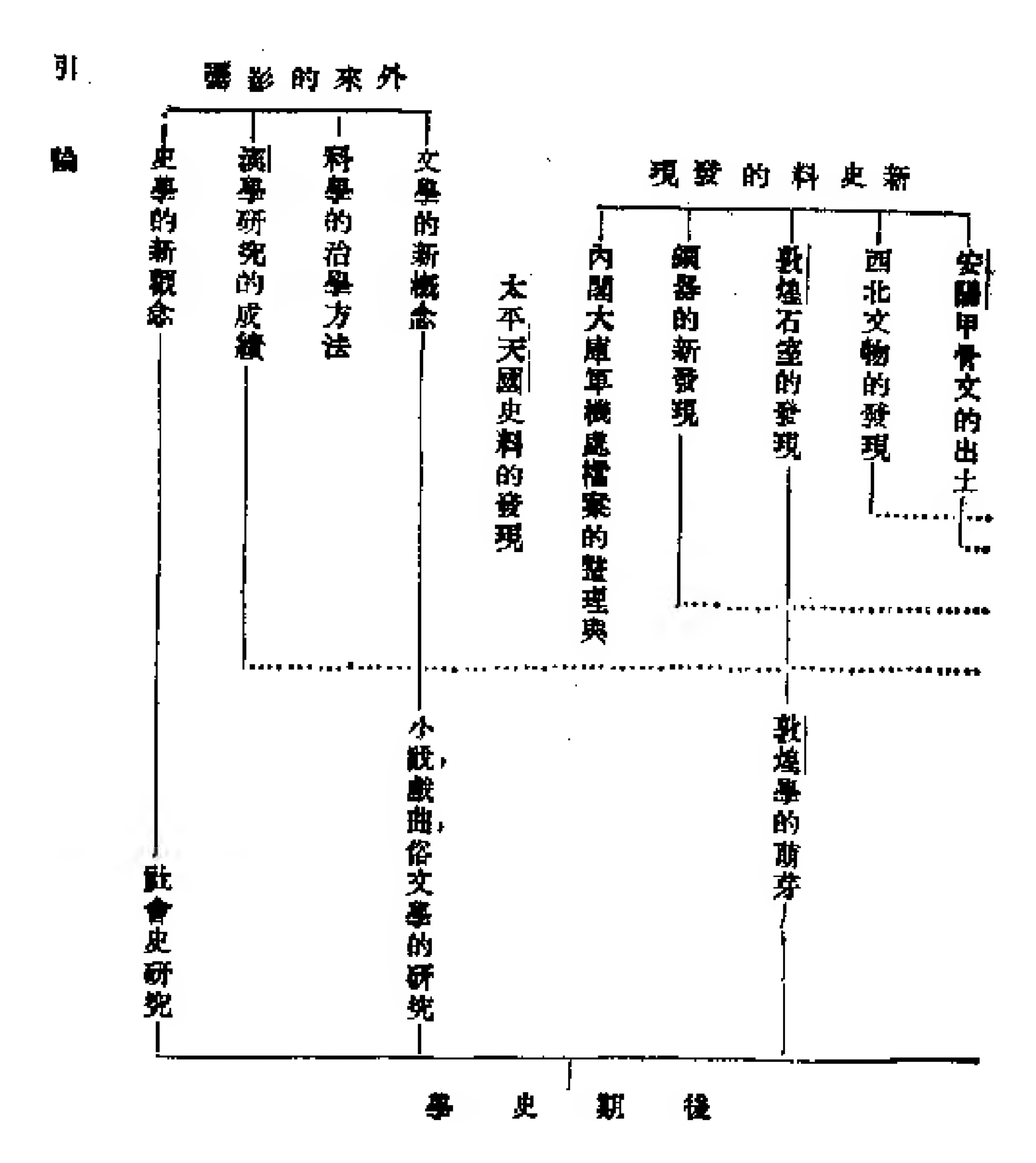
其方法還嫌傳統，不能算是嚴格的科學方法。要到五四運動以後，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輸入，於是中國才有科學的史學可言。在這方面，表現得最明顯的，是考古學上的貢獻；甲骨文和金文經過科學的識讀，再加上考古學上的其他發現，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來。此外如新的考據論文，多能揭發各時代歷史的真相，而史料的整理，也比從前要有系統得多：這都是科學方法之賜。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觀的輸入，過去人認為歷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後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觀輸入以後，人們才知道歷史是進化的，後世的文明遠過於古代，這整個改變了國人對於歷史的觀念。如古史傳說的懷疑，各種史實的新解釋，都是史觀革命的表演。還有自從所謂「唯物史觀」輸入以後，更使過去政治中心的歷史變成經濟社會中心的歷史，雖然這方面的成績還少，然也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第三是新史料的發現，在近百年中，新史料發現很多：一方面可以補充過去史籍的不備，一方面却又決定了後期史學的途徑。這批史料，主要的是各地發現的史前遺物，安陽出土的甲骨文，各地出土的古銅器，西北發現的古代文物，內閣大庫與軍機處保藏的檔案，與新出現的太平天國史料。這許多新史料，給予後期史學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第四是歐美日本漢學研究的進步。近來歐美日本學者對於漢學的研究，極有貢獻，他們的成績傳入中國，很與國內學者以刺激，使中國的史學也隨之而進步。這在中西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上，最有幫助。第五是新文學運動的興起。這是使小說、戲曲、俗文學研究興起的主要原因。

中國史學進步最迅速的時期，是五四運動以後到抗戰以前的二十年中。這短短的一個時期，

使中國的史學，由破壞的進步進展到建設的進步；由籠統的研究進展到分門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層出不窮，或由專門而發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發展到專門；其門類之多，人材之衆，都超出於其他各種學術之上。這並不是我們隨意瞎吹，大家只須去查一查近人著述和論文的目錄或索引，便可明白了。

茲為方便起見，把近世前後兩期史學的關係，列表如次：





外來的影響
史學的新觀念
漢學研究的成績
科學的治學方法
文學的新概念
新史料的發現
太平天國史料的發現
內閣大庫軍機處檔案的整理與
銅器的新發現
敦煌石室的發現
西北文物的發現
安陽甲骨文的出土
社會史研究
小說，戲曲，俗文學的研究
敦煌學的萌芽
後期史學

上編　近百年中國史學的前期

第一章　史籍的撰述

第一節　當代史的撰述

史學本來以現代爲重要,治明史的人常感覺到野史太多,而治清史的人却常感到野史太少。在近百年中,其局部紀述現代史事的,有魏源:聖武記十四卷。源觀察力極爲銳敏,組織力亦頗高,書中所述雖有失實,但在這一個時期中,却不得不算是一本很好的著作了。其自序有云:『荊楚之南有積感之民焉,生於乾隆征楚苗之前一歲,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筮仕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祕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於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迄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或涉兵事或不盡涉兵事,有得即書,未遑著述。』由此,知源對史料的搜集是頗費苦心的。

太平天國的興起和滅亡,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而記述曾國藩、李鴻章等用兵始末的,有:王闓運湘軍志十六卷。闓運曾佐曾國藩幕,然係文人,缺乏史德,對於史實往往以愛憎爲顛倒,常有故意歪曲的地方。郭崐燾嵩燾弟兄,曾經逐條簽駁,著湘軍志評議,這部書的不可信任由此可見了。但闓運文學修養極好,故其書文采斐然,稱譽的人仍然極多,且稱爲唐後良史第一。

湘軍志的曲筆既爲當時所不滿，且其書中對曾國荃的戰績完全加以抹殺，乃由國荃命王定安更爲之。定安爲曾國藩弟子，與國荃及李鴻章均熟識，對於湘軍、淮軍的戰績，耳聞目見，知道得尤爲清楚，在史料收集上，亦曾費很大的苦心。其自序中說：「及壯，佐曾文正公戎幕，從今宮太保威毅伯遊者二十餘年，湘中魁人巨公什識八九，其他偏裨建勳伐者不可勝數，東南兵事，飫聞而熟睹之久矣。其後宦遊天津，稍習淮軍將帥，而湘陰左文襄公及今陝甘總督茶陵譚公、新疆巡撫湘鄉劉公，抄錄西北戰事，累百數十卷，先後郵書見畀。最後從雲貴總督新寧劉公家，得其奏章遺稿，於是又稍知滇黔越南軼事。自咸同以來，聖主之憂勤，生靈之塗炭，將帥之功罪，廟謨之深遠，上稽方略，下採疆臣奏疏，粲然畢具；而故老之流傳，將裨幕僚之塵譚，苟得其實，必錄焉；其或傳聞異辭，疑信參半者，寧從闕疑，非眞知灼見，不敢誣也。」其書名湘軍記，凡二十卷。論斷敍述，亦頗公平。在史學上的價值，似較湘軍志爲勝。

在這個時期中，歷史著述，除上列三書外，更有：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二百卷，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三十卷。元度書雖自具別裁，然所述頗爲簡略，孔彰書亦然。

第二節　舊史的補作與改作

陳壽三國志寫作極爲謹嚴，但其以吳、蜀並列，而尊魏爲正統，在當時已經爲習鑿齒所不滿。鑿齒所撰漢晉春秋，卽以蜀繼漢；及司馬光作通鑑，用陳壽之例，以魏紀年；朱熹作綱目，則又以昭烈帝接漢統，尊習氏的說法。對三國志加以改作的，宋有蕭常的續後漢書，元有郝經的續後漢書，均以蜀爲正統。在近百年中，與蕭郝抱同樣見解而改造舊史的，有：湯承烈：季漢書九十卷。書未刊行，莫友芝

極爲稱賞，謂其對表志尤爲用力，凡七易稿乃成。三國志雖嫌簡略，裴松之的注却採摭極博，後人修改三國史事的要超過陳志裴注，當然是不可能的事。蕭、郝二人目的在正閏之爭，所注重在書法，對於史實本不十分重視。承烈的書莫友芝謂其詳核過於蕭、郝；陳壽書無表志，而承烈於此用力極勤，亦爲特識。

今本晉書，因臧榮緒舊本改撰而成，其書不盡滿人意。此期中周濟作晉略六十卷，凡本紀六，表五，列傳三十六，國傳十一，僞傳七，序目一。包世臣特爲推許，謂：『分散故籍，事歸一線，簡而有要，切而不俚，抉得失之情，原興衰之故，既惡而不沒善，獎實而不藏匿，大之創業垂統之猷，小之居官持身之術，不爲高論，不尚徵言，要歸於平情審勢，足以救敗善後，非典午之要刪，實千秋之金鑑。』魏源復評其書，謂爲『以寓平生經世之學，遐識渺慮，非徒考訂筆力過人。』濟書之價值，由此可以推知了。

五代史有薛居正、歐陽修二書。薛書極爲詳細，歐書仿春秋筆法，挂漏的地方不少。其與梅聖俞書中所說的：「聞中不曾作文字，祇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其所說的義類，如兩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罪曰「討」，天子自往曰「征」，自今視之可謂無聊。章學誠評之爲「正是三家村學究技倆。」薛、歐二書皆以都於汴京的爲骨幹，諸國皆闕略，此種見解頗不協於人心。起而正之的，有陳鱣續唐書七十卷，以後唐直接承繼唐昭宗，列莊宗、明宗、閔帝、末帝於本紀；復以南唐繼後唐，列烈祖、元宗、後主於本紀，而以梁、晉、漢、周爲世家；十國除去南唐，補入岐王李茂貞，合北漢於漢，是爲九世家，與梁、晉、漢、周共爲十三

世家;列傳唐臣稱爲臣,其他則稱諸國臣;瑣細的事情則歸於表中。凡紀七,表四,志十,世家十三,列傳三十六。書無多大長處,徒爲正統、閏位的爭論而作。而列沙陀於正統,似尤未安。此外,梁廷枏有南漢書十八卷,吳蘭修有南漢紀五卷。廷枏、蘭修均廣東人。廷枏書附有叢錄二卷,考異十八卷,南漢文字略四卷。蘭修書有地理志一卷,金石志一卷。南漢建國於粵,此二書實均由其地方觀念而作,但亦頗有精審之處。

明、清之際,流傳野史極多,但經清政府的禁燬,加以文字獄大興,留存者極少。嘉、道以後,文禁不如以往的嚴密,但時間既相隔較遠,材料的搜集頗難,故成書極少,惟徐鼒有小腆紀傳六十五卷,補遺五卷。復有小腆紀年二十卷,用綱目體,搜集史料略備。又錢綺南明書三十六卷,未刊行,傳以禮曾見之;「南明」一詞即爲綺所首創。戴望對南明史亦曾用力,欲作續明史,惜僅成傳數篇。望與傳以禮書說:「勝國南燼遺事,二十以前最所留心,喪亂以後輟而不爲。」戴氏不永其年,殊爲可惜,否則以其精博,所成就的當必有過人之處。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斷於五代,宋以後都有人續作。及畢沅續資治通鑑出,較前此各家的著作爲勝。畢書僅限宋元兩代,不及明世,蓋慮明、清交替時的敍述,有觸忌諱。及清中葉,清廷文網漸疏,續畢書而紀述明朝一代大事的,乃有陳鶴明紀六十卷,夏燮明通鑑一百卷,義例一卷,目錄五卷。陳氏所敍述僅至莊烈紀,且未畢。其一部分,及福王、唐王、桂王始末,由其孫克家續成。克家又有考異若干卷,未及刊行。燮書凡九十卷,復有前編四卷,紀述明太祖建號以前的史實;附記六卷,記弘光、隆武、永

歷三帝及魯王事：共爲一百卷；且自撰有考異，附入正文每條的下面。陳氏書雖用有雜史多種，大致本於明史與明史稿，夏書則用及永樂、正德、嘉靖等數朝實錄，較陳書略爲完備。但二書均有幽溺之點。宋李燾欲續修司馬光資治通鑑，採北宋一祖八宗一百六十多年的史實，起於太祖的建隆元年，止於欽宗靖康二年，其書極繁，所採史料亦極多，名爲續資治通鑑長編。其後楊仲良因燾書撰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燾書中經散佚，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宋字韻輯出，中間缺去徽宗、欽宗兩朝，及熙寧、紹聖間七年的史實。黃以周與秦湘業卽據仲良書以補燾書的缺佚，凡六十卷。於是長編全書可以得其梗概。

宋袁樞以司馬光通鑑每敍述一事，其事實的首尾分在數卷，檢查甚難，乃分門別類，每事記其源流，詳其首尾，成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紀事本末」的一體卽由樞所首創。李銘漢仿此體，就畢沅續通鑑加以剪裁。書未成而死，更由其子于鍇加以續作，後刊行於山東，名續資治通鑑記事本末，凡百二十卷。銘漢僻居西陲，而能以獨力爲史，其魄力見識均足令人欽佩。

第三節　舊史表志的補訂

歷代正史不一定均有表志，表志俱備的有史記，漢書，新唐書，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有志而無表的，有後漢書（范曄本未及作志而死，梁人劉昭取司馬彪續漢書的八志補足之，並自爲作注，今本「後漢書」的志卽此），晉書，宋書，南齊書，魏書，隋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稱考而不稱志）。

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北周書，南史，北史，則表、志俱無。此無表無志的七種，與有志無表的九種，其不能謂為完全自不待論。即有表有志的九種，有待補訂的地方也極多。這一部分工作，宋代人已經在開始了，如錢文子的補漢兵志一卷，熊方的補後漢書年表十卷，都是。清儒善於補苴輯校，在這一方面的表現最好，這百年中也有許多是值得稱述的。

屬於史記部分的，有劉文淇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楚漢之際，羣雄割據，疆域遷變不常，文淇能苦心鉤稽，按年月以定其疆界，正其異名，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工作。

屬於漢書部分的，有夏燮的校漢書八表八卷，蔡雲的人表考校補一卷，續校補一卷，翟雲升的校正古今人表一卷。

前此梁玉繩有人表考，極為詳博，從古籍中將每個人的史實，搜羅得相當完備，可以說是一部古代人名大辭典。雲書即是補正梁作的，但所補正的並不多。雲升的亦僅略有校正，比起玉繩的書來，眞是差得太遠了。此外劉光蕡有前漢書食貨志注二卷，楊守敬有漢書地理志補校二卷，徐松有新斠注地理志集釋十六卷（錢坫撰，徐松集釋），汪士鐸有漢志釋地略一卷，漢志志疑一卷，陳澧有漢書地理水道圖說七卷，吳承志有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補正二卷。漢書地理志為古代地理學上一篇很重要的文字，留意沿革的人莫不詳加研究。前此有吳卓信的漢書地理志補注一百零三卷，治數代於一爐，而不僅依傍一史，精博詳瞻，得未曾有。楊守敬和汪士鐸都是專門研究古代地理學的，守敬的漢書地理志補校，與士鐸的漢志釋地、漢志志疑都作得很好。徐松就錢坫的書撰為集

釋，陳澧的圖說，鉤稽本志，且參以水經酈注，其圖漢地、今地並著，均可以說是一部很好的書。其研究藝文志的，則姚振宗有漢書藝文志拾補六卷漢書藝文志條理八卷，劉光蕡有前漢書藝文志注一卷。振宗精於目錄學，所著的書很多，拾補和條理二書，均不愧名作，尤以拾補中補充漢書藝文志的書籍很多，是十分充實的作品。光蕡的書便很疏略。

屬於後漢書部分的，振宗亦有後漢藝文志四卷，曾樸有補後漢書藝文志一卷考十卷。晉范曄後漢書本無志，司馬彪八志中亦無藝文志。前此補作的，有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一卷，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四卷，顧櫰三補後漢書藝文志十卷。大昭書最疏略；侯康書亦頗淩亂，且缺集部；櫰三書本係未定稿。振宗治目錄學極精審，所補遠較前三書爲勝。曾樸書據後漢書本傳、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敍錄，凡有涉於後漢的，均爲寫出，兼及釋、道二藏，分爲七志，又與振宗書分爲四部的不同。曾樸書成於光緒二十一年，振宗書則成於光緒十五年，前於樸書六年。但據曾樸所作自序，則並未見振宗之書，二人不謀而合，均感前此補藝文志者的不備而爲之補苴，並且所成就的都很高。

屬於三國志部分的，有楊守敬三國郡縣表，附考證八卷（吳增僅撰，守敬補正。）守敬治沿革地理最篤實，成就極高。此外姚振宗有三國藝文志四卷。前此已有侯康補三國藝文志，亦四卷，而振宗書較善。

屬於晉書部分的，有錢儀吉補晉兵志一卷。正文雖然僅寥寥數千言，而分注極詳，一代制度恍然如見。文廷式有補晉書藝文志八卷，秦榮光有補晉書藝文志四卷，吳士鑑有補晉書經籍志四卷，

黃逢元有補晉書藝文志四卷。各有長處，而廷式之作較善。補表的繆荃孫有後涼百官表一卷，南涼百官表一卷，西涼百官表一卷，北涼百官表一卷，夏百官表一卷，北燕百官表一卷。蓋因萬斯同歷代史表僅有漢、趙、後趙、成、秦、後秦、燕、後燕、南燕，加以練恕西秦百官表，亦僅十國，乃採晉書載記、太平御覽、姓氏書及金石拓本以補二人所不逮，實足與前賢相抗衡。

屬於魏書部分的，有溫曰鑑魏書地形志校錄三卷。曰鑑以魏志常有譌誤，乃取兩漢、晉、宋、隋、各志，參以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輿地廣記、讀史方輿紀要諸書，更旁參以全祖望、趙一清、洪亮吉諸人的考證，證其疏誤，補其闕漏，元魏一朝的幅員乃清楚可見。實可與吳卓信的漢書地理志補注比美。此外陳毅有魏書官氏志疏證一卷。

屬於隋書部分的，有楊守敬隋書地理志考證附補遺九卷。守敬此書稿凡五易，前後歷卅年乃成，實爲隋志的功臣。姚振宗又有隋書經籍志考證五十二卷。隋書十志皆包括梁、陳、齊、周、隋、五代，經籍志以隋代官私書目所謂見存者，先錄爲長編，附以梁代之所有，但其中有見於前復見於後的，注於此復注於彼的，而注文亦多不與本文相維繫，皆以意爲比附，於撰人時代又每多離合失次，章法殊未能盡善。先於振宗而爲書的有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證十三卷，其稿未全，僅史部十三篇而已。振宗此書適可彌補其缺陷。其採輯幾於全備，凡敍一書必詳其源流根本，後自加案語，多精確無可移易。梁啓超譽爲目錄學的權威，實非過甚。此外張鵬一亦有隋書經籍志補二卷。

此外屬於南北史的，有汪士鐸南北史補志十四卷，又有南北史補志未刊稿十三卷。屬於宋史

部分的，有：王仁俊西夏藝文志一卷，附刻於其所輯西夏文綴中。屬於遼史部分的，有：繆荃孫遼藝文志一卷，附刻於其所輯遼文存中。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一卷，附刻於其所輯遼文萃中。屬於明史的，有傅以禮殘明宰輔年表一卷。

在近百年中，還有一些史學著作，雖然不是補正各史表志，但是專考某一史事，鉤稽全史，旁參他書，而使其事昭然若揭，可以與正史相表裏，在這裏也該帶便述及。此類著作有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二卷。松曾以事謫伊犂，因此對西域史事地理均極爲留心，除此書外更有西域水道記五卷，新疆賦一卷，新疆識略十二卷（代松筠撰）。此書博採他書，更證以本身的見聞，後來王先謙漢書補注西域傳部分幾乎是全採此書。松又有唐兩京城坊考五卷，唐登科記考三十一卷。松精研兩唐書，全唐文的纂錄卽出其手。此兩書除正史外更參以筆記碑銘，爲研究唐史的權威之作。勞格有唐郎官石柱題名考二十四卷，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三卷。所搜採的材料亦均很完備。

第四節　學術史的撰述

舊史中的儒林傳與藝文志，對於學術的派別源流均略有所敍述，但在正史中僅占有很小的地位。唐、宋以還，佛教昌盛，有佛祖統載、傳燈錄等書。其後儒家也漸加倣效，於是有朱熹的伊洛淵源錄等學術史專著，乃從此開其端。清初黃宗羲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及其未成書而由全祖望續成的宋元學案一百卷，規模較大。在近百年中，有唐鑑清學案小識十五卷。前此已有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及宋學淵源記，漢學記較善，宋學記則脫略殊甚。鑑書視藩書差詳，但主觀見解極深。其書分傳道、

翼道、守道三案以分別其高下，又別設經學、心學、兩案以表示排斥的意思。蓋純為爭道統而作，無足觀取。又戴望有顏氏學記十卷，專敘一學派的源流分布，對顏元學術上的成就，敘述得頗為詳明。阮元的疇人傳四十六卷，羅士琳的續疇人傳六卷，諸可寶的疇人傳三編七卷，對歷代天算學的淵源流別，加以敘述，為此期中別開生面的著作。

第五節　譜牒與方志

章學誠在其文史通義中曾經有過這樣的意思，他以為方志是一方的歷史，族譜家譜是一族一家的歷史，年譜是一個人的歷史。其中尤以年譜為最重要，因為偉大的歷史是常由一個人造成的。我們不能想像無拿破崙，無瓦特，歐洲的歷史究竟成個甚麼樣子，歐洲歷史如此，我們的歷史上亦何獨不然。故名人年譜實較地方志及族譜、家譜尤為可貴。

年譜興於宋朝，如薛執誼的六一居士年譜，洪興祖的昌黎先生年譜都是。其體例可分為三種：

第一種是譜主自撰的。此種年譜最為可貴，因其出於自道，必有為他人所不能道的，固然自道之作總有令人不盡滿意之處，然仍為一絕好的史料。此種年譜明代僅見，前此未聞，清代則特盛。在近百年中，有梁章鉅退庵自訂年譜一卷，徐鼒敝帚齋主人年譜若干卷，王先謙葵園自訂年譜三卷。徐鼒譜極誠樸有趣。先謙為晚清有名學者，所校訂編刻的書極多，此譜下半即述其編書刻書的經歷。第二種為其朋友、子弟、門生所作。此種年譜價值也很高，因為作譜的人對譜主極為接近，對其生活經歷也知道得非常清楚，其史料價值總是極為可貴。只是此類年譜，多不免阿諛溢美之辭而已。

在近百年中，也有一些是很好的，如阮長生阮尙書年譜二十四卷，蔣彤養一子年譜三卷，管慶祺、戴望陳碩甫先生年譜一卷，李瀚章、黎庶昌等曾文正公年譜十二卷。阮尙書年譜譜主阮元爲淸中葉經學和金石學的領導者，此譜爲其子所作。養一子年譜譜主李兆洛，爲有名的地理學者；陳碩甫先生年譜譜主陳奐，爲有名的經學家。曾文正公年譜譜主的文章政治盡人皆知，此三譜皆其門生所作。譜主既爲不可磨滅的人物，作譜的人又爲其子弟與門生，且或爲極有名的學者，故可說是本期的佳著。第三種爲後人補作或修改昔人所作的年譜。此種年譜作時極爲困難，因作譜者與譜主的時間相隔太遠，或雖不過遠，而與譜主並無密切的關係，由是作譜的人僅能在譜主所遺留之文字記載中，苦心的鉤稽史料，因此在著作上很難得到譜主的眞相。但淸儒在考證學上極有本領，此種年譜實能充分表現其尋取眞相的精神。在近百年中，有丁晏鄭康成年譜一卷，陳思王年譜一卷，陶靖節年譜一卷，陸宣公年譜一卷，趙之謙張蒼水年譜一卷，張穆顧亭林年譜四卷，閻潛邱年譜四卷，江標黃蕘圃年譜二卷，吳昌綬定庵先生年譜一卷，繆荃孫徐星伯年譜一卷。張蒼水年譜舊有一本題全祖望撰，之謙力辨爲僞作，其所改撰的年譜，極審。張穆二譜，以顧譜爲善，遠勝舊作。吳昌綬書初本程秉釗創稿，僅得十幾條，以授之於陳昌紳，又得若干條，又以授於昌綬，方撰成今譜。

更有其體裁極近於年譜而實非年譜的，今附於此。有魏源孔子編年一卷，孟子編年一卷，林春溥孔孟年表二卷，孫詒讓墨子年表一卷。

方志之作，古已有之，實見於隋書經籍志的，如翼幽、齊、三州圖經，常璩華陽國志陳壽益都耆舊

傳，圖稱陳留風俗傳等。雖無方志的名稱，但分地記載其風土人物，實卽等於後世的方志。自宋以後始有正式的方志出現，如咸淳臨安志、嘉泰會稽志等猶存於今。自濤以來，凡文化較高的地方，其長吏、士紳莫不以修志爲事。但今存方志，十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開局纂修，徒位置冗員，鈔撮陳案，殊不足以語於著作之林。注意方志編纂方法的，實自乾隆中葉始。李文藻的歷城、諸城兩志，全書均纂集舊文，不自著一字，以求絕對的徵信。後謝啓崐修廣西通志，首列敍例二十三則，徧徵舊作，舍短取長，說明所以因革的緣由，而認修志爲著述大業。然眞能說明方志的意義的，只有章學誠。前此之爲方志的，皆爲圖經的概念所囿，以爲僅一地之地理書而已。學誠則謂方志必立三家之學，仿正史紀傳的體例而作志，仿律令典例的體例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的體例而作文徵；三書相輔而行，缺一不可。其晚年總湖北通志局事時，卽實行其理想，分爲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北文徵三書。可惜爲人掣肘，不終其事，僅有副本一部，分流傳至今。在近百年中，方志之佳者，有阮元嘉慶浙江通志，道光廣東通志三百三十四卷卷首一卷，陶澍嘉慶安徽通志，李光洛嘉慶鳳臺縣志十二卷，及嘉慶懷遠縣志（董士錫續成，）林則徐道光湖廣通志（兪正燮爲總纂）張澍道光興文縣志，道光屛山縣志，道光大足縣志，道光瀘谿縣志，吳榮光道光南海縣志，方履籛道光河內縣志三十六卷，道光永定縣志，道光武陟縣志三十六卷，黃培芳、曾釗道光新會縣志十四卷，莫友芝、鄭珍咸豐遵義府志四十八卷，陳澧同治番禺縣志，馮桂芬同治蘇州府志一百五十卷，序圖一卷卷首三卷，陸心源同治湖州府志，歸安縣志五十二卷，黃彭年光緒畿輔通志三百卷卷首一卷，郭嵩燾、李元度光緒湖南通

志二百八十八卷，何紹基光緒安徽通志三百五十卷，補遺十卷，郭嵩燾光緒湘陰縣圖志三十四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王闓運光緒湘潭縣志十二卷，光緒衡陽縣志，光緒桂陽縣志，李慈銘光緒紹興府志光緒會稽新志，繆荃孫光緒湖北通志光緒順天府志一百三十卷附錄一卷，光緒荊州府志，光緒昌平縣志王樹枏宣統新疆圖志一百十六卷。

第六節　地理學的著述

中國地理學本爲歷史的附庸，正史中多有地理志或地形志。即使有幾種史是根本無表志的，或雖有志而無地理志的，淸代的學者在這一方面所作的工作，大致都能夠把這種缺陷彌補起來。這在前面第三節正史表志的補訂中已經加以敍述，茲從略。

淸代學者嗜古成癖，一切學問均傾向於考古的方面，故地理學亦爲歷史的地理學。除一部分關於邊徼地理的著述或遊記外，大都是關於歷史地理的著作。邊徼地理留待以後專章講述，歷史地理可分爲三類。

郡縣的建置，每代均有革易，名稱極爲紛亂，讀史的人多以爲苦。地圖亦爲讀史者所不可缺的工具，近百年中，此類著述，有李兆洛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二十卷，皇朝地理韻編二卷，歷代地理沿革圖一卷，皇朝一統輿圖一卷（共二十二幅。）地理志韻編今釋依韻編爲類書，搜羅雖僅限郡縣，然參考檢查極爲便利。地理沿革圖頗簡略，遠不如楊守敬歷代地理沿革圖的詳確，但圖用賈耽之法，以朱墨套印，開卷了然，故後之製沿革圖的均仿效之。此外楊丕復的輿地沿革表十四卷，頗便檢

閱。先於此者，有陳芳績的歷代地理沿革表四十七卷，惟前書係以地名爲經，朝代爲緯，由今以迄古，後書反是，而其功用則相同。楊守敬有歷代地理沿革總圖七十一篇（一作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守敬本爲著名地理學者，此書爲綜合其研究考證的心得而作，其繪製之精確，篇幅之宏鉅；實屬本期不可多得的佳著。

酈道元水經注是地理學的名著，淸代學者在這本書上費的力量最深，有全祖望、趙一淸、戴震三家校本。由趙一淸書中知前此治水經注的，更有錢曾、黃宗羲、孫潛、顧炎武、顧祖禹、閻若璩、黃儀、劉獻廷、胡渭、姜宸英、何焯、沈炳巽、杭世駿、齊召南諸家，此學之盛可知。在近百年中治此學的有汪士鐸著水經注提綱、水經注釋水及水經注圖二卷。前二書皆未刊行，水經注圖則係因黃儀的圖而作，儀於每水各寫一圖，士鐸圖足以補其不備。陳澧有水經注西南諸水考三卷。澧於地理學功夫本極深，此書以注記東北諸水詳而確，西南則略而譌，故補正之。考證詳博，厥功至偉。王先謙有水經注箋四十卷首卷末各一卷附錄二卷，綜集各家校本而成，檢索極便。楊守敬以畢生之力爲水經注疏，以無力全刻，乃爲水經注要刪四十卷，圖四十卷，補一卷。其書頗是朱謀瑋，而不直趙一淸與戴震，謂「此書爲酈氏原誤者十之一二，爲傳刻之誤者十之四五，爲趙戴改訂致誤者爲十之二三。」守敬卒後，書尙未完，其門人熊會貞廣續其業，成要刪補遺四十卷，注疏八十卷，亦寫成定稿。成稿之日，會貞自刎而死，其篤於師生之誼如此。聞其書已售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將謀爲之刊行。守敬實集淸代三百年來水經注研究的大成，其專心致志眞可驚也。

清代治先秦地理學的，雖不如前兩類的蓬勃，然亦頗不乏佳著，如閻若璩的四書釋地，胡渭的禹貢錐指，蔣廷錫的尙書地理今釋，都是。在近百年中，有朱右曾詩地理徵七卷，左傳地理徵二十卷。右曾治先秦古籍頗矜愼，二書考訂均極詳確。又有程恩澤國策地名考二十卷，遠較張琦戰國策釋地爲博贍。更有顧觀光的七國地理考，不但詳備，且每多論述戰國史可貴的見解。

第二章 史料的整理與輯集

第一節 當代史料的整理與結集

唐以後歷代均有實錄，每帝崩殂之後，必由繼立的人加以修撰，相沿成爲定制，亦爲國史的藍本。清修實錄，規定繕爲五分，每分各具滿蒙、文一部，大本紅綾面的兩分：一存於皇史宬，一存於奉天崇謨閣；小本紅綾面的兩分：一存於乾清宮，一存於內閣實錄庫；又有小本黃綾面的一分，亦存於內閣實錄庫，以爲講筵之用。然此諸本均藏於中祕，不是外面輕易看得見的，必須入國史館供職方能得見。蔣良騏於乾隆三十年任國史館纂修，據實錄紅本成東華錄十六卷，由天命至雍正。在近百年中整理這一項史料的，則王先謙有東華錄二百卷，續東華錄四百十九卷，朱壽朋有光緒朝東華續錄。先謙於光緒初入史館，援例釋乾隆以後各朝，爲蔣良騏書的續編，至同治末爲止，其中咸豐一朝凡六十九卷，爲潘頤福所編；又以良騏書過於簡略，復自天命至雍正，錄之加詳，成東華錄、東華續錄二書總稱十一朝東華錄。但良騏所據的爲初纂實錄，非乾隆以後改訂之本，故其書雖簡略，但所紀的事有出於先謙書以外的。朱壽朋續書範圍較廣，其時光緒實錄尚未著手纂修，乃雜錄各書及報紙而成。

我國國史，自唐代以後，例爲官修。清代在天聰初年設文館，旋改爲內三院：國史、祕書、宏文。入關

以後，改三院爲內閣，設翰林院，以國史館作爲附屬，掌修國史，其體爲本紀，傳，志，表。書終清代無成，但也有爲館臣所鈔刊而留傳的國史賢良祠王大臣傳一卷，國史文苑傳一卷，國史循吏傳一卷，滿漢大臣列傳八十卷。此等由史學上言之均無甚價值，但仍爲有價值的史料。

利用傳記的有錢儀吉的碑傳集一百六十卷，繆荃孫的碑傳續集八六十卷，及閔爾昌的碑傳集補。儀吉書所采集的除碑、版、狀、記之文外，更旁及於地志雜傳，以時間、官爵、事實排比之，所錄甚備，書成於道光間，故所采僅至嘉慶朝爲止。荃孫續書，與前書體例一樣，爾昌所補亦然。

清代政典的撰集，多出於皇室，如乾隆三十二年所撰的清通典、清通志二百卷，十二年所撰的清通考二百六十六卷是。餘如皇輿表、職官表、職貢圖、授時通考、賦役全書、大清通禮、宮史、八旗通志、盛京通志、大清一統志、六部則例等，此等亦可備參考。其包括較廣的，當爲光緒二十五年所續修的大清會典諸書：大清會典一百卷，會典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會典圖二百七十卷。

第二節　正史的補注與校訂

清代學者對於歷代正史所下的功夫很深，其有關表志補作與校訂的，已詳見本書第一章第三節，茲不贅論。在近百年中，對於整部書作校訂與補注的，漢書方面周壽昌有漢書注校補五十六卷，王先謙有漢書補注一百卷。清代學者，研習漢書最爲精審，先於此者，有錢大昭的漢書辨疑二十二卷，沈欽韓的漢書疏證三十六卷。壽昌究心班書有年，所成較錢、沈二家爲善。先謙爲壽昌門人，采錄各家的成果，勒爲一編，用力三十餘年，其書方成。對治漢書的人方便不少。

也。後漢書方面壽昌又有後漢書注補正八卷,先謙則有後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後漢書在清代研習的人亦不少。錢大昭有後漢書辨疑十一卷,續漢書辨疑九卷,沈欽韓有後漢書疏證二十卷,惠棟有後漢書補注二十四卷,棟書最爲精審。先謙於棟極爲敬服,而憾其與唐李賢注別行,無人爲之合併,集解之作即由於此。然先謙書於棟注外殊少精義,且脫漏亦頗多,遠不如其漢書補注的詳愼。集解每卷均附有其門人黃山的校補。

三國志方面,梁章鉅有三國志旁證三十卷,周壽昌有三國志注證遺四卷。二書均頗簡漏,遠不如趙一清三國志注補的精審。

晉書方面吳士鑑有晉書斠注一百三十卷。用裴松之注三國志的方法,取諸家雜記類書,以比勘其異同,所采至爲完備。書雖署名與劉承幹同撰,實不過因承幹任刊刻的費用,故列其名而已。

新唐書方面,唐景崇有志爲新唐書注,其與舊唐書有異同的,皆加以考辨,復雜取唐人故書雜記入注。成稿過半,唐氏旋歿,其事因而中斷,今所刊的僅本紀注十卷。

明史方面,王頌蔚有明史考證攟逸四十二卷,頌蔚初任軍機處行走,因就軍機處値房所藏明史考證稿,爲之刪略增補,乃成是書。考證頗爲精愼。補遺一卷,則其子季烈所作。

第三節　舊史料的輯佚

書籍經過累代的災厄,隨時都有散亡,輯佚之學即由此而興。其初本爲漢學家治經之用,後更及於史部,所成就極大。

近百年中，對於史料作大規模輯佚的，有汪文臺、湯球兩人。

汪文臺有七家後漢書輯本：即謝承後漢書八卷，薛瑩後漢書一卷，司馬彪續漢書五卷，華嶠後漢書二卷，謝沈後漢書一卷，袁山松後漢書一卷，張璠漢記一卷，失名氏後漢書一卷。湯球有漢晉春秋輯本，晉陽秋輯本，晉紀輯本，晉書輯本，三十國春秋輯本，即習鑿齒漢晉春秋三卷，杜延業晉春秋一卷，孫盛晉陽秋三卷，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卷，干寶晉紀一卷，陸機惠帝起居注一卷，曹嘉之晉紀一卷，鄧粲晉紀一卷，劉謙之晉紀一卷，臧榮緒晉書十七卷，補遺一卷，王隱晉書十一卷，虞預晉書一卷，朱鳳晉書一卷，謝靈運晉書一卷，蕭子雲晉書一卷，蕭子顯晉史草一卷，史約晉書一卷，何法盛晉中興書一卷，晉諸公別傳七卷，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武敏之三十國春秋，常璩蜀李書，和苞漢趙記，田融趙書，吳篤趙書，王度二石傳，范亨燕書，車頻秦書，王景暉南燕書，裴景仁秦記，姚和都後秦記，張諮涼記，喻歸西河記，段龜龍涼記，劉昞燉煌實錄，張詮南燕書，高閭燕志，此外更有十六國春秋纂錄十卷，校勘記一卷。十六國春秋輯補一百卷。文臺、湯球所輯均極精愼，尤以湯球所輯，內容的廣泛與詳審，實爲前此所未有。

汪文臺、湯球兩家外，更有張澍宋衷世本注五卷。世本爲司馬遷史記的藍本，漢書藝文志著錄十五卷，宋代的鄭樵、王應麟對其書尙有徵引，則其散佚當在宋、元之際。先於張澍而輯世本的很多，秦嘉謨所輯爲十五卷，似最爲豐贍，但其將史記世家、左傳杜注，國語韋注凡涉及世系的，均歸於世本，可信的程度實在很低。張澍所輯則最爲翔實。澍甘肅武威人，其所輯錄的涼土文獻亦極多，有趙

岐三輔決錄二卷，辛氏三秦記一卷，袁郊三輔舊事一卷，三輔故事一卷，劉昞十三州志一卷，劉昞敦煌實錄一卷，涼州異物志一卷，西河舊事一卷，喻歸西河記一卷，段國沙州記一卷。

澍所輯偏於雍涼，更有曾釗所輯錄的則盡屬交廣，曾釗，廣東南海人，輯有楊議郎著書一卷（即楊孚交州異物志），異物志一卷，交州記二卷，始興記一卷。嚴可均、繆荃孫所輯則偏在吳越。可均，浙江烏程人，荃孫，江蘇江陰人，可均輯有周處風土記一卷，張元之吳興山墟名一卷，山謙之吳興記一卷，沈懷遠南越志二卷。荃孫輯有張元之吳興山墟名一卷，山謙之吳興記一卷。較可均尤績密。

以上所論諸家，其輯書均以唐宋間類書爲總資料，下及六朝、唐人的史注。但初期的輯佚則僅在永樂大典。永樂大典本爲最拙劣的類書，其書以洪武韻目按字分編，其體例龐雜可笑。但古書賴以保存的，却不少。書初存於內府，後更移存於翰林院，淸代從此輯出的書很多，卽以四庫全書中所輯錄的而論，合存目計算凡三百七十五種，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其數量實至爲驚人。在近百年中，從大典所輯出的書，有徐松宋會要稿三百六十六卷。明初纂修大典時，將宋會要史事分隸各韻之下，有國朝會要、續會要、乾道會要、中興會要、光宗會要、寧宗會要、政和會要七種，亦有僅稱宋會要的。嘉慶十四年，徐松入全唐文館任提調兼總纂官，時大典已佚去一千多册，但所存的尙有十之八九。徐松簽注大典時，凡遇有宋會要，均用紙標以「全唐文」三字，所得有五六百卷。松未及整理而卒。後其稿流落於北平琉璃廠書肆，爲繆荃孫所得，後更爲廣雅書局所有，僅刊有職官一門，原稿復爲王秉恩所藏匿。民國四年，劉承幹復購自王氏。二十年，復由北平圖書館購回，由大東書局影印，書共二

百册，爲研究宋史所不可缺的重要史料。

第四節　古史史料的整理

我國的歷史發源很早，甲骨文中已經有史字，甲骨文雖然大部分是貞卜的記錄，但也有記事文字和典册的出土。例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殷墟發掘所得，曾有一塊骨版，上面沒有鑽灼的痕迹，和以後的典册一樣，仍然用「王若曰」三字開始。這一些貞卜文字，記事文字與典册全是殷代的史籍。周代人却很喜歡把他們的歷史記錄在銅器上。墨子魯問篇所說的：「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鐘鼎，傳遺後世子孫，」可爲證明。書之於竹帛的，因爲易於腐壞，故很難保存，尚書、春秋、左傳、國語、逸周書、紀年、戰國策、世本諸書，是幸而留傳着的，經過幾千年的輾轉鈔寫，有許多譌誤的地方，清代學者在這幾本書的校訂上已費了很大的功夫。屬於近百年的，有簡朝亮尚書集注述疏三十五卷，孫詒讓尚書駢枝一卷。自僞古文尚書案定讞以後，很需要一部新疏。一時興起的，有江聲、王鳴盛、段玉裁、孫星衍四家，以星衍的尙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爲最善。朝亮卽本四家之書而續爲補輯，所著不甚詳博。詒讓書在訓詁方面的貢獻很大。劉文淇有左傳舊注疏證八十卷。文淇爲學極博瞻而矜愼，其書草創四十年，長編已具，未成而卒。其子毓崧，孫壽曾，曾孫師培續作，亦未成，尚缺昭定哀三世。林春溥有戰國紀年六卷，對於戰國策曾略作研究，校正通鑑錯誤的地方不少。顧觀光有國策編年一卷，是專對國策作年代考訂的。朱右曾有逸周書集訓校釋十卷，何秋濤有逸周書王會篇箋釋，孫詒讓有周書斠補四卷。對於逸

周書有不少發明。朱右曾有汲冢紀年存眞一卷，王國維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二卷。紀年佚於兩宋之際，今本紀年兩卷乃元明人蒐輯，復雜采史記、通鑑外紀、路史諸書而成的。清代學者關於此書的考訂很多，以陳逢衡的竹書紀年集證爲最詳贍。國維所輯晚出而最謹嚴，稍涉疑似的，均不爲之闌入。較右曾及諸家書爲精審。先此雷學淇有竹書紀年義證四十卷，竹書紀年考訂六卷，辨誤一卷，考證一卷，雖然用今本紀年來疏證，却已能用羣書所引的古本來校訂，他用紀年來校訂史記戰國史部份的錯誤，已有很好的成績。

第三章 金石學的興起與研究

第一節 碑誌學的結集與研究

在清代早期的金石學著述裏，著錄的多偏於碑誌而略於鼎彝。例如毛昶的金石萃編，其書卷帙極為浩繁，有近於類書，其中十分之九皆為碑誌，鼎彝僅占很少的一部分。最大的原因，是當時的銅器多藏在宮廷，而民間所藏的一部分又多在豪紳巨賈的手中，外人不易得見，不如碑誌的任人可以椎拓與傳流。所以在乾、嘉時著錄銅器的，除政府所編印的幾種書外，很少有其他的記載。但在近百年中，這一個情形卻完全不同了，著錄銅器的書遠比著錄碑誌的為多。

著錄碑誌的著作，主要的有孫星衍、邢澍的寰宇訪碑錄十二卷，趙之謙的補寰宇訪碑錄（附失編）五卷，楊守敬的三續寰宇訪碑錄。三書均為治碑誌學的必需工具書，惜楊書未及刊行。

其次王懿榮著有漢石存目二卷，山左北朝石存目一卷。懿榮於晚清為名收藏家之一，此二書收采頗備。端方的陶齋藏石記四十四卷，係著錄其所藏歷代碑誌的，並附有考釋，其中所存史料不少。葉昌熾的語石十卷，考證既多精審，又為系統的敍述，實前之所未有。所謂碑誌學本係專指碑碣與墓誌，但其廣義即指金石學中的石，故凡磚、陶、封泥均為其附庸。在此期中，有陸心源的千甓亭塼錄六卷，續錄四卷，古塼圖釋三十卷。劉鶚的鐵雲藏陶四册，吳式芬、陳介祺的封泥考略十卷。陶與封

泥至近代始為人所注意。封泥考略所附考釋，條理精審，其中有不少可補漢書百官公卿表的闕遺。

第二節　金文的結集與研究

清高宗乾隆十四年命梁詩正纂錄內府所藏的銅器，為西清古鑑四十卷，後復纂西清續鑑甲編二十卷，乙編二十卷，寧壽鑑古十六卷。其所著錄的銅器固甚豐富，然摹刻則頗失真，在考古學上的價值不高。由於政府的提倡，流風所被，遂成為一種風氣。這時著錄銅器的，有錢坫的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四卷，陳經的求古精舍金石圖四卷諸書。

在近百年內，著錄銅器的書籍漸多，最著的便是阮元的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阮元所藏銅器極富，所著錄的除拓片而外，更有由他書摹入的。其書大部出朱為弼手，所附考釋亦多精義，以彼時經學正在極盛時代，故能援經以說古器也。此外如曹載奎的懷米山房吉金圖二冊，張廷濟的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十冊，劉喜海的清愛堂家藏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不分卷)，長安獲古編二卷，吳雲的兩罍軒彝器圖釋十二卷，二百蘭亭齋收藏金石記四冊，吳榮光的筠清館金文五卷，都是名著。諸人皆富於收藏，所著錄的銅器極多，間亦有考證。

光緒間的銅器收藏者，以潘祖蔭、陳介祺二人為最多，盂鼎與毛公鼎即為二人所藏。介祺對銅器真偽的鑑別力極精，間有考釋，亦頗精審。祖蔭有攀古樓彝器款識二冊，介祺有簠齋吉金錄八卷(為鄧實所輯)，簠齋金石文考釋一卷，陳簠齋尺牘。

前此諸書所錄，或為其一家的收藏，或雖彙收別家，而分量均極少，且所錄間有偽器。其所錄極

豐，鑑別亦精，使學人得此一編而可不煩外求的，有吳式芬的攈古錄金文三卷九册，方濬益的綴遺齋彝器考釋三十卷。

這等書都是史料的結集。所附的考釋雖間有對典章制度或名物訓詁有所考訂，但不可信的居多。其最大的收穫，當在對銅器眞僞的鑑別。

所謂金文係以鐘鼎禮樂器為主，但鉩印、鏡鑑、泉布亦可附入。在近百年中，著錄鉩印的，有：陳介祺的十鐘山房印舉十二册。介祺藏印極多，此書著錄之富，可謂空前，實為鉩印的一大結集。著錄鏡鑑的，有：梁廷枏的藤花亭鏡譜八卷，陳介祺的簠齋藏鏡二卷。著錄泉布的，有李佐賢的古泉匯十六卷，李佐賢、鮑康的續泉匯四卷。

第三節　吳大澂與孫詒讓

近百年內，早期金文的研究，在文字與歷史考證上收穫最大的，是吳大澂與孫詒讓二人。從此以後，金文的研究方慢慢地走上科學的途徑。尤其是在文字研究上的收穫，說文古籀補與名原兩部書，眞可以算是劃時代的作品。

大澂對於銅器的結集貢獻不小，在研究上也有很大的成就。當時他的勢位甚尊，故有力搜集大量之銅器，其書有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二册，愙齋集古錄十二卷，十六金符齋印存二十六册。其中尤以愙齋集古錄所輯為最豐，與吳式芬的攈古錄，方濬益的綴遺齋彝器款識二書，有同等的價值。其所著書有說文古籀補十四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字說一卷，權衡度量實驗考一卷等。說

文古籀補係據銅器文字以補說文的缺遺，其中訂正許慎的地方眞不少，從此說文解字在文字學上的權威才開始動搖。大澂爲書極爲矜愼，其後補其書的有丁佛言的說文古籀補補，強運開的說文古籀三補，但其體例取材及斷論均遠不如大澂書。字說中篇篇有新義，爲其研究金文之心得。大澂生平所藏古玉甚多，既考證而品第之成爲古玉圖考一書，後又以考工記等所記玉人桃人的尺度相爲比勘，成權衡度量實驗考，他所定的「周鎭圭尺」、「周黃鐘律琯尺」、「周劍尺」，當然不能算得眞正的周尺，但這種嘗試的精神是値得敬佩的。

詒讓爲晚淸最有成績的學者，所研究的範圍極爲廣博，其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固不僅金文一端，如周禮正義、墨子閒詁諸書，均爲不刊的名著，且是第一個作甲骨文研究的人。這裏所要敍述的，僅在金文這一方面，他所著的便有古籀拾遺三卷，古籀餘論二卷，籀廎述林十卷。古籀拾遺是補正薛尙功鐘鼎彝器款識，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及吳榮光筠淸館金文三書的，古籀餘論則係補正吳式芬的攈古錄金文的。二書均極精審。其論文如毛公鼎釋文、籀文車字說諸篇，不論在金文本身研究或古史研究上，都有很高的價値。詒讓更著有名原二卷，共七篇，是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契文舉例三書的例略，其意蓋在探求文字制作的本源，及其演變的痕迹。此書所根據的材料大部分是以金文爲主，也間有用及甲骨文的地方。但其時著錄甲骨文的書籍，僅有「鐵雲藏龜」一種，不過一千多片，且印本多模糊不淸，故此書雖用有甲骨文的材料，實在極少，而大部仍然是以金文爲主的。

這期中金石學的研究，一方面還不免帶着骨董的氣息，一方面是文字學的一支流，那時金石學家所注意的只是銘文，他們的著作，除圖錄外，也只是些文字學上的研究，對於史學上的貢獻並不很大。吳大澂的權衡度量實驗考，算是一部史學上的著作，只因所用的方法並不準確，所以他的結論依然是不足爲據的。

第四章　元史與西北地理的研究

第一節　元史史料的整理與元史的改作

元史的修成，時間不及一年，不惟在內容上可議的地方太多，即當時有許多史料亦爲館臣所未及見。早期的元史研究者，在這一方面用的功力最深，其貢獻最大的應爲李文田，有元祕史注十五卷，耶律楚材西遊錄注一卷。元祕史爲元代的祕密國史，錢大昕最稱道其書，以爲「論次太祖、太宗兩朝事迹者，必於此書折其衷。」文田的注，繁徵博引，將書中所敍述的地理、年代、史實，就其所搜集的史料，詳加比證，徵引書籍達六七十種。西遊錄係耶律楚材自述其奉太祖之詔出塞，隨軍西征，所見一切山川、疆域、人民、風俗的狀況。惟今本經盛如梓刪節，僅存數百言。文田的注亦極博贍。文田又有元史地名考一卷，和林金石錄一卷，詩一卷，考一卷。和林金石錄一書係就和林故地的碑碣文字以考證史實，所錄不盡爲元代物，但却以元代物爲多。聖武親征錄與元祕史同出一源，而編次內容有小異。其書譯者不知姓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著錄的爲兩淮鹽政採進本。其後錢大昕、徐松、翁方綱、張穆均有傳鈔本，張穆以其書授何秋濤。書傳寫譌誤，脫字失句極多，幾不可卒讀，秋濤取而細校，逐字逐句爲之是正，成聖武親征錄校正一卷，其自序有云：「箋注姓名，移置甲乙，疏論異同，排比先後，寒暑屢易，繕錄乃成。」秋濤對此書的辛勤可知。秋濤復有朔方備乘八十卷，多言西北地理，

其中有關於元史者，如遼金元北徼諸國傳，元代北徼諸王傳，元代北方疆域考都是，均頗爲精審。

丁謙於此所考索者亦多，有元祕史地理考證十五卷，附元祕史作者人名考等，西遊記地理考證一卷，劉郁西使記地理考證一卷，張耀卿紀行地理考證一卷，元經世大典圖地理考證三卷，元史外夷傳地理考證一卷，元耶律楚材西遊錄地理考證一卷，元聖武親征錄地理考證一卷。丁謙所著地理考證的書極多，有蓬萊軒輿地叢書前編、續編（即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二集）。西遊記爲李志常所編，記邱處機見元太祖途中所見聞，於西域山川道路記敍甚詳。西使記中統四年所作，記西征一切道里、疆域、山川、風景的狀況。張耀卿名德輝，曾於定宗二年召見，次年乃成紀行一卷，所記的均爲道路所經及途中的見聞。經世大典元虞集所編，惟全書已亡，僅永樂大典中有其圖存。丁謙考證多而不甚精，間引外國著述，亦多非學術上的著作。蒙古源流爲蒙人撒囊撒辰台吉自述其種族的著作，可與元祕史、聖武親征錄對照而比較其異同。此書乾隆九年方譯爲漢文。沈曾植究心元代史事有年，用力甚勤，蒙古源流箋證八卷，爲其未成之作，由張爾田先生加以校補。聖武親征錄校注一書，則係與李文田合作。

元史的蕪漏，當時身與史館的即已經知道，如宋右有元史補遺十二卷，其書今已散佚。至清代錢大昕始欲對元史全部加以改作，成元史稿一百卷，而未刊行。清末日人島田翰至江、浙訪書，還曾見到其手稿二十八册，已缺前二十五卷。今刊行的僅有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藝文志四卷而已。繼大昕之後而改作元史的，有魏源，著有元史新編九十五卷。源修海國圖志時，知元代西北三藩所達

的地域很遠，乃發憤改作元史，其書亦未完成，至光緒末年始有刊本，凡本紀十四卷，列傳四十二卷，表七卷，志三十二卷。其進呈表中有云「採四庫全書中元代各家著述百餘種，並旁搜元祕史、元典章、元文類各書，參訂舊史，成元史本紀、列傳、表、志凡如干卷。」其用力雖甚勤，然所得則極有限。源書中復引有外國史料頗多，但如馬禮遜外國史略、瑪吉思地理備考，均無史料的價值，因其雖知海外有新史料甚多，却尚無搜求的門徑。曾廉湖南邵陽人，與魏源同里，其元書一百零二卷，全以元史新編為藍本，所增加的史料無幾，蓋無可取。

第二節　洪鈞及其「元史譯文證補」

元史史料的整理與元史的改作，自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出，又起了一個新的變局。這一個變局是劃時代的，自此國內治元史的人，方知道怎樣利用海外的史料。元史譯文證補凡三十卷，所用的史料，遠及於波斯、阿拉伯、俄羅斯、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土爾其諸國。為之搜集與翻譯的，有使館館員及洋文參贊金楷利(Kreyer)等，因洪氏於其時出任德、俄、奧、荷公使，故有此便利也。其所引用的海外書籍，見於卷首的引用西域書目中，火者拉施特兒哀丁蒙古全史，阿拉哀丁阿塔蔑里克志費尼書二卷，瓦薩甫書五卷，阿黎意聚史六卷，阿卜而嘎錫突厥族譜，俄羅斯人戴美桑法譯本，多桑土爾其史，蒙古史，貝勒津譯拉施特書太祖本紀、蒙古部族考等三卷。其譯證補傳多用多桑書，記拔都西伐則本於華而甫書，駙馬帖木爾補傳則本於東羅馬書，察合台後王補傳則雜采西人所譯的西域人著述，太祖本紀及蒙古部族考則本於貝勒津所譯的拉施特書。

洪氏書的成就所以如是其大，除由其個人用力之勤及天才外，其所遭遇的時代亦為一重要的因素。茲將洪氏以前歐洲對於蒙古史的研究作一簡略的敍述，以見其所遇機會之好。

十九世紀初年俄人施密德(I. J. Schmidt)在外蒙傳教，得蒙文的蒙古源流，乃譯為德文，一八二九年刊行於聖彼德堡。時多桑書已出第一冊，故施密德曾採用其書的中西回教材料作注。多桑(D'Hosson)通阿拉伯、土爾其語，利用回教與中文材料，成蒙古史(Histoire des Mongoles)一書，以一八二五年刊行於阿姆斯特丹，一八三四年至一八三五年再版，一八五二年三版。其再版時大加增補，更參考施密德所譯的蒙古源流，其所用的中文材料多為當時教士的翻譯，所用回教史料有火者拉施特兒哀丁(Khoja Rashid Eddin)的蒙古全史，阿拉哀丁阿塔蔑里克志費尼(Alai Eddin Atta Mulk Juveni)的世界征服者史，瓦薩甫(Abdullah Vassaf ul Hazret)的伊爾汗史記諸書。至於發憤翻譯波斯文重要蒙古史料的，有俄人貝勒津(Berezin)，渠於一八六一年根據波斯文拉施特蒙古全史譯出部族志，一八六八年譯出成吉思汗傳前半部，一八八八年譯出後半部。其他則有華爾甫(Wolff)著蒙古史(History of the Mongols)，哈木爾(Von Hammer-Purgstall)著欽察汗史(Geschichte der Goldenen Hordein Kiptschack)，哀忒蠻(Prof. Erdmann)著不動搖的鐵木眞(Temudschin der unersch-utterliche)等。洪氏於一八八九年出使，上述諸種有關蒙古史的著作均已出版，乃恣意搜取，故乃有此劃時代的著作出現，使四十年來研究元史的人始終跳不出洪氏的圈子。

第三節　西北地理的研究與撰述

道光中葉以後，地理研究起了一個很重大的變局。前此的地理研究爲古代的，偏重於地理的沿革部分，這在本書上編第一章第六節已經有詳細的敍述，茲不贅論。在近百年來則爲實用的，偏重於近代邊疆部分。這雖然和前期的沿革地理研究有淵源的關係，但却自成一種史潮，且此種史潮與元史研究，其關係相當密切，如李文田的元秘史注，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其中關於地名的考訂，均應屬於此種研究的一部，故西北地理與元史的研究是互爲表裏，各有其不可分的地方。此等著述亦應說到徐松，松以嘉慶十七年謫戍伊犂，在戍中撰成西域水道記五卷，校補一卷，新疆賦二卷二書，又新疆識略十二卷（代松筠作），則係補祁韻士的西陲總統事略而作。此外張穆有蒙古遊牧記十六卷，以內外蒙古各旗爲單位，用史志體，而自爲作注，考證古今山川、輿地的沿革，源流分明，爲蒙古地理有系統的著作。自來研究蒙古史的人，多注意於成吉思汗的武功與政略，至於元亡之後，其部落竄歸沙漠，以至成爲今日的蒙古，其中史事的演變，幾乎沒有人注意。張穆的書獨對此點加以詳盡的敍述。其書經何秋濤爲之校訂，益臻完備。秋濤的朔方備乘八十卷，初名北徼彙編，其書言蒙古事最詳，而尤注重於中國與俄羅斯的關係，如北徼界碑考，俄羅斯學考，烏孫部族考，俄羅斯進呈書籍記，尼布楚城考，俄羅斯互市始末諸篇，均極精審，且所采書籍至爲完備。

第四節　域外史地史料的整理與撰述

由於元史與西北地理的研究，遂逐漸發展而及於域外史地，今日之中外交通史一學即由此

啓其端緒。惟在本期中，雖有此一門學問，其成就則極小。其書可數的有沈曾植的島夷志略廣證一卷。島夷志略係元人汪大淵撰述南海的風物地理頗詳，曾植此書考訂亦尙明審。丁謙於前史四夷傳地理皆有考證，此外又有穆天子傳地理考證六卷，後魏宋雲西行求經記地理考證一卷，唐釋辨機大唐西域記地理考證一卷，圖理琛異域錄地理考證一卷。謙所著書總名蓬萊軒輿地叢書前編續編，編入浙江圖書館叢書一集、二集。其書包羅極廣，但所考證附會的地方太多。

吳承志有唐賈耽記邊州入四夷道里考實五卷。耽所記見新唐書地理志，所記水道、陸路均極詳細，爲研究中外交通史最重要的史料。承志所考亦有精到的地方。

魏源的海國圖志一百卷。不盡言地理，更有夷情備采、戰艦、火器條例等，爲當時致用之作。但述史事及考證頗有錯誤。徐繼畬瀛環志略十卷，鑒於源書多加辨正。繼畬書本於美國人雅裨理的著作，復隨時對西方人士有所接談爲之筆錄。其書今日視之固屬幼稚，但在當時使一般人眼光擴大，亦自有其歷史的價值。

黃遵憲日本國志四十卷。遵憲在晚清出使日本，搜集彼國材料，成此一書，將日本的政情、風俗、歷史統敍無餘，亦爲近百年史學上的一大著述。

第五章　經今文學的興起與貢獻

第一節　經今文學與辨僞學

經今文學運動的興起，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這雖然在表面上應該是經學的問題，但在骨子裏，對於史學實有很密切的關係。治史學的人所憑藉的是史料，有史料然後方有歷史，而經則大部分爲古代的史料。治史學的人對於史料的眞僞應該是最先着手審查的，要是不經過這番工作，對於史料毫不加以審查而即應用，則其所著雖下筆萬言，而一究內容，全屬憑虛御空，那就失掉了存在的資格。中國的僞書僞史極多，唐以後開始有了雕版，得書方便，學者自易比較研究，所以自宋以來辨僞的學問尤其發達，重要著作，如王柏的詩疑，鄭樵的詩辨妄，胡應麟的四部正譌，閻若璩的尙書古文疏證，姚際恆的古今僞書考等都是。即在清代官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裏，也有不少辨僞的議論。但他們主要的工作是辨僞史、僞子、僞集，很少有辨僞經的。鄭樵的詩辨妄僅是在攻毛傳衞序鄭箋，王柏雖頗能揭發詩經的本來面目，其主要的目的卻在衞道，這些都不是對經的本身有所考辨。姚際恆書中有一點辨僞經的地方，但不很多，也不很精。最偉大的要算是閻若璩了，古文尙書二十五篇的眞僞問題，從宋代的吳棫以來一直辨論，不能決定，他用了一生的精力，研究了許多問題，才正確宣告了它的死刑。過去的學術界一向被宗經的觀念所支配，認爲經中所敍

述的盡是眞正的史料，可以用之而不疑，這一種錯誤的看法，自閻若璩的工作成功以後方才改過來，於是繼之而有經今文學運動興起。

經今文學運動的出發點是公羊傳，這是因其時十三經中僅何休的公羊解詁爲今文家言。復與今文學的大師爲莊存與，他著有春秋正辭一書，多講微言大義。至其門人劉逢祿、宋翔鳳出，今文學方正式成立。翔鳳著過庭錄一書，極喜附會，但也很有創見。逢祿有春秋公羊傳何氏釋例十卷，公羊何氏解詁箋一卷，左氏春秋考證二卷，以左氏春秋考證爲最精，他發現春秋左氏傳的原本不是編年的，它的體裁近乎國語，後來給人增竄書法凡例，按年排比才成爲今本的左傳。這是改變天氣的一個霹靂，劉宋二人之外，接近經今文學的人，尚有龔自珍魏源與邵懿辰等，自珍有左氏抉疣一卷，是書今佚，其己亥雜事詩第五十七首有云「其劉歆竄益左氏顯然有迹者，爲左氏決疣一卷」自珍本爲劉逢祿門人，是此書當係繼左氏春秋考證而作的。

魏源有詩古微十九卷，書古微十卷。詩古微主旨謂毛傳及大小序均爲僞書。書古微則係認定古文尚書及孔傳爲僞作，且論及馬融、鄭玄所說的古文尚書亦非孔安國的眞傳。

邵懿辰著禮經通論一卷，這書謂儀禮十七篇並非殘本，所謂古文逸禮三十九篇則全屬劉歆所僞作。

第二節　廖平與康有爲

經今文學運動至康有爲出，遂呈一極大的進步。他不僅疑及僞經，且疑及在古代經籍上所表

現的史實；其託古改制一說實爲千古不易的定論。有爲所著有僞經考十四卷，孔子改制考二十卷。僞經考中的最大發明，在論秦焚六經未嘗亡缺，河間獻王及魯共王無得古文經的事實，而斷定古文經爲劉歆所僞造。有爲對諸問題的考證，雖間有武斷或粗心的地方，然體大思精，其結論終無可移易。孔子改制考一書則以爲先秦諸子均喜託古改制，六經是孔子所作，以爲宣傳的書籍，堯舜時代爲孔子所託的理想社會。

有爲的書在當時影響很大，其學術價值也很高，但其學則出於廖平。廖平僞經考及孔子改制考二書的議論，已由廖氏粗引其緒，不過由有爲加以敷衍發皇而已。平所著有今古學考二卷，古學考一卷。自許愼作五經異義以後，直至廖平才第二回作今古文的分析，而成今古學考一書。他後來所作的古學考中有知聖闢劉兩篇，是爲孔子改制考及僞經考的藍本。他首先發現了孔子的託古改制，所以孔子說的三年之喪，他的弟子和時人都來問難。這是給有爲一個極大的提示。只因廖平爲學不甚謹嚴，文筆又不足以達意，所以這個風氣要待康有爲來開倡。

繼康有爲而起的有崔適，他著有史記探源八卷，春秋復始二十卷，以及五經釋要等書。史記中有被劉歆增竄的部分，在僞經考第二史記經說足證僞經考的後面已粗引其端緒，崔氏承此風氣，所作史記探源謂史記本爲今文學，其古文經說部分爲劉歆所竄入，加以搜檢，幾無餘蘊（雖然他所認爲劉歆竄亂的部分未必完全可靠。）春秋復始專尊公羊，斥去左傳，並發見穀梁亦爲古文，幷從刪落。他希望得到春秋經的原始解釋，進而看看眞孔子。

晚清經今文學家的著作和學說，最近學者中如錢穆、楊寬諸先生都提出種種的反證，加以猛烈的排擊，認為「有新聞紙的氣息」「只是宣傳而不是學術」（錢說見其所著劉向歆父子年譜，楊說見所著中國上古史導論，均收古史辨中，）其言誠有是處。然經今文學派的長處，本在破壞偽經和偽古史，其積極的建設部分，能成立之說本少，我們似不必深究他們真正的用意，是否在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我們只問他們的說法有沒有道着古書和古史真相的處所，如果有的話，則他們的著作和學說便有了學術上的價值。破壞與建設本是一事的兩面，他們既揭發了偽經和偽古史一部分的真相，便能引人去認識真經和真古史，至於他們所說的真經和真古史，是不是比原來的偽經和偽古史可信些，我們現在暫時可以不問。

中編 新史料的發現和研究

第一章 甲骨文字的發現與著錄

第一節 私人的收藏與集錄

殷墟的甲骨卜辭，是近四十多年來新發見的古物。第一個收藏甲骨文字的人，是王懿榮，前後所得約在一千四五百片左右。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事變」起，王氏殉難，其所藏的甲骨文字，大部分售於劉鐵雲，一小部分贈於天津新學書院。就其故物而爲之編集的，有唐蘭先生的天壤閣甲骨文存二册，此書爲唐先生由王氏次子及輔仁大學所藏拓本中所選錄出來的，均爲王氏故物，共一〇八片。

與王懿榮同時搜羅甲骨文的有王襄，其所藏編爲簠室殷契徵文十二卷。此書與考釋合爲四册，共收甲骨文字一一二五片，印刷不精，且多本爲一片而剪爲兩片的，甲骨文的研究者最初對此書極爲懷疑。

王懿榮死後，其甲骨文字大部分均售與劉鐵雲。其後劉氏更續有所得，約五千片左右，編爲鐵雲藏龜六册（共一〇五八片）。劉氏於宣統二年流新疆死，其所藏的甲骨文字一部分歸於羅振

玉，編爲鐵雲藏龜之餘一册，所收共四十片。一部分歸於上海商人哈同，由王國維編爲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一册，所收共六五五片，由姬佛陀署名而實爲王氏所編。一部分歸於葉玉森，編爲鐵雲藏龜拾遺一册，所收共二四〇片。一部分歸於商承祚先生及其友人，已編入殷契佚存中。一部分歸於吳振平，由李旦丘編爲鐵雲藏龜零拾一册，所收共九三片。一部分歸於柳詒徵先生，復歸國立中央大學，由李孝定先生編爲中央大學史學系所藏甲骨文字一册，更收入胡厚宣先生所編的甲骨六錄中；惟李先生書爲摹錄，胡先生書爲影印而已，所收共二五〇片。又一部分歸於陳中凡先生，董作賓先生已編入其甲骨文外編中，尚未印，胡厚宣先生復編爲清暉山館所藏甲骨文字，書爲甲骨六錄的一種。

黃心甫與徐枋先後於甲骨亦有所得。黃氏之物，已由其子編入鄴中片羽中。徐氏所藏，後售與燕京大學，由容庚，瞿潤緡二先生編爲殷契卜辭三册，所收共八七四片。

羅振玉於光緒二十八年在劉鐵雲家中，始見到甲骨文字，除後得劉氏所藏的一部分外，更大量收集，遂成爲收藏甲骨文字最多的一人，編爲殷契書契前編八卷殷虛書契後編二卷殷虛書契續編六卷殷虛書契菁華一卷。其所著錄約七八千片，除續編爲他人所藏外，餘均羅氏一己之物。此四書中菁華所印爲照片，其餘都爲拓片，用玻璃版精印。在初期對於甲骨文字的搜羅與流傳，當以羅氏的貢獻爲最大。

其後王襄及霍保祿均有所得。王氏所獲，已編入其簠室殷契徵文中。霍氏之物，則捐贈於國立

北京大學，由唐蘭先生編爲北京大學所藏甲骨刻辭，所收共四六三片，今尚未印。

羅氏而外，劉體智所藏甲骨文字亦極豐，其數量與羅藏等，由郭沫若先生編爲殷契粹編五冊，所收共一五九五片，僅爲其藏物的一小部分；其未著錄的尚在二萬片左右。

其他尚有商承祚的殷契佚存二冊，郭沫若的卜辭通纂別錄一何氏藏骨，孫海波的誠齋殷虛文字一冊，李旦丘的殷契摭遺一冊，胡厚宣的廈門大學藏甲骨文字（見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華西大學所藏，甲骨文字，束天民氏所藏甲骨文字，曾和寶氏所藏甲骨文字（俱見甲骨六錄）此諸書所錄亦在數千片以上。

第二節　中央研究院與河南博物館的殷虛發掘

中央研究院的殷虛發掘，共十五次，茲將其每一次所得甲骨文的數目及時間作一簡略的敍述：

第一次在民國十七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日，其間共二十八日，獲甲骨文字七八四片。

第二次在民國十八年三月七日至五月十日，其間共兩月零三日，獲甲骨文字六八四片。

第三次分爲二期，第一期在民國十八年十月七日至二十一日，第二期由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二日，獲甲骨文字三〇一二片，中有大龜四版，復得獸頭刻辭二。

第四次爲民國二十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十二日，其間共三月，獲甲骨文字七八二片及獸頭刻辭一。

第五次在同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二月十九日，共一月又十二日，獲甲骨文字三八一片。

第六次在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其間共兩月，獲甲骨文字一片。

第七次在同年十月二十四日至十二月二十日共一月又二十六日，獲甲骨文字二十九片。

第八次在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廿五日，共兩月又五日獲甲骨文字二五七片。

第九次在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九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其間共兩月又二十二日。於小屯獲甲骨文字四四一片於侯家莊獲大龜七版，甲骨文字四十二片。

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三次均無甲骨文字發現。

第十三次在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八日至六月二十四日，其間共三月又七日，獲甲骨文字一七八〇四片。

第十四次在同年九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其間共三月又十二日，獲甲骨文字二片。

第十五次在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九日，其間共三月又四日，獲甲骨文字五九九片。

此十五次發掘所得的甲骨文字，其第一次之物由董作賓先生摹錄爲新獲卜辭寫本刊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中，共三八一片；郭沫若先生又選錄二二片，爲卜辭通纂別錄一。第三次所得的大龜四版及獸頭刻辭，均已由董作賓先生發表於其所著的大龜四版考釋及獲白麟解中，刊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及第二期，又均著錄於郭沫若先生的「卜辭通纂」內。第四次所獲的獸頭刻辭，見董作賓先生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刊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又見於郭沫若先

生的卜辭通纂。第九次所得的大龜七版及侯家莊所得的甲骨文字，均著錄於董作賓先生的安陽侯家莊出土之甲骨文字中，刊田野考古報告第一集。此第一次至第九次所得，除見於上列諸書暨論文外，更由董作賓先生編爲殷虛文字甲編，所收共三九四二片，九次所發掘的菁英，均已在其中了。十三次至十五次所得，更由董先生編爲殷虛文字乙編，這件工作現在尚正在進行。

在中央研究院作殷虛發掘的時候，河南博物館亦曾作殷虛發掘，前後共二次，所得甲骨文字凡三六五六片。

第一次在民國十八年十月，其間凡經兩月。第二次在民國十九年二月二十日至三月九日，又四月十二日至月底，其間凡一月又十一日。所得由關伯益先生編爲殷虛文字存眞一至八集共八册，凡選錄八百片；又由孫海波先生編爲甲骨文錄二册，凡選錄九三〇片。

第三節　外人的收藏與集錄

外人收藏甲骨文字的，以美人方法斂(Frank Herring Chalfant)與英人庫壽齡(couling)爲最早，前者爲長老會駐濰縣的宣教士，後者爲浸禮會駐青州的宣教士。二人所購甲骨文字甚多，均先後讓與歐、美博物院。方氏對於甲骨文字的摹寫頗精，所用的是鋼筆，因此很能表現出契刻的意味。其手摹的甲骨文字凡四二三頁，現已出版的共二二九頁，是方氏自己選定而認爲是最可信的；此二二九頁已先後印爲三部書，在中國及美國出版：

(一)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The Couling-Chalfant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

所收凡一六八七片，共一三二頁，原物分存四處：

(1)C·S蘇格蘭皇家博物院（愛丁堡），由方氏出讓。

(2)C·C美國卡內基博物院（畢茲堡），由庫氏出讓。

(3)C·B大英博物院（倫敦），由方氏出讓。

(4)C·F支加哥田野博物院（美國），由方氏出讓。

(二)甲骨卜辭七集(Seven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所收共五二七片，凡三二頁，原物分藏七處：

(1)S·V·T天津新學書院，本爲王懿榮舊藏，由其子翰甫所贈。

(2)S·V·SM上海皇家亞細亞學會博物院，由方氏出讓。

(3)S·V·B柏根氏(Paul Bergen)，由方氏出讓。

(4)S·V·P普仁斯頓大學（美國），由方氏出讓。

(5)S·V·W衛理賢（德國）。

(6)S·V·S臨淄孫氏。

(7)S·V·R皇家亞細亞學會。

(三)金璋所藏甲骨卜辭(The Hopkins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所收共四四八片，凡六十六頁。

方氏所摹錄的甲骨文中，間有僞片，如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卽有郭沫若先生和胡光煒先生的辨僞表證明其中僞刻極多。

加拿大人明義士(James Mellon Menjies)爲長老會駐安陽的牧師，亦得有甲骨文字很多，編有殷虛卜辭(Oracle Records from the waste of yin)一册，所收共二三六九片，僅爲其所藏的一小部分，其未著錄的當在一萬片左右。

美人福開森(Ferguson, J. C.)曾得劉鐵雲所藏甲骨文字的一部分，由商承祚先生編爲福氏藏甲骨文字，所收共三七片。又柏根所藏，已由方法斂編入「甲骨卜辭七集」中，後其物由柏根氏贈與濟南廣智院。明義士復編爲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Bergen Collection of Inscribed Oracle Bone)刊齊大季刊六七期。白瑞華(Roswell S. Britton)爲美國現在研究甲骨文字最有成績的一人，編有殷虛甲骨拓片(yin Bone Rubbings)一册，殷虛甲骨像片(yin Bone Photographs)一册，前者所收共二二片，後者一〇四片。

日人林泰輔藏有甲骨文字六百片，復彙商周遺文會、權古齋、聽水閣、繼述堂諸家所藏，編爲龜甲獸骨文字二卷，所收共一〇二三片。郭沫若先生卜辭通纂別錄二爲日本所藏甲骨擇尤，所收共八七片。金祖同先生更編有殷契遺珠二卷，所收係日本河井荃廬、中村不折、堂野前種松、中島蠔叟、田中叔堂、三井源右衛門等六家所藏的甲骨文字，共一四五九片，其中一部分已經著錄於郭沫若先生書中，河井荃廬的一部亦已著錄於林泰輔的龜甲獸骨文字。

第二章 銅器羣的發現與考釋

第一節 新鄭與渾源銅器羣的發現與考釋

民國十二年八月廿五日,河南新鄭縣有個叫李銳的,在園中掘井,得大鼎一,中鼎二,以八百餘金售於許昌張慶麟,繼復從事發掘。事爲當地駐軍知悉,乃劃定區域,大事開掘,計所挖的井穴,深至三丈有餘,幅員至十餘丈,所得共百餘器,今存河南博物館。這年冬便有蔣鴻元先生的新鄭出土古器圖志初續附三編出版,這書頗有錯誤之處,又縮影器形較小,圖版未佳。十八年冬關百益先生編有新鄭古器圖錄二册,後復編爲鄭冢古器圖考四册,前者係用照像玻璃版印,後者則係摹繪。二十六年更由孫海波先生編爲新鄭彝器一册。圖版較蔣關二先生的書爲精,且另有花紋拓出,於研究上頗便利。新鄭銅器羣爲春秋時鄭國的遺物,惟百餘器中有銘文的僅二器,一半鼎,一方器,而半鼎銘文模糊,僅有數字可辨。一方器有銘文七字,王國維釋爲「王子嬰次之口盧」。嬰次,爲楚公子嬰齊,即令尹子重,關百益釋爲「王子類次之庶盤」,認藏器之地爲鄭厲公墓,郭沫若則認嬰次爲鄭子嬰齊,近人都從郭說。

民國十二年,法國美術商人王涅克(L. Wannieck)於山西渾源發現大批銅器,器薄而帶輕快味,銘文很少,和春秋以前的銅器不同,均爲其全購而去。著錄此批銅器的,有商承祚先生的渾源

彝器圖一册。王氏得到此批銅器後，採用當地土人的說法，認爲係秦始皇巡狩所遺，於是在歐美遂流行一種「秦式」的說法，認爲這些銅器受着斯基泰(Scythia)文化的影響。近來我國學者如郭沫若劉節先生和日本梅原末治都對這說曾作強烈的反駁，其實西洋人的所謂「秦式」，應稱「戰國式」。梅原末治曾由中國古鏡和斯基泰系小鏡作比較而否認這些銅器曾受斯基泰影響，劉節先生更從銅器形制和紋樣的變遷源流來否認外來影響的說法。

第二節　洛陽銅器羣的發現與考釋

洛陽城東面有金村，徧地均爲古墓。民國十八年秋迄十九年冬，發現韓君墓，今洛陽城東，舊土城東北角，有大墓八，其中有六個已爲人盜掘。及民國廿三年，其餘兩個亦皆被盜，出土的遺物共五六百件，見懷履光(Bishop W. White)主教的洛陽故都古墓考(Tombs of Old Loyang)書中所收，均爲韓器，間亦有漢代器物雜入其中，因爲同遭發掘的，尚有漢代的墓葬。其中最著名的爲驫羌鐘，其十二藏盧江劉氏，餘則爲懷氏所得，今藏加拿大多倫多博物院。懷主教的韓君墓發見略記，有向達譯文刊北平圖書館館刊七卷一期。我國徐中舒先生有驫氏編鐘圖釋一册。此外郭沫若先生有驫羌鐘銘考釋(見金文叢考)，驫羌鐘銘追記二則(同前)，驫羌鐘補遺論及所謂秦銅器(見古代銘刻彙考續編)，唐蘭先生有驫羌鐘考釋(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六卷一期)，劉節先生有驫氏編鐘考，吳其昌先生有驫羌鐘補考(均見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六期)，溫廷敬先生有驫羌鐘銘釋(見中山大學研究所史學專刊一卷一期)。劉吳唐徐四先生都認這爲周靈王時

器，郭先生認爲周安王時器，溫先生認爲周威烈王時器，國外有高本漢的驫羌鐘之年代一文（劉叔揚譯，刊考古社刊第四期），也認周靈王之說爲是。我們由其銘文有「入長城」和水經注所引紀年晉烈公十二年事相合，以及出土地點，同出土物等看來，分明是戰國時代周威烈王時的韓器。

日人梅源末治有洛陽金村古墓聚英所收錄的亦爲此銅器羣的一部。

第三節　壽縣銅器羣的發現與考釋

壽縣銅器羣的發現，共有兩次，第一次在民國十一年二月，爲瑞典工程師加爾白克（Karlbeck）所得較大的鼎壺盤等件，現存瑞京東亞蒐集部，著有中國古銅鏡雜記，刊中國科學美術雜誌四卷一期（譯文見考古社刊）。第二次爲民國廿二年七月五日發見於朱家集的李三孤堆，由土人發掘，深五六丈寬二丈，發見木槨銅器有鼎重至七百餘斤，重要的銅器約在七、八百件以上，均爲淮楚之器，今存安徽省立圖書館。其餘藏在其他學術機關及私人的，尚屬不少（劉氏善齋有「曾姬無卹壺」二，勺二，北平圖書館金石部也購得九件，天津寶楚齋有鼎、匜、豆、勺等件，上海朱氏也藏有一鼎。）編集的書，有孫壯先生的寶楚齋藏器圖釋，商承祚先生的十二家吉金圖錄中，亦著錄有寶楚齋所藏的楚器，更有劉節先生的楚器圖釋一册。胡光煒先生有壽春新出土楚王鼎考釋，刊國風半月刊四卷三期，四卷六期。唐蘭先生有壽縣所出銅器考略，刊北京大學國學季刊四卷一期。徐中舒先生有壽縣出土楚銅器補釋，刊大公報圖書副刊三十一期（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郭沫若先生有壽縣所出楚器之年代，刊古代銘刻彙考續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派李景聃先生

前往壽縣調查，李先生有壽縣楚墓調查報告，刊田野考古報告第一册。上海市博物館等會組壽縣史蹟考查團，擬正式從事發掘，曾派鄭師許商承祚先生等前往考查。

壽縣出土諸器中有楚王「酓肯」「酓忎」諸名，「酓」即「熊」字，自來無異說。熊忎，胡光煒郭沫若諸先生均認爲卽楚幽王熊悍，可無疑問。熊肯之「肯」，天津某公壽縣王松齋先生釋爲賁；謂楚文王，馬衡唐蘭兩先生謂卽楚考烈王熊元，「元」「肯」乃聲之轉，郭沫若先生認卽楚幽王熊悍，「肯」「悍」乃聲之轉，徐中舒先生認卽楚哀王熊猶，「猶」之偏旁「酉」，古文作「首」與「肯」字形近，胡光煒、劉節兩先生認卽楚王負芻，胡先生認爲「肯」當釋「朏」，卽史記之楚王負芻，越絕書之楚王成，「朏」「成」乃聲之轉，劉先生又認「肯」當釋「𦚏」，「負芻」是「酓𦚏」字形之誤。由我們看來，熊忎旣卽幽王熊悍，楚文王與此未免年代相去過遠，考烈王徙都壽春時決不會帶走這些重器；哀王立國僅二月餘，被襲殺，怎能鑄這許多銅器？負芻在位五年，在這五年中外則有秦侵犯，內則兄弟爭立，結果爲秦虜去，那裏會有銅器入葬？如果說「熊肯」卽是「熊忎」，爲同一王所作之器，前後異名，也說不過去，因此「熊肯」卽考烈王的說法比較可信。大概李三孤堆是楚幽王的墓，同時還入葬了考烈王的許多銅器，這是比較近情的。

第四節　安陽銅器羣的發現與著錄

安陽有銅器發現，在宋代卽已如此，凡宋代著錄銅器書中所謂出於「鄴之亶甲城」及「洹濱」的，均爲安陽所出。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殷虛發掘以來，所得銅器極多，有二尺大

的方鼎以及各種銅容器銅兵器，而盜掘的事情亦常有發生，所得均由古董商人傳之於北平，其中以黃氏尊古齋所獲爲最多，編爲鄴中片羽二集共四册，所錄僅一器非商物。其他如羅振玉的貞松堂集古遺文，殷虛古器物圖錄，容庚先生的頌齋吉金錄及續錄，于省吾先生的雙劍誃吉金圖錄及雙劍誃古兵器圖錄，劉體智先生的小校經閣金文拓本及善齋彝器圖錄，商承祚先生的十二家吉金圖錄諸書，凡注明爲安陽出土的，亦均爲其地所出的商代物。此外日本梅原末治著有河南安陽與金村的古墓，刊史學雜誌四十七篇九號，傳河南出土的二個尊彝，刊國華第四十六編一號，河南安陽發見的遺物，刊東方學報京都第七册，傳說安陽出土的二大銅器羣曾被盜賣到日本，一爲侯家莊出土，一爲大司空村出土，其中有三大盉高至二尺四寸左右，一尊高至一尺二寸八分，一斝高至一尺六八分，都是少見的大器。

先是羅振玉輯殷文存，王辰先生輯續殷文存，均以簡單圖形及有以干支爲名的認爲商器。此說爲郭沫若先生所反對，因爲在周代中葉尚有以干支爲名的。但是從前把商代當作新石器時代及金石併用時代的，今由此大批安陽銅器羣的發現，更加以中央研究院的科學發掘，可以證明其說不確。商代不僅是銅器時代，而且已經到了銅器時代的最高峯。

第五節　濬縣銅器羣的發現著錄及其他

河南濬縣曾有大批銅器發現，由孫海波先生編爲濬縣銅器一册。其後中央研究院於民國廿三年曾整理其殘址，又續得銅器若干，見郭寶鈞先生的濬縣新村古殘墓之清理，刊田野考古報告

第一集。

山東滕縣亦有銅器羣的發現。又中央研究院在河南輝縣及汲縣亦有所得。北平研究院在陝西門雞台亦曾作大規模的發掘，惟現在均尙無報告發表。

第三章 考古學的發掘和古器物學的研究

第一節 史前遺址的發現和研究

我國史前遺址的發掘，以北平周口店的遺址爲最早。民國十年至二十年間，澳人師丹斯基(Dr. O. Zdunsky)與楊鍾健先生，裴文中先生，在北平西南房山縣屬的周口店先後發現猿人的牙齒及頭骨等化石。學者初稱之爲北京種中國猿人，確定名爲震旦人，年代約在四五十萬年前，較爪哇與英國所發見的尤爲近古，在周口店主要堆積的上洞，也有眞人遺骸的發現，是晚期舊石器時代的遺址，有石器骨器和有孔石卵有孔牙齒及貝殼等的發現，見裴文中先生的中國猿人化石之發現(科學十四卷八期)，周口店洞穴層採掘記，舊石器時代之藝術，及楊鍾健先生的中國猿人與人類進化問題(科學十五卷九期)中國猿人的新研究(地質論評一卷一期。)

舊石器時代的遺物，係法人德日進(Pére Teilhard de Chardin)與桑志華(Pére Hicent)在陝甘河套發現有穿孔用的尖銳器物，刮磨器物以及食餘的驢犀象土狼羚羊的骨和駝鳥卵等，與歐洲的舊石器時代遺物相同。發現地層在黃土下層與相當的沙層及黃土底部礫層中。詳見二人所合著的華北舊石器工業(On The Discovery of A Paleolithio Industry in Northern China)。

新石器時代的遺物，自十九世紀以還，各地皆有零星的發現，至於大量採集，則有瑞典人安特

生(J. F. Andersson)。民國八年，北平地質調查所技師朱庭祜先生在遼寧、熱河採集石器多種。次年，劉長山先生復在河南得石器數百件。安特生時任北洋政府的農商部顧問，繼往考查，略有所獲，更在奉天沙鍋屯河南仰韶村及甘肅洮沙諸地得遺物極多，以仰韶所得的為最豐富，故稱之為「仰韶期」。所得有彩色陶器，故亦稱彩陶文化。安特生編有中國遠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奉天錦西縣沙鍋屯石穴遺址(The Cave Deposit At Sha Kuo T'un in Fongtien)、甘肅考古記(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aserrch in Kansa)。

民國十五年，李濟先生，袁復禮先生考古山西，發現夏縣西陰村遺址，見李先生所著的西陰村史前的遺存。除了所得石器獸骨陶片貝殼之外，又得了一個殘繭。

民國十九年、二十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山東歷城縣城子崖發掘二次，發見黑陶文化，稱為龍山期，見李濟先生與金鼎先生等所編的城子崖。

鋤頭考古學的發掘，於文化層的發現一點，最於史學的研究有利。李濟著小屯與仰韶(安陽發掘報告第二册)，根據安諸及雞子窩兩處陶器的發現，判別彩陶的時代在前，刻紋在後，等到中央研究院的發掘在後岡發現了三疊層的陶器文化，更明顯了。後岡上層為白陶文化層，中層為黑陶文化層，下層為彩陶文化層，可知彩陶最先，黑陶次之，白陶又次之。白陶和小屯殷墟文化相似，黑陶與龍山(城子崖)文化相似，彩陶則與仰韶文化相似。後來在侯家莊高井臺子也有類似積累的文化層發現，只是上層不是白陶而是灰陶。後岡的黑陶是輪製的，而高井臺子的黑陶是在轉輪

盤上模製」吳金鼎有高井臺子三種陶業概論，刊田野考古報告第一冊。後來濬縣大賚店和洹淇流域曾普遍發現相類的遺址，這在史前史的研究上是一條光明的線索。梁思永先生著有小屯龍山與仰韶，來探討這三種陶器文化的流布和影響，可知殷墟高度文化的產生，不是偶然的了。

至於殷墟的發掘和銅器羣的出土，已另詳「甲骨文字和金文的研究」一章中。

第二節　日人的考古學侵略

自從日俄戰後，日人得到旅順大連，對遼東各地作種種調查，考古發掘也是其調查事業之一，其大規模的發掘，主要的有貔子窩、牧羊城、南山裏、營城子、何家溝等地。

日人自在大連的濱町，旅順的大台山，和貔子窩附近發現貝塚，得到了石器彩陶器，便開始計劃貔子窩的發掘。民國十七年四月，日人的東亞考古學會和關東廳博物館便開始正式發掘，經兩星期而終了，發掘所得保藏於京都帝國大學考古學教室，報告書名貔子窩，在十一月刊行。這次的發掘所得，除石器時代的石器骨器陶器外，還有銅鏃、弩機、鐵器、鐵片、明刀、布泉等，可以考見周末漢初遼東的文化情態。牧羊城的發掘在同年十月，經二十五日終了，至民國二十一年編印牧羊城一書，這次發掘所得的古物，除石器時代的遺物以外，也還有銅器鐵器和周末漢初的古錢以及漢瓦當等，正同貔子窩一樣，可知那地在周末漢初時，土人正從石器時代進入金石器并用時代，而由中國內地移住的居民已挾有銅鐵器時代的高度文化。南山裏的發掘在民國十八年十月，曾掘得漢代的磚墓，到民國二十二年編印南山裏一書，除得銅器五銖錢少許外，大多是瓦器，這和朝鮮樂浪

所發掘的漢墓，同是研究漢墓和漢代文化的資料。營城子，最初在民國元年二年經日人濱田耕作八木奘三郎發掘了二個漢墓得陶器漆器等物（報告見東洋學報二卷三號及三卷一號）。民國二十年日本關東廳偶然在營城子發現磚墓，便從事發掘，繼續又發掘了另一古墓，編印成營城子一書。這次發掘所得彩色磚、瓦器、五銖錢外，還有漢代壁畫，這是研究漢代繪畫的重要資料。營城子一書附錄有濱田耕作的漢代壁畫和水野清一的營城子古墓壁畫的畫跡二文，對漢代壁畫有很精密的研究。

河家溝在吉林顧鄉屯，民國二十年八月北平國立地質調查所派員和哈爾濱特別區研究會合作，曾在這裏發掘，曾得若干化石，報告載中國地質調查彙報十一卷二期。民國二十一年六月日本早稻田大學理工學部和滿蒙學術調查研究團，重在這裏發掘，發現許多舊石器時代遺物。

自從日寇在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以後侵佔了我國東北，這等考古學的侵略也如同軍事侵略一樣，非常積極。民國二十二年五月，東亞考古學會組織考古團，在旅順郊外方家屯發掘羊頭窪的石器時代遺物。六月原田淑人等在寧古塔南調查發掘渤海國首都龍泉府的遺址，水野清一等又調查昂溪的石器遺址。六七月間梅本俊郎等在遼陽、太子河從事漢代石槨墓的發掘。從八月到十月有熱河自然科學調查隊，採集多數陶器石器。鳥居龍藏又在熱河調查契丹文化。

日人在我國東北種種考古學的調查和發掘，雖也是他們侵略事業的一部門，但在我國史學研究上，確可得到許多新史料。日人對於朝鮮的發掘，如樂浪漢墓的發掘，不僅爲漢代美術工藝放

一異彩，於漢代思想、風俗等各方面也提供大量具體的資料。尤其對漢代墓制的研究，漢代漆器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

日本私人的著作，鳥居龍藏有滿蒙古蹟考、八木奘三郎有滿洲考古學、滿洲舊蹟志。

第三節　古器物學的研究

古器物學的研究，在我國還在萌芽時期，還是這最近的三十年來的事。只因中國古器物的資料太散亂了，有許多部門資料又太貧乏了，所以研究的成績還不能滿意。可是有許多部門確已得到了相當的成就。例如銅器的研究便是一例。

過去金石學家對於古器物，不免帶着玩賞和寶藏的意味，至多對於銘文的攷釋上用些工夫，對於它本身在歷史上文化上的價值很少注意。到最近考古學家和古器物學研究者，對於古器物的研究就不同了，他們拿料學的比較方法去研求，對於每一種古器物，不但要考訂它的年代，還要追究它的來源和演變的歷程，來確定它在歷史上文化上的價值和地位；不但要知其然，還要研究它的所以然之故，更要研究它在過去社會裏人們怎樣製造它？怎樣利用它？人們又怎樣改進它？又怎樣的放棄它？它的形式有怎樣的演變？它的紋飾又有怎樣的演化？對於這種種問題的追究，便是近人研究古器物的最大的進步。

馬衡先生的戈戟之研究，唐蘭先生的古樂器小記（都見燕京學報），郭沫若先生的說戟（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蔣大沂先生的漢代戈戟考（華西協合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三卷）

和論戈柲之形式（金陵齊魯華西三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三期，）對於銅器中的重要兵器——戈和戟，和銅器中的樂器，曾有很精密的分析。蔣大沂先生的古玉兵雜考（同上第二期）裏，對於銅器中的「戉戚與斧」和「戈戟與殳矛」也都曾有精確的研究。宋代以來，銅容器中的「毁」（卽簋）都誤釋爲「敦」或釋爲「彝」又誤把「盨」當作「簠」這個錯誤，錢坫黃紹箕等雖已曾辨正，還不爲一般人所信，自從徐中舒先生作陳侯四器考釋，對於「毁」的卽「簋」曾提出了有力的論證，從此這懸案便解決了。容庚先生的殷周銅器考，對銅器各方面都有周詳的分析，確是部集大成的著作。日人梅原末治有戰國式銅器研究支那考古學論考等書，對於銅器及其他古器物都有深刻的研究。

銅器的式樣，由於石器角器陶器竹木器而來，前人雖已約略論及，可是論證不很充分。銅器中的鬲、甗、甑，是由陶器演化而來，就器名就很清楚。銅器中的鼎和甗，也是陶器的演化，日本濱田耕作有鼎與鬲一文（收狩野教授還曆紀念支那學論叢及東亞考古學研究）他從初期鼎下的款足（空足）三股和鬲的一樣，證明鼎是鬲的演化，（安特生却認爲鼎和鬲的起源是獨立的。）銅器中的簋簠字都從「竹」由竹器演化而來也很顯然。日本梅原末治又以爲尊是由於竹筒的變形（見關於中國銅器時代，刊史林十九卷三號二十卷二號，我國有胡厚宣譯本）。銅器中的酒器多從角器演化而來，像角這器就稱爲角，觥觚觶等器，字都從角，王國維古禮器略說又以爲角和爵古同音，無非是角器的演化。濱田耕作又有爵和杯一文（刊市村博士古稀祝賀東洋史論叢）他以

為斝的起源是由於獸角的根幹橫平的切斷，而爵的起源是由於像蒙古人那樣的斜切。我國郭寶鈞的古器釋名（刊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對於銅器形式的來源更有詳盡的推斷，銅兵器中的斧鉞固然起源於石器，而戈的來源是由於角器的，郭寶鈞有戈戟餘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五本三分）對此又曾提出充分的論證，不但戈角同聲，戈形似角，而角本是獸的武器，原始人利用作兵器是很自然的。這些研究，不但是替古器物探源，同時還替中國史前史增加了新頁。本來研究史前史，除用考古學社會學等方法以外，語源學也是重要的。

過去金石家研究銅器只注重銘文，現在古器物學研究者於此，已把銘文和形式花紋同樣地看重了，這是大進步。郭沫若先生的彝器形象學試探（刊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周代彝銘進化觀（刊古代銘刻彙考），對於銅器形式花紋和銘文的演化，曾作大略的探究，徐中舒先生的銅器的藝術，（刊第二次全國美展特刊和中國藝術論叢，）又根據了殷墟發掘的結果來補充郭先生的說法，對於銅器的名稱、用途、以及形式的流變和盛衰，都有周詳的分析。唐蘭先生的參加倫敦藝展銅器說明，又約略地注意到銅器地域的不同，這些系統的初步研究，是他日研究銅器演化的南針。

度量權衡是百物制度之本，度量衡的考研，本是件極重要的事。隋書律歷志雖曾分隋以前尺度為十五等，共二十八種，可是隋書只有諸尺和「晉前尺」（即「周尺」）的比例，究和現代尺度相差怎樣，是需要研究的。王復齋鐘鼎款識所摹的「晉前尺，」沈彤程瑤田都曾用以考證古代禮制，但據王國維先生的攷證，是宋代高若訥所摹製的。所幸年來古物屢有出土，晉荀勗造「晉前

尺」時，共校七品，第五品是「劉歆銅斛，」乾隆年間曾出「新莽嘉量，」便是「劉歆銅斛，」現藏古宮博物院，王國維先生曾驚爲「曠世瓌寶，」著莽量考一文，後又成記現存歷代尺度一文；除「劉歆銅斛」外，又列舉歷代實物拓本摹本十六種，比較其短長而推究其變遷的原因，很有重大的發現。劉復先生曾著故宮所存新嘉量之較量及推算（刊考古學論叢及工業標準與度量衡一卷四期）較量和推算都非常精密，從此隋以前的尺度都分明了。民國二十一年福開森又得一銅尺，傳洛陽金村出土，便是著名的「驫鐘尺」。二十三年葉遐菴先生又得一鏤牙尺，傳也是洛陽出土，長短都和「劉歆銅斛尺」同，還有「商鞅量，」馬衡唐蘭兩先生都曾研求，唐先生有商鞅量與商鞅量尺一文（刊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五卷四號，）證明「商鞅量」所用的尺正和「劉歆銅斛」相同，從此周尺便得到了實證，隋書的記載也得證明。唐代尺度，日本頗多珍藏（在正倉院法隆寺等處，）王國維先生有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六唐尺摹本跋。宋的三司布帛尺，以前孔尚任曾藏有一具，王先生也有宋三司布帛尺摹本跋。民國九、十年間鉅鹿曾出土宋木尺，王先生也有宋鉅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跋。近年出土的古尺，還有傳爲安陽出土的殷代骨尺（現歸中央研究院歷史博物館，）傳爲壽縣出土的銅尺，傳爲河南出土的玉尺（藏福開森先生。）用古錢的尺寸來推考尺度的，日本有足立喜六的長安史蹟考，我國丁福保先生有古錢有裨實用譚等。至於楊寬先生的中國歷代尺度考，不但是部集大成的著作，也還有許多校正前說的地方。

關於銅鏡，我國有羅振玉的古竟圖錄三卷，徐乃昌的小檀欒室鏡影六卷，日人有富岡謙藏的

古鏡之研究，支那古鏡圖說，後藤守一的漢式鏡，梅原末治的在歐美之支那古鏡等，對於銅鏡曾有精密的研究。

除了銅器和度量衡器之外，近人對於玉器漆器明器瓷器以及古錢都有較進步的研究。玉器的研究，日人濱田耕作著有竹齋古玉圖說（我國有胡肇椿先生譯本改名古玉概說）我國陳大年先生也有所藏古玉說明書的出版，對於玉器之由石器演化而來，以及玉器本身的演變，都很有寶貴的見解。蔣大沂先生的古玉兵雜考裏對於圭和璋的制度也都有新見。漆器方面，日人對於樂浪出土的漆器很有研究，梅原末治在其所著中國考古學論考一書中，也有關於漆器的考論。我國鄭師許先生著有漆器考。民國二十五年長沙楚墓曾出土大量銅器、石器、漆器、木器、陶器及革帛等物，商承祚先生著長沙古物聞見記一書，對於戰國時代的漆器，不但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並有所考證。明器方面，日人濱田耕作著有中國古明器泥象圖說，我國鄭德坤先生著有中國明器一書，鄭先生對於明器的源流曾有精析的分辨。古錢方面的研究，近年來以丁福保先生的貢獻最大，他除著古錢有裨實用譚等書以外，還有古錢大辭典的編印，這使研究古錢的人得到了很大的方便。瓷器方面，比較上陳萬里先生的探索最為深刻，對於宋明二代龍泉窰的瓷器，還曾作實地的發掘和研究。

第四章　西北文物的發現與著錄

第一節　中外考察團在西北考古的成績

當十九世紀的後半期，中亞一隅，幾成了考古學上的寶庫，中外人士到西域去探險的，一時不絕於途，使漢唐的歷史文化和西域的史蹟，放出許多異彩，使今日要改作或重寫這段史實的，得有了最寶貴的史料。

西域探險隊以外人所組織的爲多，至於國內，僅有與斯文赫定(Sven Hedin)合作而由徐炳昶先生所領導的西北科學考察團，最近更有教育部所組織的西北史地考察團。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夏天，由北平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瑞典地理學家斯文赫定決議，組織考察團前往新疆探險，定名爲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察團，團長二人，中國一人爲徐炳昶先生，外國一人即爲斯文赫定，另有中國科學家四人參加，爲袁復禮先生、黃文弼先生、丁道衡先生、詹蕃勛先生，而以黃先生負考古的責任。考察時期定爲二年。遂於是年五月九日自北平出發，循平綏路至包頭，九月至額濟納河，十七年一月抵哈密。同年春夏間，因斯文赫定與德國漢薩(Hansa)航空公司所訂用的新式飛機航行天山南路的計劃不能實現，德國團員紛紛歸國，全團經費復發生問題。及斯文赫定回國籌劃就緒，而新疆當局對於考查團的行動又加以限制，徐先生與斯

文赫定不得已，乃於十七年底決定中止穿行沙漠的計劃，先返北平；一部分團員則仍留各地工作。記述這一次考察經過的，徐炳昶先生撰有徐旭生西遊日記三册，斯文赫定撰有長征記（Auf Grosser Fahrt Leipzig. 1929. 此書有李述禮先生譯本。）

此次探險，在考古學上貢獻極大，發見長城遺址，且於居延故塞發見漢代居延都尉府的簡牘約兩萬片，於吐魯番發見高昌古墓，掘得磚陶甚多，於羅布淖爾得漢代簡牘及其他古物，於庫車得壁畫及寫經亦不少。黃文弼先生編爲高昌一册，高昌第一分本一册，高昌磚集一册，高昌陶集一册，羅布淖爾考古專刊，前五種已出版後一種已編校完畢，惜至今尚未刊行。由黃先生高昌磚集的弁言中，知其新疆考古報告的程序，係以地爲綱，首爲高昌，次蒲昌（卽羅布淖爾）次焉耆，次龜茲，次法沙，次于闐，共爲六輯。甚盼其能早日編成問世也。此外更有一些記述此次考古經過的論文：蒙新旅行之經過及發現（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三號），天山南路大沙漠探險談（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三期），西北科學考察團在新疆考古情形（同上第四號）。

黃先生復於民國二十一年秋天，奉教育部命令至蒙古新疆兩地考察教育及文化，隨鐵道部所組織的新綏公路察勘隊至新疆，經蒙古草地，於二十二年春天到哈密，秋天卽返迪化而還南京。此次復在羅布淖爾等地工作甚久，所得古物亦極豐，其羅布淖爾考古專刊所述，卽有此次所得的遺物。其記述此兩次發現的論文有蒙古新疆兩地考古經過（責善半月刊一卷三期），羅布淖爾考古專刊敍錄（同上二卷六期）。今黃先生復又作第三次新疆探險，所得不詳。

西北史地考察團為教育部所組織，於民國卅一年曾至居延敦煌諸地考察。

關於外人考察我國西北的為數甚多，包括美英法俄德匈瑞典日本諸國。向達先生於其所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中附有十九世紀後半期西域探險略表，係由日人石田幹之助中央亞細亞探檢之經過及其成果一文所附的年表增補而成，所列極為詳細。本節所述，僅擇其重要的幾次而已。

斯坦因(A. Stein)本為匈牙利人，任職於印度政府，自清光緒二十六年至民國十九年(一九〇〇至一九三〇)前後曾在我國西北作四次考察：

第一次：光緒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一九〇〇——一九〇一)，

第二次：光緒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一九〇六——一九〇八)，

第三次：民國二年至五年(一九一三——一九一六)，

第四次：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

其第一次係在塔里木盆地探察，於和闐附近沙磧中，掘得壁畫及簡牘極多，此外尚有各種語文的佛經殘卷，編有和闐沙埋廢蹟記(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一書和古代和闐考(Ancient Khotan)二册。後書第一册為本文，第二册為圖版，極為精美。本文後又附有 Chavannes, A. H. Franke, Bnshell, Rapson, Thomas, Church, Léczy, Margolinth 諸人關於其所得遺物的考釋。第二次復由塔里木盆地，至甘肅敦煌及敦煌西北部長城遺址，從事發掘，得簡牘極多。次年五月復在敦煌千佛洞石室中，取得石室藏書及古代藝術品，滿載而歸印度。其後編有西域圖考

(Serindia) 五册，千佛洞記 (The Thousand Buddhas)，和沙漠契丹廢址記 (Ruins of Desert Cathay: Personal Narrative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most China) 二册。第三次則由帕米爾轉道新疆，復得簡牘及敦煌石室藏書五百七十卷，編有亞洲腹部考古記 (Innermost Asia) 四册。第四次來中國，欲謀再舉，爲我國政府所阻而止。

勒柯克(A. Von. Lecoq)，德國人，曾組考察團來我國西北兩次：

第一次：光緒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一九〇四——一九〇五）

第二次：民國二年至三年（一九一三——一九一四）。

第一次在吐魯番作大規模的發掘，沿天山北路至塔里木盆地探察，所得壁畫及古物古文書甚多，編有中亞古希臘佛教藝術考(Auf Hellas spureu In Ostturkistan)和高昌 (chotscho)。第二次亦至新疆。當勒柯克第一次考察仍留新疆的時候，德國格魯威德爾(A Grünwedel)復率另一考察團來中國，與之合作，至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夏天始告結束。二人合編有古代庫車考 (Alt-Kutscha)。勒柯克更編有一部「中亞美術及文化史圖集」(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其中圖版是總集前三次所得的古物，且附有說明。

伯希和 (P. Peliot) 爲法國著名的漢學家，奉其國教育部，安南河內遠東學院及法國學士院金石文藝部三者的命令，曾組織考察團來我國西北探險，探險時期自光緒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一九〇六——一九〇七），爲時雖短，所得却很不少。伯希和踰葱嶺，沿塔里木盆地北段而入

甘肅，在庫車發掘一佛寺遺址，在敦煌千佛洞取得石室藏書，遠較斯坦因所得爲重要。渠著有中國西域探檢報告書（Le Rapport de U. Paul Peliot sur Sa Massion an Turkestan Chinois，有陸翔先生譯文。）此爲清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二月二十五日法國考古學院開會時，伯希和所宣讀的報告書，刊考古學院院刊一九一〇年一二月刊（中譯文刊說文月刊第二卷）其專記千佛洞的有甘肅中古書庫的發見（Une Bi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r au Kan-su）文刊河內法國遠東學院院刊一九〇八年第八期，此爲伯希和在千佛洞所記的日記。

科智洛夫（P. K. Kozloff）俄人，於光緒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一九〇七——一九〇八）曾組織考察團入蒙古探檢。光緒三十四年，在寧夏北部加是諾爾額濟納河畔，掘得西夏黑城（Kara-Khoto）故址，得古器物及西夏文書籍甚多，其有裨於史學的地方不少，今均藏列寧格勒人種博物館。渠編有蒙古安姆多與黑水死城（Mogolia, Amdo and the Dead Town Kara-Khoto）

橘瑞超、大谷光瑞，日人，於光緒二十八年至民國三年間，曾組織中亞探檢隊，由西比利亞入新疆北部及甘肅，前後凡三次：

第一次：光緒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一九〇二——一九〇四），

第二次：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元年（一九〇八——一九〇九），

第三次：宣統二年至民國三年（一九一〇——一九一四）。

第一次由大谷光瑞與渡邊哲信，堀賢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圓一行五人，自倫敦出發，經俄國，抵

裏海沿岸的縛喝(Balkh)，由此過撒馬爾罕，科干德(Kokand)綠洲，越咀剌健(Talykan)嶺，而入喀什噶爾至葉爾羌；大谷與本多井上分道，轉克什米爾而入印度，渡邊與堀氏則留庫車和闐；光緒三十年年底方東歸。第二次則由橘瑞超與野村榮三郎二人於光緒三十四年自北平出發，在吐魯番，庫車及喀喇和卓附近木頭溝等地考察；次年，轉入南路，往來於羅布淖爾沙漠中，尋求漢代樓蘭國的故址；九月入葉爾羌，復訪求唐代斫句迦國的故址。第三次爲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二人，橘瑞超當結束第二次探檢後，即轉道印度赴英，復由倫敦出發經俄國而至新疆，在塔里木盆地及吐魯番、敦煌一帶考察，三年有餘，始沿阿拉善山脈東行，入戈壁沙漠，經黃河北鄂爾多斯一帶，由山西包頭歸化而抵張家口，始由北平而返其本國，所得典籍及美術品極多。大谷光瑞編有西域考古圖譜二册；橘瑞超編有中亞探檢一册。斯文赫定由光緒二十年至民國二十四年，曾考察中亞七次，其中一次係與我國合作，已具述如上。所貢獻以地理方面爲大，記其旅行生活而頗爲簡單的，有亞洲腹部旅行記(My Life As An Explorer，有李述禮先生譯文。)其在考古學上，以發現樓蘭故址最爲重要，所得遺物由德國維斯巴登的語言學家喀爾亨利(Karl Himly)加以整理，確定其地即爲漢代的樓蘭。喀爾死後，復由孔拉(Conrady)教授加以研究，編有斯文海定樓蘭所獲縑素及簡牘遺文(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

第二節　漢晉簡牘的發現與著錄

清代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斯文赫定在樓蘭故址，今羅布淖爾地方，發見晉代簡牘，已編入前述的喀爾亨利及孔拉特書中，向達先生曾摘錄其一部分爲斯文海定樓蘭所獲縑素簡牘遺文抄，刊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五卷第四號。斯坦因第一次考察曾於和闐附近得晉代簡牘，第二次在羅布淖爾及敦煌長城廢址得漢晉簡牘極多，尤以敦煌漢簡爲最重要。此批史料，由法國漢學家沙畹(Ed. Chavannes)博士編爲斯坦因所獲中國簡牘考釋(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所收共九百九十一片，共分三編：

第一編：第一片至七百另九片，係敦煌西北古長城廢址所得的遺物。

第二編：第七百二十一片至九百五十片，係蒲昌海北樓蘭廢址所得的遺物；其中少數係爲斯坦因第一次考察在尼雅所得，自九百四十片至九百五十片。

第三編：第九百五十一片至九百七十四片，係在和闐東北瑪咱託拉一地所得；第九百八十一至九百八十三片則爲拔拉滑史德一地的遺物。

後羅振玉、王國維二人自沙畹書九百九十一片中，取五百八十八片，編爲流沙墜簡三卷，考釋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第一卷爲小學術數方技書，共八十片，由羅振玉署名。第二卷爲屯戍叢殘，分簿書烽燧戍役廩給器物雜事六類，由王國維署名。第三卷爲簡牘遺文，由羅氏署名。補遺一卷所收的，爲斯坦因古代和闐考第二册中所載的尼雅木簡。附錄爲日本橘瑞超在羅布淖爾所得西域

長史李柏書稿。後王氏復撰有流沙墜簡補正一卷，賀昌羣先生更撰有流沙墜簡校補，刊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八卷第五期，均對此書有所補訂。

沙畹考釋係就斯坦因所得選錄而成，後其剩餘由法國漢學家馬伯樂(Maspero)寄與張鳳先生，張先生乃以沙畹原書為初編，以此為二編，編為漢晉西陲木簡彙編，然此所謂二編在史料上的價值極低。

西北科學考察團於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在漢代居延故塞發見大批漢簡，曾由馬衡先生，向達先生，賀昌羣先生，余遜先生分作釋文，由商務印書館在香港影印，書未出而太平洋戰爭爆發，其下落不明。幸由勞幹先生用原簡的反體照片，編為居延漢簡考釋六卷(釋文四卷，考證二卷)。釋文四卷的分類為：

(一)文書：書檄，封檢(附郵驛記載)，符卷，爰書。(以上卷一)

(二)簿錄：烽燧，戍役，疾病死亡，錢穀(以上卷二)器物，車馬，酒食，名籍，資績，簿檢，計簿，雜簿。(以上卷三)

(三)信札。

(四)經籍：歷譜，小學，六藝諸子，律令，醫方，術數。

(五)雜簡：有年號者，無年號者。(以上卷四)

居延漢簡在出現時期上雖較敦煌漢簡為後，但在量上却較之多出數倍。

國立西北圖書館藏有漢簡三十，亦屬居延所出，見劉國鈞先生的跋裴元善舊藏漢簡，刊書學第一卷第四期。

第三節　敦煌石室所藏典籍的發現與著錄

敦煌石窟寺在鳴沙山，一石室中藏有典籍甚多，大概為宋初所藏，其外則飾以壁畫。清光緒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一九〇一）道士掃除積砂，壁破，藏書始發見。據斯坦因所記，卷子在石室中係緊緊的一層一層亂堆在地上，高達十英尺左右，據後來的推測，將近有五百方英尺左右，石室僅約有九英尺見方，兩人處其中，已無多少餘地。斯氏在組織第二次考察團來中國時，即由洛克齊(professor de Lóczy)教授告以敦煌千佛洞壁畫的美麗與考古學的價值，故渠於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至敦煌凡兩次。其第二次到敦煌的時候，即聽到藏書發現的消息，乃與該寺王姓道士幾經商議，由斯氏捐與該寺一大筆款項，易取藏書甚多。四月之後，復得一部分。總共此次所載去的，由斯氏自己所記，為寫本二十四箱，美術遺物五箱。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斯氏再至敦煌時，又由王道士手售與一批，共五大箱，約六百多卷。現均存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所藏歷來均未公開，目錄的編製亦最近方告完成，尚未刊印，故其確數尚不得而知。向達先生所經眼的，曾到六九六三號，外尚有刊本二十餘卷，其他域外語文寫本二百餘卷，是則斯氏所帶去的，當在七千卷以上。其美術遺物今存於印度新德里古代中亞博物院中。羅福萇先生著有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刊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係據法人沙畹所鈔的書目重為編定。向達先生亦有倫敦所藏敦煌卷子

經眼目錄，刊圖書季刊新第一卷第四期。

當斯坦因第一次取去敦煌藏書的第二年，法國伯希和亦去敦煌，復由王道士售與大批卷子。伯氏返法時，路過北京，始爲中國學術界所聞。當其在六國飯店展示此批寫本時，操着滿口流利的中國話，一場暢談，使在場的羅振玉諸人爲之驚嘆不已。今存巴黎國家圖書館的，自二〇〇一號至三五一一號，共一千五百多卷。羅福萇先生有巴黎圖書館敦煌目錄，係譯自日人狩野直喜在巴黎所鈔錄的，僅有三分之一，刊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一卷四期。除巴黎圖書館外，尚有五百多卷在伯希和家中。王重民先生編製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書目時，始盡得見。所得美術遺物則藏集美（Guimet）博物院及盧浮宮中。

當伯希和路過北京展示其所得後，羅振玉李盛鐸等乃籲請學部，將所餘敦煌卷子運京，交京師圖書館保存（卽今北平圖書館的前身）。此項殘存，陳垣先生編有敦煌刼餘錄六册，凡得八千六百七十九號，復由胡鳴盛先生檢閱未登記的殘葉，又編成一千一百九十二號，共爲九千八百七十一號。

其餘散在私家的尤其不少，如羅振玉李盛鐸均藏有很多，李氏卽有四百卷左右，有簡目流行，今已售於日本。當敦煌卷子全部運至北京時，王道士藏匿者猶不少，斯坦因第二次所得的卽此；其餘則藏在兩大轉經桶中及新塑佛像內，前者今已無存，大部均落在當地士紳的手中；後者最近敦煌藝術研究所曾發見一部分，共編爲六十八號。

著錄石室藏書的，以羅振玉爲最多，有敦煌石室遺書十二種，鳴沙石室古佚書十八種，鳴沙石室佚書續編，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十種，敦煌零拾七種，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三集，所集多爲巴黎圖書館及其本人所藏。

北平圖書館所藏的一小部分，由許國霖先生編爲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二册，向達先生亦曾編爲敦煌叢鈔，所鈔共若干種，刊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中。巴黎圖書館所藏，劉復曾錄出一部分，編爲敦煌掇瑣。其他尚有蔣斧的敦煌石室遺書，蔣斧編羅福萇補的沙州文錄，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眞蹟錄甲乙集，所收多爲巴黎圖書館所得的遺物。

第四節　宗教典籍美術遺物的發現及其他

中世紀中央亞細亞所流行的宗教，以佛教爲最有勢力。此外則有火祆教，以其發源於波斯，故又稱波斯教，以火爲神，極情崇拜。又有摩尼教，乃由摩尼所創，爲二元性的，其教義既一方面承認火祆教，同時又收入佛教與基督教的教義而成爲一種混合的宗教。又有景教，本爲基督教的一派，爲五世紀時君士坦丁堡的一個主教聶氏託里（Nestorius）所創，以爲基督是人間的神，基督的母親瑪利亞，不能稱爲神之母，而應稱爲人之母，基督雖爲神，而聖母瑪利亞却不能爲神，其說在歐洲不能通行，乃轉向亞洲，遍及於波斯印度及東方諸國。這四種宗教的經典在中亞及敦煌石室中都有發現，以佛教的爲最多，景教摩尼教次之，而火祆教則僅有一斷葉而已。

著錄敦煌石室佛教典籍目錄的，有李翊灼的敦煌石室經卷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刊古學

彙刊第三卷第二號，）羅振玉的日本橘氏敦煌將來藏經目錄（見雪堂叢刊）。葉恭綽先生亦有旅順關東廳博物館所有敦煌出土之佛教經典，刊圖書館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在日本有矢吹慶輝的斯坦因蒐集敦煌地方出土古寫佛典解說目錄，英國博物館藏敦煌出土古寫經典目錄，高楠順次郎在大正藏第十九也有燉煌本古逸經論章疏幷古寫經目錄。其他如大谷光瑞考察團所得，有西晉元康六年題記的諸佛要集經，西涼建初五年的法華經及善導大師阿彌陀經跋語，其餘尚不少，均係西域發現，見前舉大谷光瑞書中。

關於景教，以前僅有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在西北探檢後，所得的新資料不少；尤以德國考察團在吐魯番庫車一帶所掘得的福音書讚美歌之類爲多，俱用宰利語寫成，又發見若干寺院遺址及壁畫斷片。至其經典，巴黎圖書館有景教三威蒙度讚一卷，係伯希和在敦煌石室所得，附有景教經名三十五種。李盛鐸藏有宣元至本經一卷，志玄安樂經一卷。日人高楠順次郎復得序聽迷詩所經一卷，更有「一神論」一卷，亦在日本。其中如譯瑪利亞爲末豔，耶穌爲「移鼠」「翳數」「夷數」且有敍述聖母懷妊及耶穌誕生的概略，及摩西十誡等。

摩尼教經典在敦煌亦有發見，見日人羽田亨的新出波斯教殘經考，刊東洋學報第二卷第二期。石田幹之助亦有敦煌發見摩尼光佛教法儀略考，刊白鳥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此外勒柯克在高昌尙發見有回鶻文的摩尼教經典。

火祆教的遺物幾無發見，據勒柯克說祇有一碎葉而已。

美術遺物在西域及敦煌石室中發現甚多，見前舉諸書中，均屬斷片。惟敦煌壁畫，在藝術史上的價值很高，自伯希和前往，爲之編號攝影後，方爲人所注意。伯氏編有敦煌圖錄六册(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每册收照片六十四幅，係屬活葉。賀昌羣先生曾據此書編爲敦煌佛教藝術的系統，刊東方雜誌第二十八卷第十七期。勞幹先生編爲伯希和敦煌圖錄解說，刊說文月刊第三卷第十期。我國學者專赴敦煌考察壁畫的，最早有陳萬里先生，編有西行日記。近西北史地考察團亦專赴其地考察，有向達先生的論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刊文史雜誌第四卷第一二期。近教育部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對此作專門的研究與整理，但最近已有裁撤說。最近向錦江先生曾往敦煌考察，有記敦煌一文，刊中學生雜誌第九十一期。對於千佛洞的雕塑壁畫也曾作約略的記述。

此外，諸西北考察團更獲有其他的典籍。如最早斯文赫定在羅布淖爾曾發見戰國策的斷片，橘瑞超在吐魯番得有論語，漢書張良傳，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的斷片，柯智洛夫在黑城得有易經，莊子，劉智遠諸宮調，番漢合時掌中珠諸書；尤以末二種爲最重要，劉智遠諸宮調爲今日留存最早的一本諸宮調著作，番漢合時掌中珠爲西夏文的字典，中外學者由此方讀通西夏的文字。在敦煌及西域更出有唐代戶籍不少，此爲治社會史者最寶貴的史料；陶希聖先生曾將已經發表的，彙編爲唐代戶籍簿叢殘，爲所編食貨半月刊的一個特輯。

第五章　內閣大庫軍機處檔案與太平天國史料的發現與著錄

第一節　內閣大庫軍機處所存檔案的整理與著錄

內閣為明清兩代政令所從出,自清雍正以後,其權始為軍機處所奪,故其所存舊檔,大部分是明末清初的遺物。由內閣大庫檔冊(刊玉簡齋叢書)知所藏分存六庫,其編目為禮樂射御書數,前四庫為檔案,後二庫則多為典籍。檔案從時代上可分為三類(一)明檔(二)清檔(三)清盛京舊檔。清宣統元年大庫屋壞,乃以所藏移於文華殿兩廡,極為零亂。時張之洞以大學士軍機大臣管學部事,奏請以大庫所藏書數兩庫的典籍,成立學部圖書館(卽今北平圖書館的前身。)其他禮樂射御四庫所存的舊檔,閣議則以「舊檔無用」四字,奏請焚燬。時羅振玉任學部參事,派赴內閣接收書籍,見所有舊檔俱近代史上極可寶貴的史料,因此請於張之洞,將此歸學部收藏,案卷之類貯於國子監南學,試卷之類則貯於大堂後樓。民國二年教育部設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於國子監,五年移於午門端門,乃移南學及學部所藏的檔案與試卷,存於端門門洞中。民國十年,歷史博物館為經費積欠,無法工作,乃將較破碎的檔案,裝八千麻袋,共十五萬斤,以四千元的代價出售於同懋增紙店,為造還魂紙的原料。事為羅振玉所知,乃以三倍的價值將原物買回,存於北平天津兩處,曾略加整理,編有史料叢刊初編十冊。其後李盛鐸復以一萬六千元的代價,從羅振玉處購去。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復由馬衡先生的介紹，以一萬八千元購藏，乃成立明清史料編刊會，由陳寅恪、朱希祖、陳垣、傅斯年、徐中舒諸先生總其事，編有明清史料三集，每集十册，共三十册，分甲乙丙三編，丁編本已編成而淪於香港。其歷史博物館所存，較爲完整的，則於民國十一年移存於北京大學，該校分三部整理：一分朝代，二摘由，三整理內容，曾出有目錄一巨册，復編有順治元年內外官署奏疏，洪承疇章奏文册彙輯。

軍機處爲清雍正以後政府實權所寄的地方，民國十三年故宮博物院將其所藏檔案移存於大高殿中，擇其重要的加以整理，初刊有掌故叢編十册。其後乃易名爲文獻叢編，更將其性質類近的編爲專刊，如三藩史料，文字獄檔諸書，而以外交史料爲最有價值，有：嘉慶朝外交史料六册，道光朝外交史料四册，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八十八卷，四十四册，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二十二卷，十一册，清宣統朝中日外交史料六卷，三册。

第二節　太平天國新史料的發現與著錄

太平天國爲近代民族革命運動的一大波瀾，惟清政府官書視之爲盜寇，其遺文遺物遭毀滅殆盡。但其典章誥諭，多留存於海外圖書館中。中國人至海外鈔錄此種史料的，最早爲劉復的太平天國有趣文件十六種，但多爲瑣碎小品，史料上的價值很低。同時程演生先生更由巴黎東方語言學校鈔錄得太平天國原書八種，編爲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其目爲：天命詔旨書，頒行詔書，天父下凡詔書二部，太平詔書，天朝田畝制度，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爲罪隸論。

民國二十一年蕭一山先生至英國，復從大英博物院中，攝得太平天國原書二十二種，更加以中央圖書館在揚州所得的一種，編爲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其目爲：王父上帝言題皇詔，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天條書，太平詔書，太平禮制，太平軍目，太平條規，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新曆，幼學詩，太平救世歌，詔書蓋璽頒行論，天朝田畝制度，天情道理書，御製千字詔，行軍總要，天父詩，醒世文，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欽定士階條例，幼主詔旨（以上爲英國所藏），英傑歸眞（此爲中央圖書館所得。）更編有太平天國詔諭一卷，太平天國書翰一卷。此外蕭先生在國內各雜誌如逸經、經世、國聞週報曾發表了不少的太平天國史料，如太平天國詔旨抄（見逸經與經世），戈登文書（一部分曾見國聞週報），粵匪起事根由洪秀全來歷洪仁玕自述太平兵册（均見經世）更加以遐邇貫珍中之太平史料及資政新編等書，編爲太平天國叢書第二集，書未出而燬於香港。

謝興堯先生亦曾輯有太平天國叢書共三輯，凡十二種，除第一輯爲其本人論著，第三輯爲太平詩史外，第二輯爲珍籍彙編，所收史料亦不少，其目爲：金陵癸甲紀事略一卷，附粵逆名目略一卷（謝介鶴撰）粵逆陷寧始末記四卷（陳錫麒撰），癸丑中州罹兵紀略一卷（陳善鈞撰），庚申避難實錄一卷（趙偉甫撰）越州紀略一卷（古越隱名氏撰）儉德齋隨筆一卷（胡辰齡撰），干王洪仁玕等口供（凡洪仁玕口供一篇，幼天王洪福瑱，卹王洪仁政，昭王黃文英口供各一篇。）王重民先生至英國劍橋復抄攝太平天國文獻數十種，有劍橋太平文獻新錄，刊國聞週報第十一卷第九期；其已發表於逸經的有太平天國文件欽定軍次實錄。復擬彙刻太

平天國官書新編十種，目錄爲：天理要論，太平天國甲寅四年新曆，戊午八年新曆，太平禮制，己未九年會試題，資政新編，干王洪寶制，欽定實錄，誅妖檄文，太平天日，其書尙未刊行。

羅邕先生編有太平天國詩文鈔二册，其中眞僞雜陳，以兪大維先生所錄德國柏林圖書館所藏爲最可貴。

抗戰而還，太平天國史料亦曾發見數起，如幼贊王蒙時雍家書，干王致英教士艾約瑟手札（以上俱見簡又文先生金田之遊）瑞天豫傅廷佐等告示，瑞天豫傅廷佐等致李矩鞿監大順書，翼王給涪陵人民諭，翼王佈告（以上俱見說文月刊三卷十一期）均極珍祕。此外故宮博物院所刊行的掌故叢編文獻叢編中，亦有不少的太平天國史料。

下編　近百年中國史學的後期

第一章　史籍的撰述與史料的整理

第一節　近代史的撰述與史料的整理

所謂近代史，現在史家對於它的含義與所包括的時代，有兩種不同的看法。第一種認爲新航路發見以來，世界的交通爲之大變，人類生活與國際關係，較之中古時代，顯然有不同的地方，是爲中古史與近世史的分界；這時期歷史孕育出未來的局勢，每以民族的思想爲其演變的原動力；故近世史的範圍，實包括近三四百年來的歷史，無論中國與西方皆係如此。此派可以鄭鶴聲先生的中國近世史爲代表。第二種則認爲在新航路發現的時候，歐洲僅產生了商業革命，明季以來，中國雖與西方接觸，但並沒有顯著的影響；其後歐洲產生了工業革命，中國與西方發生新的關係，以中國言方係近代史的開始。此派可以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爲代表。

在這兩種不同的看法之下，所產生的近代史著述很多，如陳懷、高博彥、吳貫因、魏野疇、邢鵬舉、羅元鯤、梁園東、沈味之諸先生的著述，各有長處。其最完善的，爲鄭鶴聲先生的中國近世史。民國十八九年，鄭先生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教授中國近世史，曾編有講義，共二十八章，起自明季，至民國

初年止。此書卽係根據講義改編而成，全書體大思精，甚爲賅備，惜迄今僅出二冊。

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係從鴉片戰爭開始敍述迄於「七七」的抗日戰爭開始爲止。爲書僅四章，極爲簡單，然言簡事賅，不愧爲名家之作。

郭廷以先生亦有中國近世史。郭先生的看法與蔣先生一樣，其書搜輯完備，考證精詳，惜迄今亦僅出二冊。

沈鑑，王栻二先生有國恥史講話。二先生係蔣先生的門人，其爲書一本其師說，雖內容不無矛盾與不一貫之處，但用極活潑的語體文敍述，搜集史實又極爲正確，這在近代史著作中尚爲創作。又陳恭祿先生的中國近代史，雖間有錯誤處，亦甚詳備。

在近代史敍述中，中國民黨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應該占很大的篇幅，而國民黨五十年來的歷史，也應該是近代史上最輝煌的一部分。關於國民黨黨史的寫作，以鄒魯先生，馮自由先生的貢獻爲最大。鄒先生有中國國民黨黨史稿。此書鄒先生曾兩加改訂，初僅一冊，近增爲四冊，補訂初稿的地方不少，所敍極爲公正翔實。馮先生有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馮先生身預開國前若干次革命運動，民初時復任臨時稽勛局局長，於各省革命事迹的調查不遺餘力，所藏革命時代各種筆記報章表冊甚夥，故成就特高。此書共三冊，三十餘萬言，分五十一章，所記極爲詳細。他復有革命逸史二集，係仿稗乘而作，足以補正史之缺。

對於近代史史料的整理，有左舜生先生的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續編各二冊。左先生書中所

采有價值之材料頗多，但亦雜有價值很低的史料。蔣廷黻先生有中國外交史資料，惜其書僅成上中兩册，下册迄今未出。王芸生先生有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所錄甚多不經見的史料。此外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近輯有黨史史料叢刊，今雖僅出兩集，但所載不少珍貴的史料。

第二節　通史的撰述

中國通史的寫作，到今日為止，出版的書雖已不少，但很少能夠達到理想的地步。本來以一個人的力量來寫通史，是最困難的事業，而中國史上須待考證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其中較近理想的，有呂思勉白話本國史、中國通史，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陳恭祿中國史，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張蔭麟中國史綱，錢穆國史大綱等。其中除呂思勉、周谷城、錢穆三四先生的書外，其餘均屬未完之作。錢先生的書最後出而創見最多。

編著中國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條列史實，缺乏見解，其書無異為變相的綱鑑輯覽或綱鑑易知錄之類，極為枯燥。及呂思勉先生出，有鑒於此，乃以豐富的史識與流暢的筆調來寫通史，方為通史寫作開一個新的紀元。他的書是：白話本國史四册。書中雖略有可議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為一部極好的著作。又呂先生近著尚有中國通史二册，其體裁很是別致，上册分類專述文化現象，下册則按時代略述政治大事，敘述中兼有議論，純從社會科學的立場上，批評中國的文化和制度，極多石破天驚之新理論。

張蔭麟先生亦欲以極簡潔的筆調，集合數人的力量，寫一通俗的通史，不加腳注，不引原文，使

有井水處，人人皆熟於史事。漢以前由張氏自撰，唐以後則屬於吳晗先生，雅片戰後的社會變化則屬於千家駒先生，中日戰爭則屬於王芸生先生。惜其書未成。張氏所自撰的有東漢前中國史綱一册。張氏英年早逝，甚盼吳先生等能本其書的體例，完成其志願。

第三節　文化史及專門史的撰述

文化史部門，柳詒徵、陳敎原二先生均有所撰述。柳先生有中國文化史二册，所用係綱目體，徵引繁富，並有其一貫之見解。陳先生亦有中國文化史二册，並稱佳著。

民國二十五年商務印書館有中國文化史叢書的編輯，由王雲五、傅緯平二先生總其事。王先生有編纂中國文化史之研究一文，記其事極爲詳悉，並附有擬編中國文化史叢書八十種目錄。惜抗戰以後，其出版卽較緩慢，太平洋戰爭爆發，乃完全停止。其已出版的有四十餘種，精善的有白壽彝中國交通史，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李儼中國算學史，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王庸中國地理學史，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等。諸先生均爲國內有數的專家，所撰均甚詳贍。顧頡剛與史念海先生也合撰了中國疆域沿革史一册。

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以胡適、馮友蘭二先生的貢獻爲最大。胡先生有中國哲學史大綱。此書爲中國第一本有系統的哲學史，惜今僅出上册。西漢以下，搜集材料已逾二十年，他日成書，必可以震撼全世。胡先生尙有其他論哲學史的文章多篇，均收在胡適文存及胡適論學近著中。馮友蘭先生有：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史補，中國哲學小史等著作。中國哲學史，搜材充備，考訂精詳，態度公允而

客觀，敘述亦極有條理系統，中國哲學演變的眞相，讀此書可明白其大概，誠爲哲學史中最完善之傑作。

梁啓超先生有先秦政治思想史，爲論中國政治思想史最早的書籍，惟僅限於先秦部分。此外陶希聖先生及蕭公權先生均有中國政治思想史，陶先生書極有創見，已出四册，僅餘清代一册未出。蕭先生書分爲「創造」「因襲」「轉變」「成熟」四時期，現僅出版「創造時期」一册。

又郭沫若先生有先秦天道觀之進展，傅斯年先生有性命古訓辨證，均用最新的方法，以甲骨文金文典籍爲材料，而敘述先秦時代的中國哲學。二書取徑全同，其成就可謂突過前人。

關於中古佛教部分，以湯用彤先生的成就爲最大，他有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呂澂先生有，漢藏佛教關係史料集，對於佛教史的研究，抉發幽祕，貢獻極大。至於梁啓超先生的研究佛教史專門論文多篇，更是這方面研究的先驅，有劃時代的價值。

道教史有許地山先生的道教史，惜許先生早逝未成。

梁啓超對於清代學術極爲留心，其本人復爲經今文學運動的一員，撰有清代學術概論，近三百年學術史。前書可見清代學術演變的大概；後書本屬未定稿，雖較前書爲詳，然頗凌亂。錢穆先生亦撰有近三百年學術史，書中首述兩宋學術淵源，以經世明道之旨爲依歸，正論凡十七家，詳人所略，略人所詳，與梁氏書取徑不同。

中國文學史撰著很多，較重要的，有胡適先生的白話文學史，見解極有獨到之處，惜未全部完

成。陸侃如、馮沅君二先生合撰的中國文學史簡編，雖簡單而不漏。陸、馮二先生更合撰有中國詩史，頗稱詳備，為此類書的創作。

鄭振鐸先生亦有中國文學史，與其文學大綱相輔而行，亦至詳備精到。

郭紹虞羅根澤兩先生各有中國文學批評史二書均尚未完成。郭先生書僅出上册。羅先生書亦僅有前一二册，至隋唐五代而止。現在戰事告終，舊業可復，知必有以慰吾人之望。

史學史有金毓黻先生的中國史學史，敘述詳盡。

關於科學史，有錢寶琮先生的中國算學史，李儼先生的中國算學小史，陳邦賢先生的中國醫學史；而竺可楨先生對於中國歷史上氣候的研究，李儼先生對於中國舊算學的研究，尤有貢獻。

關於政治史，有曾資生先生的中國政治制度史，已出四册，至隋唐部分，極為翔實。

關於外交史，有張忠紱先生的中華民國外交史。書僅出第一册，由辛亥革命（一九一一）敘至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一）而止。

第四節　斷代史研究的成績

通史的寫作，非一個人的精力所能勝任，而中國歷史上需待考證的問題又太多，因此最好的辦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斷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於某一個時代，作專門而精湛的考證論文，如是方可以產生一部完美的斷代史，也更可以產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中國歷史的斷代，普通都分為古代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遼金元史，明清史，

民國史。本書除古代與元代及民國史另有專章敍述外，其餘的都在本節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關於秦漢史的研究，以勞幹先生的成就為最大，所發表的論文如兩漢戶籍與地理的關係（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五本二分），兩漢各郡人口增減數目之推測（同前）漢代奴隸制度輯略（同前五本一分），從漢簡所見之邊郡制度（同前八本二分），漢代兵制及漢簡中的兵制（同前十本一分）兩漢刺史制度考（同前十一本一二分），漢簡中的河西經濟生活（同前）漢代社祀的源流（同前）兩關遺址考（同前十一本三四分）俱極精審，發前人之所未發。勞先生對於漢簡的研究，其成就亦極大，居延漢簡即是全部由其釋文而出版的。考證兩卷，推論兩漢邊塞制度，粲然如在目前。

楊樹達先生對兩漢史實極為專精，有漢書補注補正六卷，為王先謙書的功臣。其論文有兩漢婚喪禮俗考，兩漢喪葬制度考（清華學報四卷一期）考證均極精確。

孫毓棠先生的兩漢史研究多偏重在制度史和經濟史方面，其論文有：西漢的兵制（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五卷一期），東漢兵制之演變（同前六卷一期），漢代的交通（同前七卷一期）漢代的農民（今日評論一卷十六十七兩期）

錢穆先生則偏於文化史與學術史的研究，其論文有：劉向歆父子年譜，兩漢博士家法考（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二卷一期）。

史念海先生則偏重於地理與交通的研究，其論文有西漢侯國考（禹貢四卷二期，）西漢燕

代二國考（同前七卷八九期，）秦漢時代國內之交通路線（文史雜誌三卷一、二期。）他所畫的「西漢地圖」一業已完成，凡五十幅。

譚其驤先生在沿革地理及內地移民史等方面的成就都很大，而其關於漢代的論文，如新莽職方考（在二十五史補編內）漢百三郡國建置之始考（地學雜誌二十二年第二期），亦均貫串史實，可成定論。

漢簡除居延所發見的外，更有敦煌漢簡，這是在敦煌漢塞所發見的。這一批簡牘的考釋，自然以法國沙畹博士有鑿空之功；但沙氏誤釋的地方太多，遠不如王國維的流沙墜簡考釋。王氏的屯戍叢殘考釋，對於兩漢邊塞制度的考證，大致都極精確。他更有漢魏博士考三卷，亦稱精審。敦煌簡，賀昌羣先生有流沙墜簡校補一文，對於王氏的考釋間有補正的地方。賀先生更有烽燧考（中央大學文史哲季刊一卷二期）所考定的雖不限於漢代，但所用的材料大部分是居延漢簡與敦煌漢簡。

此外呂思勉先生有秦漢史一書，尙在印刷中，爲極偉大的新式斷代史。

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以陳寅恪先生的貢獻爲最大，其所發表的論文有：桃花源記旁證（清華學報，）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三本四分）東晉南朝之吳語（同前七本一分，）讀洛陽伽藍記（同前八本二分，）魏書司馬叡傳江東氏族條釋證及推論（同前十一本一二分，）讀哀江南賦（清華學報十三卷一期。）魏晉、南北朝的歷史向來研究者甚少，荊

榛滿目。陳先生以謹嚴的態度,豐贍的知識,作精深的研究,殆爲斯學的權威。

周一良先生對於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貢獻之多,僅次於陳寅恪先生,其論文有北魏鎮戍制度考(禹貢三卷九期)南朝境內之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七本四分,)論宇文周之種族(同前。)

王伊同先生有五朝門第二册,排比史料,詳實之至。

隋唐五代史的研究,亦以陳寅恪先生的貢獻爲最大,他撰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册。二書對於唐代政治的來源及其演變均有獨到的見解,爲近年史學上的兩本鉅著。其他論文尚有連昌宮詞箋證(中國文化彙刊第四卷上册)秦婦吟校箋(清華學報)武曌與佛教(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五本二分)李德裕貶死年月及歸葬傳說考辨(同前)李唐武周先世事蹟雜考(同前六本四分,)李唐氏族之推測(同前三本一分)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同前三本四分)三論李唐氏族問題(同前五本二分。)

岑仲勉先生治唐史用力最勤,創獲亦多,陳先生而外,當推岑氏。著有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見史料與史學)補唐代翰林兩記(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十一本三四分)足與勞格,徐松的書並駕。其他論文尚有登科記考訂補(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十一本一二分)唐集質疑,讀全唐詩札記,讀封氏聞見記,跋唐摭言,續勞格讀全唐文札記,論白氏長慶集源流並評東洋本白集,白氏長慶集僞文,白集醉吟先生墓誌銘存疑,從金澤圖錄白集影頁中所見文苑英華辨證校白氏詩文附按,

幽京新記卷二殘卷復原。惜除第一篇外,餘文均隨歷史語言研究所其他書刊淪於香港。

此外羅振玉有唐折衝府考補一卷唐折衝府考補拾遺一卷。羅氏此書蓋係補勞經原的唐折衝府考,谷霽光先生更有唐折衝府考校補一卷(在廿五史補編內)均極精審。

宋遼金元史的研究,除元史在後面有專章外,這裏先敍述宋史研究的成績。宋史成於元末,最爲蕪雜,明清兩代欲爲之改作者極多,或其書未成,或已成而不饜人望。鄧廣銘先生年來取兩宋各家類書史乘文集筆記等,將宋史各志詳校一遍,所費的力量不小,所成就亦極大。其宋史職官志考證已刊於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中。更有岳飛韓世忠年譜,陳龍川傳及論文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故事考釋(眞理雜誌一卷一期)宋太祖太宗授受辨(眞理雜誌一卷二期)宋史許及之王自中傳辨正(同前一卷四期),宋史的研究,鄧先生實有篳路藍縷之功。

張蔭麟先生亦專攻宋史,惟英年早逝,不克竟其全功,但就所發表的論文看來,其成就已很大,僅次於鄧廣銘先生而已。其論文有南宋亡國史補(燕京學報第二十期)順昌戰勝破賊錄疏證(清華學報第十三卷一期)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文史雜誌一卷七期)宋太宗繼統考實(同前一卷八期)。

遼金史的研究,以陳述傅樂煥兩先生的成就爲最大。陳先生有遼文匯遼史補注之作,其他論文尙有阿保機與李克用盟結兄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測(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七本一分)曳落河考釋及其相關諸問題(同前七本四分)契丹世選考(同前八本二分),頭下考(同前

八本三分，）頭下釋義（東北集刊一期，）契丹女眞漢姓考（同前二期，）所論均極詳確。更有遼國聞見雜錄，似尚未刊行。傅樂煥先生有春水秋山考廣平淀考附夏捺鉢考，四時捺鉢說論，遼史遊幸表證補駁池內宏「混同江考」兼論遼史天祚帝紀的來源（並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十本一分，總名遼代四時捺鉢考五篇。）更有宋遼聘史表稿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十本三分，均極精審。

馮家昇先生對於遼史研究的貢獻亦大，有遼史源流與遼史初校一書。其他更有太陽契丹考釋（史學年報第三期，）契丹祀天之俗與其宗教神話風俗之關係（同前第四期，）遼金史地理志互校（禹貢一卷四期。）

此外譚其驤先生有遼史訂補三種（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二集，）張亮采先生有宋遼交聘表，用力俱甚勤。

金史陳述先生有金史氏族表初稿，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五本三分及四分。復有金國聞見雜錄，似尚未刊行。

關於明史的研究，以吳晗、王崇武二先生的貢獻爲最大。吳先生有明太祖一書，爲明太祖的傳記，敍述生動而翔實。更有元帝國之崩潰與明之建國（淸華學報十一卷一期，）明成祖生母考（同上十卷三期，）明代靖難之役與國都北遷（同上十卷四期，）十六十七世紀的中國與南洋（同上十一卷一期，）明敎與大明帝國（淸華學報十三卷一期）等文。王崇武先生有明代的商屯制度（禹貢五卷十二期，）明初之田兵與堡塞（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八本三分，）論明太祖起

兵及其策略之轉變（同前十本一分。）李晉華先生致力明史有年，用力極深，有明史纂修考。更有其他論文，如明代遼東歸附及衛所都司建置沿革（禹貢二卷二期）明懿文太子生母考（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六本一分，）明成祖生母問題彙證（同前，）明史德王府世系表訂誤（同前八本二分，）均精確。黎光明先生對明史用力亦極勤，有嘉靖禦倭江浙主客軍考，鉤稽排比，至爲精當。此外朱慶永先生著有明末遼餉問題，刊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報第四卷，也很詳盡。

南明史的研究，由於民族主義思想的刺激，在清末時，對於史料的收集與研究，已經有人着手，劉師培及鄧實皆欲作後明書而未成，師培書已由章炳麟預爲之作序。最近則以朱希祖先生用力最深。朱氏藏南明珍秘史料極多，曾在中央研究院院務月報二卷七期上發表其編纂南明史的計劃，惜其書未成，僅有論文：明季史籍五種跋文（燕京學報第三期，）南明史籍跋文（圖書月刊二卷四期。）謝國楨先生對於晚明史料的搜求，亦費苦心，有晚明史籍考，著錄完備。還著有明末社黨運動考一書。

明列朝實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着手校訂，以北平圖書館所藏的內閣大庫本爲底本，與該所所藏的廣方言館本，北京大學所藏的明鈔本兩種校訂，其事已完成，更復與嘉業堂明鈔本及抱經樓本校勘，前後幾費時十載，此項工作對於明史研究有極大的貢獻。

查繼佐罪惟錄一書，實無異於莊廷鑨之明史，其鈔本原藏吳興嘉業堂，張閬聲先生爲之校正，商務印書館印入四部叢刊三編，予治明史者以極珍貴之史料。

清史的研究，以孟森及蕭一山先生的貢獻爲最大。孟氏的貢獻在清初及清人開國前歷史的研究，有八旗制度考實（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六本三分）清初三大疑案考實，香妃考實。其成就最大的，則爲明元清系統紀。「明元」謂明代的紀元，「清系」謂清代的世系，「明元清系統紀」卽是以明代的紀元敍清代的世系。清人肇基於明初，本爲明朝的屬夷，至太祖努兒哈赤猶身自朝明廷三次。清代對此種史實均極力爲之隱諱，孟氏蒐輯羣籍，更旁及外國史料，作爲長編，期以補明清兩史的闕漏，兼發清人隱諱的痕迹。其書初名清朝前紀，後方易今名。清朝前紀已由商務印書館爲之刊行，增補以後，亦已出版前編四卷，正編十五卷，至嘉靖三年爲止。孟先生更有心史叢刊三册，其中所收論文，均能復現已亡失的史實。

蕭一山先生致力清代史事二十餘年，有清代通史（上中兩册，）清史大綱，清代學者著述表，曾國藩等書。民國八九年間，日人稻葉岩吉的清朝全史譯本頗流行，其觀點極爲荒謬，蕭先生乃發憤爲清代通史，先後出版上中兩册，約一百二十萬言，下册亦有初稿流傳。清史大綱一册則本其民族革命史觀，作簡略的敍述，可與通史相輔而行。

太平天國史的研究，以簡又文、羅爾綱兩先生的貢獻爲大。簡先生有太平軍廣西首義史一册。他對於太平文獻向極留心，往年曾擬作太平天國全史，此書卽爲其第一部，由洪秀全的出身及革命運動的醞釀敍至馳驅八桂，共七卷四十二節，體例詳明，取材豐富，爲太平天國史的傑作。除此書外，更有太平天國雜記。太平天國雜記二輯金田之遊及其他，所收論文均精，其中且有新史料不少，

如韓山文的太平天國起義記，金田之遊，蒙山采訪記等。

羅爾綱先生有：太平天國史綱。羅先生是廣西人，對於太平天國革命的史實，從小就聽得十分清楚，此書剪裁得當，爲簡單而扼要的一本太平天國全史。此外更有：金田起義前洪秀全年譜，洪秀全，太平天國史叢考，湘軍新志。年譜敍至洪秀全金田起義時爲止。據羅先生自己說，永安建國，南京建都，及在洪秀全領導下縱橫中國十五年的太平軍苦戰史蹟，非年譜的體裁所能範圍，擬另撰一太平天國全史。甚盼羅簡二先生的全史均能早日殺靑問世。太平天國史叢考中所收的論文，如洪大泉考，黃畹考，均精確無可移易。湘軍新志主要在說明湘軍的制度及清代軍制的轉變，但湘軍的興起與太平天國的滅亡，關係極密切，故也列在此地敍述。

蕭一山先生對太平天國史亦注意特深，其所集的太平天國叢書一二集中，所收史料，均有極精到的跋語，爲很好的太平天國史論文。

此外謝興堯先生有：太平天國史事論叢，太平天國叢書。後書中所收的太平天國詩史，費力至深。又郭廷以先生有太平天國曆法考訂，亦爲極費功力之作。

第五節　沿革地理的研究與成績

沿革地理在清代是一門特別發達的學問，從顧祖禹一直到楊守敬，著作特別多，貢獻也絕大；但民國成立以後却慢慢的衰落了。民國廿三年，顧頡剛與譚其驤先生有鑒於此，在北平創辦禹貢學會，並從是年三月一日開始發行禹貢半月刊。在發刊詞裏曾經提到禹貢學會的具體工作計劃，第

一個計劃是想把沿革史中間的幾個重要問題研究清楚，從散漫而雜亂的故紙堆中整理出一部中國地理沿革史來；第二個計劃是要把研究的結果用最新式的繪製法，繪成若干種詳備精確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圖；第三個計劃是要廣事搜羅所有中國歷史上的地名，一一加以考證，用以編成一部可用，够用，又精確而詳備的中國歷史地名辭典；第四個計劃是要完成清人未竟之業，把每一代的地理志都加以一番詳密的整理；又地理書籍中往往具有各種文化史料，例如各正史地志什九皆載有州郡戶口物產，爲最好的經濟史料，州郡間有詳其民戶所自來的，爲最好的移民史料，故其第五個工作是要把這些史料輯錄出來，作各種專題的研究。禹貢半月刊一直出到第七卷，到七七抗戰發生方纔停刊。這七卷之中，且出了若干專號，有利瑪竇世界地圖專號，回教與回族專號，康藏專號，後套水利調查專號，東北研究專號，西北研究專號，南洋研究專號，古代地理專號。對於上面提到的五個計劃，在這七卷半月刊中也部分的作到了。

關於古代沿革地理的書籍，如禹貢，職方，山海經，穆天子傳，都有專題的研究。關於水經注，有賀次君先生的水經注經流支流目。

關於各史地理志的整理，有王振鐸漢書地理志水道與說文水部水道比較表（二卷三期），李子魁漢書地理志中所記故國及都邑（一卷四期）侯仁之漢書地理志中所釋之職方山川澤寖（一卷五期），姚師濂華陽國志晉書地理志互勘（二卷四期）譚其驤補陳疆域志校補（五卷六期，十期）史念海兩唐書地理志互勘（三卷二期至三卷九期），聶崇岐宋史地理志考異（一

卷八期至三卷五期，）王育伊宋史地理志夔雲兩路集證（三卷七期，）譚其驤遼史地理志補正（一卷二期，）馮家昇遼金地理志互校（一卷四期，）譚其驤清史稿地理志校正（一卷二期，九期。）

關於中國地理沿革史的寫作，顧頡剛與史念海先生合撰了一部中國疆域沿革史。

沿革地理的研究，以錢穆譚其驤二先生的貢獻為最大。

錢先生的研究偏重於古代部分，有史記地名考及周初地理考（燕京學報第十期，）古三苗疆域考（同前十二期，）楚辭地名考（清華學報九卷三期）黃帝故事地望考（禹貢三卷一期，）戰國時宋都彭城考（同前三卷三期，又見先秦諸子繫年考辨）中國史上之南北強弱觀（同前三卷四期）等論文。

譚其驤先生的研究則遍於沿革史各部分，有：漢百三郡國建置之始考（地學雜誌廿二年第二期，）新莽職方考（廿五史補編，）論兩漢西晉戶口（禹貢一卷七期，）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同前二卷一期，）元陝西四川行省沿革考（同前三卷六期，）釋明代都司衛所制度（同前三卷十期）等論文。

蒙文通先生對古代沿革地理的貢獻亦很大，有古代河域氣候有如今江域說（禹貢一卷二期，）論古水道與交通（同前一卷七期，二卷三期，）赤狄白狄東侵考（同前七卷一二三合期。）犬戎東侵考（同前六卷七期）秦為戎族考（同前）等論文。

王庸先生則集中於中國地理學史的研究，有中國地理學史一書的撰述。

馮家昇先生則用其全力於東北史地的研究，有我的研究東北史的計劃一文，刊禹貢一卷十期。更有東北史中諸名稱之解釋（禹貢二卷七期）東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績（同前二卷十期），周秦時代中國經營東北考略（同前二卷十一期）漢魏時代東北之文化（同前三卷三期）述肅愼系之民族（同前三卷七期）述東胡系之民族（同前三卷八期）蠕蠕國號考（同前七卷八九合期）豆莫婁國考（同前七卷一二三合期），原始時代之東北（同前六卷三四合期）等論文。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擬作東北史綱，由傅斯年、方壯猷、徐中舒、蔣廷黻、蕭一山五先生合撰，今僅出傅先生所作的第一册。金毓黻先生也有東北通史之作，集材至多。他更有渤海國志長編二十卷。

日人爲了要侵略我國東北，對於我國東北邊疆史地的研究，近年來眞是不遺餘力，其研究所得的成績也有足供我們作參考的。東北民族在魏晉以後，往往乘中國之衰，崛起立國，鮮卑、契丹、蒙古、女眞等族，其史蹟都有專著可稽，獨粟末靺鞨所建的渤海國，向來沒人注意。唐代有張建章渤海國記三卷，已散佚，淸乾隆年間僅官撰的滿洲源流考和朝鮮韓大淵的海東繹史，曾有史料的搜輯，稍後朝鮮柳得恭著渤海考，才對渤海史事作有系統的研究。到最近二三十年日本、白鳥庫吉等編撰滿洲歷史地理，對渤海國的研究重新開創風氣，民國四年日本鳥山喜一有渤海史考之作，後四年我國唐晏便有渤海國志一書，民國二十年黃維翰又撰渤海國記三篇，始合中韓日三國方面的史料加以編著，到二十三年金毓黻的渤海國志長編出版，對於渤海國族的研究，可說已登峯造極，

所引我國書籍八十六種，朝鮮書十三種，日本書三十九種，確是一部偉著，只是體例上考證上還不免有可議之處，而史料的搜輯上還不免有疏漏的地方。

第六節　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成績

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是隨着社會革命運動而興起的，當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先後，社會主義勃興於中國，爲探索革命的正確前途，一般革命家都努力於中國社會經濟的研究，尤其是集中精力於社會經濟史分期的討論，這樣就產生了所謂「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在此以前，劉師培先生已有許多關於中國社會史的新見解，散見於其全部著作中。）

研究社會經濟史最早的大師，是郭沫若和陶希聖兩位先生，事實上也只有他們兩位最有成績。郭先生應用馬克思、莫爾甘等的學說，考索中國古代社會的眞實情狀，成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這是一部極有價值的偉著，書中雖不免有些宣傳的意味，但富有精深獨到的見解。中國古代社會的眞相，自有此書後，我們才摸着一些邊際。這部書的影響極大，可惜的是：受它影響最深的倒是中國古史的研究者，而一般所謂「社會史的研究者」，受到它的影響卻反不大，這是因爲當時的「社會史研究者」大部份只是革命的宣傳家，而缺少眞正的學者，所以郭先生這部偉著，在所謂「中國社會史的論戰」中，反受到許多意外的不當的攻擊。

陶希聖先生對於中國社會有極深刻的認識，他的學問很是廣博，他應用各種社會科學和政治學經濟學的知識，來研究中國社會，所以成就最大。他的著作繁多，較重要的有中國社會的分析，

中國封建社會史，南北朝經濟史（與武仙卿先生合作）等書。我們認為：郭先生的貢獻偏在破壞僞古史上，而陶先生的貢獻却在揭發整個中國社會史的眞相，雖然他的研究還是草創的，但已替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打下了相當的基礎。

陶先生爲集中力量研究起見，發起食貨學會，出版食貨半月刊，在這半月刊中發表文字的，除陶先生本人外，以全漢昇楊聯陞諸先生的貢獻爲多而重要。全先生有中國行會制度史，唐宋帝國與運河二書。

陶先生有周代的諸大族的信仰和組織，刊清華學報十卷三期，楊先生有東漢的豪族，刊清華學報十一卷四期，至於陶全二先生發表於食貨半月刊上的論文，有價值的很多，陶先生有五代的都市與商業（第一卷）五代的莊田（同前）王安石以前田賦不均與田戶改革（同前）十一至十四世紀的各種婚姻制度（同前）金代猛安謀克的土地問題（同前）十六七世紀間中國的採金潮（同前）齊民要術裏田園的商品生產（第三卷），元代長江流域以南的暴動（同前）北宋初期的經濟財政諸問題（第二卷），宋代的職田（同前）等文。全先生有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業（第一卷）宋代都市的夜生活（同前）清末西洋醫藥傳入時國人所持的態度（第三卷）等文。食貨半月刊中其他研究者發表的論文還多，雖然瑕瑜互見，然其貢獻已不少了。

蒙思明先生對於中古社會經濟史亦很有研究，所著有元朝的社會階級制度，最近復完成了魏晉南北朝的社會一書，精審詳博，較前書爲尤善。

齊思和先生最近對於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研究得很有成績，已發表的有封建制度和儒家思想（燕京學報二十二期）戰國制度考（同上二十四期）尚有中國封建制度考一書未出版。李劍農先生有中國經濟史講義，似尚未刊行。鞠淸遠、王毓瑚二先生的中國經濟史料叢編，近正在搜輯中，全部完成之後，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必又有新的進展了。

專門刊載社會經濟史論文的定期刊物，除陶希聖先生的食貨半月刊外，更有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偏重於近代的研究，以湯象龍、梁方仲兩先生的成就爲最大。

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現尙在草創時期，最近的趨勢，似乎已經漸漸脫離宣傳革命的窠臼；而走上了研究學術的大路：在這點上，陶希聖先生的功績實在不可埋沒。以前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人，總把秦漢到淸末劃成了一個段落，現在已知道東漢以後至中唐以前，社會經濟也自成一階段，這個研究也以陶先生及楊聯陞、武仙卿諸先生之力爲多。與陶先生派別相近而有貢獻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家很多，不勝介紹，將來當另作一專文論之。（馬乘風先生有中國經濟史二册，自上古至漢代爲止，材料相當豐富，見解相當正確，亦爲此派不可多得之佳著。）

郭、陶兩派以外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者，人數更多，但有貢獻的却甚少，他們不但少有貢獻，有的人甚至於反使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走入了歧途，這班人實在夠不上稱爲學術研究者，只是政治上的宣傳家而已，在這裏恕我們不加贅述了。

第七節　舊形式史籍的撰述與整理

在這一節中,想把應用前期所用的方法而撰述的史籍,或整理的史料,如紀傳體的史籍,各史表志的補訂及正史的整理等著作,均包括起來;有的爲了便於敍述起見,在前幾節中已經提到了。這些史籍,在形式上雖然是傳統的,但在內容上有的卻已經超過了前期,其所以歸在此節敍述者,不過僅爲分節的方便而已。

清史稿五百三十四卷。此書經由衆手,於重要史料均未寫日,而議論又頗荒謬,今政府已予査禁。

徐世昌著有清儒學案。清學案舊有唐鑑書,已見前編,茲不贅論。徐氏此書,自較唐書爲博,然由衆手所成,論斷亦多可議,殊不足以語於著作。近錢穆先生復有清學案之作,其書一出,唐徐二家書自然可廢,聞已在刊印中。

朱文鑫史記天官書恆星圖考一卷,陶元珍三國食貨志,三國志世系表補遺一卷附訂譌,羅振玉補宋書宗室世系表一卷,聶崇岐補宋書藝文志一卷,陳述補南齊書藝文志四卷,臧勵龢補陳疆域志四卷,羅振玉魏書宗室傳注六卷,谷霽光補魏書兵志一卷,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這許多著作,均係對正史的表志等有所補訂。

張森楷史記新校注一百三十卷,廿四史校勘記三百廿卷,通史人表二百四十八卷。史記新校注,爲張氏一生精力所聚,甫成定稿而卒。此書薈萃衆本,復詳加校勘,訂正譌誤,折衷異同,均極精審。

史記校注前此有日人瀧川龜太郎的史記會注考證，去取不精，刪裁失當，無足觀取。張氏此書，甚盼能早日刊行。

陳垣先生有：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卷。薛居正五代史，自歐陽修書出後逐漸湮沒。清乾隆時求其書不得，乃從永樂大典及諸類書中輯出。陳先生這一本書，即據此輯本而溯其源始，方見其中多改竄的痕迹，如忌虜，忌戎，忌蕃，忌酋，忌僞，忌賊。經過此番工作，知道清政府改竄舊典的事，在薛氏五代史輯本中亦甚多。

關於古史史料整理的，有于省吾先生的：尚書新證四卷，詩經新證四卷。于先生利用其古文字學的知識，對詩書兩經的新解不少，當爲孫詒讓以後的第一人。又鍾鳳年先生有：國策勘研一書，雖比不上金正煒的國策補釋，但對戰國策也有所貢獻。錢穆先生的先秦諸子繫年考辨，雖名爲先秦諸子的年代作考辨，而其中對古本竹書紀年的研究，於戰國史的貢獻特大。

第二章 甲骨文字與金文的研究

第一節 「契文舉例」與「殷虛書契考釋」

甲骨文發見以後，不久卽有劉鶚的「鐵雲藏龜」出版，著錄甲骨文字一〇八五片。孫詒讓乃據此一小部分史料，撰爲契文舉例二卷。孫氏對於金文本有很高深的研究，此書發明頗多，雖以後新史料大量增加，不少地方須加改正，但有許多仍然是成爲定論的。

羅振玉繼劉鶚之後，收藏甲骨文極多，所著初有殷商貞卜文字考一卷。此書分考史，正名，卜法，餘論四部分。其後又撰成殷虛書契考釋一卷，其目分爲都邑，帝王，人名，地名，文字，卜辭，禮制，卜法。這是甲骨文發現以後的第一部名著，無論考史釋字，俱有很大的發明。後有王國維序，對此書舉揚備至。或謂卽爲王氏所作，而以五百金售之羅氏的。振玉更有殷虛書契待問編一卷，和釋叔釋宠，與林浩卿博士論卜辭王賓書，與王靜安徵君論卜辭上甲書，俱頗有發明。

第二節 王國維郭沫若等的研究與貢獻

甲骨文字的研究，自從王國維先生以後，產生了一個劃時代的革變，這個革變便決定了甲骨文字這新史料在史學研究上的地位，使已茫昧的商代歷史呈現了新的光明，更使以後研究殷商史的人，不得不以甲骨文字爲唯一可靠的史料。王氏所著有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

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周制度論，釋昱，釋旬，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殷禮徵文，古史新證。王氏研究甲骨文字的貢獻，主要的是在證史。例如先公先王考對於殷代世系的考證多數精確；王氏據甲骨文證王亥爲殷之先祖，謂天乙是大乙之誤，史記殷本紀報丁，報乙，報丙之次，當爲報乙，報丙，報丁之誤；又從甲骨文和楚辭證明王亥的弟弟叫王恆，都確不可易。殷周制度論與殷禮徵文對於殷代禮制的探討及殷周制度的異同，亦均發千古之祕。古史新證爲王氏在清華研究院的講稿，集其對古史研究的菁英而成，也是初學研究古史的一部好書。

那時研究甲骨文的，除羅振玉、王國維外，異軍特出的有葉玉森，葉先生曾有殷契鉤沈、說契等文，刊學衡雜誌，遺稿有殷契書契前編集釋，已刊印。

王氏死後，在甲骨文字研究上，能承繼他的，是郭沫若先生。郭先生的成就主要的在殷商史迹的探討，有甲骨文字研究二卷，卜辭通纂考釋三卷，卜辭中之古代社會（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及殷周是奴隸社會考，古代社會研究的自我批判。其中卜辭通纂尤集郭先生研究成績的大成。

郭先生更有殷契萃編考釋；這書乃從劉體智所藏甲骨擇取十一得一五九五片而成。它的考釋中，也有許多新見，例如日的出入有祭，足證堯典「寅賓出日」「寅餞入日」之爲殷禮，鳳爲風，步有方位，足徵殷人神話的殘痕。此外，郭先生在古代銘刻彙考和續編中也有不少新見解。

商承祚、吳其昌諸先生對甲骨文的研究，大體上是繼承王國維先生的，都很有成績。但吳其昌先生的卜辭所見先公先王三續考（刊燕京學報十四期）什麼「帝立」「王侯」等的考證，未

免有些鑿空。商承祚先生的殷商無四時說（清華周刊文史專號，）也不足爲定論。

第三節　甲骨文斷代研究的發見與文字考釋

甲骨文所包括的時代，自然是從盤庚遷殷到帝辛滅亡二百七十三年的期間。但在這許多年的史料中，某一片應爲某王貞卜的甲骨，假如無從斷定，則其史料價值當減低不少。甲骨文的斷代，在甲骨文字研究上，是最重要的事，而且是刻不容緩的。這一個渾沌終於給董作賓先生鑿破了。董先生最初僅將甲骨文分爲五個時期，最近更進而分爲十四個時期，因此一片甲骨文在手，即可知其應屬於那一個王在何年何月何日所卜。這一個發現，不惟在甲骨文研究上須劃一新的時代，而且從史學上看來，眞是其功不在禹下。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次的殷墟試掘，即由董先生所主持，其後十四次發掘亦大半參加。他根據發掘的經驗及研究的心得，撰爲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刊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上：）其斷代標準凡十：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由此而分爲五個時期：第一期：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廩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此文中所持的標準均極精確，尤以用「貞人」來分辨爲一絕大的發明。除此外，董先生更有商代龜卜之推測（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獲白麟解（同前第二期，）卜辭中所見之殷曆（同前第三期，）大龜四版考釋（同前，）釋駁癹（同前第四期，）殷曆中幾個重要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四本三分，）骨文例（同前七本一分，）五等爵在殷商（同前六本三分。）此後董先

生乃專從事於古代曆法的研究，積十年之力，撰成殷曆譜十四卷。此書博大精深，對於甲骨文及殷商史的研究已經發展到很高的階段。關於殷代曆法劉朝陽先生更著有殷曆質疑（刊燕京學報第十期）

甲骨的文字考釋，以唐蘭先生的貢獻為最大。他有古文字學導論，殷虛文字記，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唐先生在古文字學上所用的有兩個方法，一是自然分類法，一是偏旁分析法。這兩個方法是由唐先生所發現，前者打破了許慎說文解字所用的分類方法，後者對於文字的認識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由這一個方法，許多不認識的字都可以認識，而其準確性亦極大。

丁山先生在文字考釋上的貢獻也很大，有釋疾（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本二分），釋夢（同前），釋蒙（同前），殷契亡尤說（同前一本一分），宗法考源（同前四本四分）等文。

陳夢家先生的研究，主要的在商代的宗教神話與制度，但對於釋字也有很多的發明。其論文有釋丹（考古社刊第五期），釋做釋豕（同前第六期），史字新釋（同前第五期），史字新釋補證（同前），隹夷考（禹貢半月刊五卷十期），射與郊（清華學報十三卷一期），祖廟與神主的起源（文學年報第三期），古文字中的商周祭祀（燕京學報十九期），商代的神話與巫術（同前二十期）

徐中舒先生在甲骨文上的成就，偏重在商史，有殷周史料考訂大綱對於文字的研究有皇王士三字之探源（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四本四分）可謂直探奧祕。

胡厚宣先生初曾與董作賓先生合編有甲骨年表，最近復有甲骨學商史論叢二集，以其勤勞，頗有貢獻。尤以釋四方風名一篇爲善。

第四節　金文的研究與斷代

金文的研究，在清代已經萌芽，到了吳大澂與孫詒讓出來，結束了前期的研究，對後期又開闢了一條大道。吳孫二氏在金文的研究上，可以說有承先啓後之功。

第一個能夠承繼吳孫二氏的研究而爲之發揚光大的，是王國維先生，他有古禮器略說，觀堂古金文考釋（所考釋的有毛公鼎，散氏盤，不嬰敦，盂鼎，克鼎）周莽京考，邶伯鼎跋，散氏盤跋，克鐘克鼎跋，鑄公簠跋，遹敦跋，生霸死霸考，鬼方昆夷玁狁考。王先生諸文，如言地理，諡法，民族，曆法，多極精確。

容庚先生有金文編，編錄殷周金文，凡收一萬六千六百七十二字，這是金文類編的大成。但釋文還不免有許多可商之處。容先生還有殷周禮樂器考略，殷周銅器考。他對於銅器的分析和研究有很精到的地方。

全盤整理存世銅器銘文而爲之總結的，有郭沫若先生及吳其昌先生二人。郭先生有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五冊，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三冊。吳先生有金文曆朔疏證二冊，金文疑年表一卷。郭先生所用的方法，根據器銘本身所表現的時代，然後再根據器物花紋人名地名等，輾轉互證。由這個方法，於西周文字得其年代或近似的凡一百六十二器，此爲上編；下編則爲列國遺物，以國爲別，

其中亦貫以年代，得列國的文字又一百六十一器，大抵在時代上屬於東周。圖錄分圖編與錄編，前有「彝器形象學試探」一文，爲研究銅器花紋形制的第一篇文章。郭先生這種方法完全是受日人研究銅鏡的影響，日人研究銅鏡，先把有紀年的鏡作根據，以爲各時代的標準器，再由此標準器的形式花紋和銘文字體分類研究，這樣銅鏡的系統便確立了。日人對我國銅鏡的研究便因此得到很完美的成績。吳先生所用的方法，則專據銘文的年月曆日用劉歆的三統曆來推步，其書除曆朔疏證及疑年表外，更有人器經緯表，王號表，諸侯王表，重見人名表，重見史臣表，王在王格表。他所斷定的遠不如郭先生的可靠，郭先生曾論專據後代曆法推步銅器銘文的不足信，認爲學者如就銅器銘文的曆朔相互的關係來恢復殷周古曆，再據古曆作標準來校量其他，就可靠了。但在目前所得的資料，還不足以這樣的研究。後來高本漢(Karlgren)著殷周銅器論，認西周月有四分：即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西周銅器銘文常見四分的名稱，而東周銅器，在六十六器中僅有一器銘文有既生霸，五十五器中二十六器銘日的，都稱丁亥，因此他懷疑東周銘文日用丁亥是一種風習，如同漢代銅鏡，無論這月內有沒有丙午，一律稱丙午一樣，所以用曆法來推算銅器銘文的年月是不可靠的。他更進一步把西周銅器分爲兩期，穆王以前爲前期，以後爲後期，根據若干標準器的花紋形制和字體來辨別銅器的年代，據其研究的結果，前期得七十七器，後期得七十五器，無圖錄而銘文屬於西周的二十八器，無法決定的有二十九器，這又是種另闢蹊徑的研究方法。

郭先生的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不但是一本有系統考證金文的著作，也是本通釋金文的佳

作，除此以外，于省吾的雙劍誃吉金文選，也是本通釋金文的名著。

郭先生除上列二大作外，更有金文叢考，金文餘釋之餘，金文續考（在古代銘刻彙考內，）古代銘刻彙考續編，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所論都有獨到的地方。吳其昌先生對於金文本有一個很大的計劃，擬作金文曆朔疏證（年表附，）金文方國疏證（地圖附，）金文世族疏證（系附譜，）金文名象疏證（字典附，）金文習語疏證（韻表附，）金文職官疏證，金文禮制疏證。惜除曆朔疏證外，僅成金文世族譜，金文名象疏證兵器篇四卷，其餘都未成書，就作了抗戰中的間接犧牲者了。

徐中舒先生對於金文亦有極深邃的研究，所涉範圍甚廣，其成就僅次於郭沫若先生而已。他有陳侯四器考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三本四分，）說尊彝（同前七本一分，）狩獵圖象考（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等文。

丁山先生的研究，在晚周銅器方面的成就最大，所斷定的時代均極可信，有簷太史申鼎跋（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第四期，）齊叔弓鏄銘跋（同前，）班毀銘跋（同前，）楚公逆鏄銘跋（同前，）陳騂壺銘跋（責善半月刊二卷六期，）何趞其夷戈銘跋（文史雜誌第三卷一二合期。）

陳夢家先生唐蘭先生的研究也有相當的貢獻。陳先生有禺邗王壺考釋（燕京學報廿一期，）陳口壺考釋（責善半月刊二卷廿三、四期。）唐先生有葊京新考（潛社史學論叢第一期，）古樂器小記（燕京學報第十四期。）

銅器著錄的有通檢，始於王國維先生的宋代金文著錄表，清代金文著錄表，繼之有容庚先生

的西清金文眞僞存佚表,羅福頤先生的三代秦漢金文著錄表,內府藏器著錄表,最近又有福開森先生的歷代著錄吉金目。王容羅三先生的著作,都只限有銘之器,不錄釋文,福開森先生的著作,搜羅最廣,收書達八十種,並及無銘之器,並附錄釋文,很便檢閱,都比前此各表爲勝。可是福開森先生對於同銘而不同器的,往往混而爲一,且不免有張冠李戴之處,對於辨僞也未下工夫,所以還不能使人滿意。

第五節　銅器的收藏與結集

在本期中,銅器的收藏者,除公共機關外,私人所藏以羅振玉及劉體智二人爲最多。羅氏編有:貞松堂集古遺文十六卷,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三卷,貞松堂吉金圖三卷,夢郼草堂吉金圖三卷,續編一卷,殷文存二卷,三代吉金文存。其中所錄以羅氏私人所藏的爲最多。劉氏有小校經閣金文十八卷,善齋吉金錄二十八卷,善齋彝器圖錄(容庚先生所編)。

容庚先生及于省吾先生亦各有所藏,容先生有:頌齋吉金圖錄,著錄的均爲其私人所藏。更編有寶蘊樓彝器圖錄,所著錄係盛京舊物,今藏北平古物陳列所。復有武英殿彝器圖錄,則係著錄熱河故宮之物。于先生有雙劍誃吉金圖錄二卷,著錄其私人所藏。

此外商承祚的十二家吉金圖錄,鄒安的周金文存六卷(附補遺),孫壯的澂秋館吉金圖,所集錄的均爲國內所藏。其藏於國外的已著錄者有容庚的海外吉金圖錄,濱田耕作的泉屋淸賞彝器部三册續一册,梅原末治的白鶴吉金集(以上爲日本所藏),葉慈(W. Perceval Yetts)的猷氏吉

金錄(The George Eumor-popoulos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and Corean Bronzes)，寇氏吉金錄(The Cull Chinese Bronzes)，伯希和(Paul Peliot)的中國銅器集(Bronzes Antiques de la Chine)，梅原末治的歐美所藏中國古銅器捃華(以上歐美所藏)等。

第三章　元史蒙古史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第一節　元史蒙古史研究的成績

元史的研究，自錢大昕到洪鈞，中間有了很大的進步。及柯紹忞與屠寄出來，方獨力撰史，不像前此僅作片段的研究與整理。雖其間有魏源曾廉的元史新編與元書，但離理想的境界太遠，且在那個時候也還未達到撰史的地步。紹忞所撰爲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寄所撰名蒙兀兒史記，一百六十卷。紹忞書本紀二十六，表七，志七十，列傳一百五十四，共二百五十七卷，有鉛印本，木印本兩種，以民國十年所刊成的木印本爲定本。柯氏爲書費時達數十年，徐世昌爲總統時，下令使列於正史，增廿四史爲廿五史。寄書本紀十八，列傳一百廿九，表十二，志一，凡一百六十卷。內本紀缺一，列傳缺十一，表缺二，實一百四十六卷。此書初印本八册，後續增至十四册，最後印本則爲二十八册；各本的次第微有不同，自應以後印本爲定本。柯書體大思精，鎔鑄新舊史料，實集錢大昕以來研究的大成。近世學者多譏其書不注出處，但柯氏本自作有考異，以省費故未能刊行。謝一山先生曾親見原稿，皆引據出處，精審異常。屠書本未成，所用外國史料，均由其子孝實所譯，但孝實非蒙古史專家，如所譯乞迷亞可亭 (Jeremiah Curtin) 的俄羅斯之蒙古 (The Mongols in Russia) 及史學史 (History of Historians) 二書，皆無史料的價值。

陳垣先生對蒙古史鑽研極精，所著有也里可溫考，元西域人華化考，元典章。也里可溫考於耶蘇教在元代的傳佈狀況考證精博，又於也里可溫一名的語源亦有精當的解釋。元西域人華化考，考證回回，畏吾兒，波斯，印度的回教徒，耶教徒，摩尼教徒漢化的狀況，彌爲精博。

王國維先生在元史方面的成就亦甚大，不亞於其在甲骨文金文及漢簡研究上的貢獻，其所校注者有蒙韃備錄校注，黑韃事略校注，聖武親征錄校注，長春眞人西遊記校注，單篇考證有遼金時蒙古考，韃靼考，南宋時所傳蒙古史料考，元祕史主因亦兒堅考，蒙古札記。

陳寅恪先生和岑仲勉先生對於蒙古史亦有很高的成就。陳先生有彰所知論與蒙古源流（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二本三分），元代漢人譯名考（國學論叢二卷一號）。岑先生有拉施特七十二省之研究（聖心一期），蒙古史札記（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五本四分），元代天山南路置驛之今地（同前十本四分）諸篇。

馮承鈞先生和姚從吾先生對於蒙古史籍的翻譯，均有貢獻。馮先生譯有多桑蒙古史二册，蒙古史略一册。姚先生譯有蒙古史發凡（輔仁學誌一卷二期）。蒙古史的研究，最近以韓儒林先生的貢獻爲尤大，所著有突厥蒙古之祖先傳說（史學集刊第四期），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卷），蒙古答刺汗考（同前），元代闊端赤考（同前），成都蒙文聖旨碑考釋（同前第二卷），讀蒙古世系譜（中國文化研究彙刊第一卷）八思巴字大元通寶跋（同前第三卷）。

楊志玖先生近亦專攻元史，所作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文史雜誌一卷十二期，）實爲不易的定論。

第二節　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中外交通史的研究，本爲元史及西北地理的派衍，但所受的直接影響，却爲歐美漢學家的研究成績。這一項學問在中國本爲新興的，但在近數十年中，其成績的表現已頗爲驚人，在將來是一定可以駕歐美而上之的。

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以向達，岑仲勉二先生的貢獻爲最大。向先生有中外交通小史，中西交通史，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東方雜誌二十七卷一號。）岑先生有 Kinsay 乃杭州音譯（聖心第一期）Zaitun 非剌桐（同前，）唐代大食七屬國考（同前，）南海崑崙與崑崙山之最初譯名及其附近諸國（同前第二期，）諸蕃志占城屬國考（同前，）義淨法師年譜（同前）佛遊天竺記考釋，唐代戲樂之波斯語（東方雜誌四十卷十七期，）唐代最南大商港 AL-Wakin（同前二十期。）

陳垣先生的研究偏重在宗教方面，有火祆教入中國考（國學季刊一卷一號，）摩尼教入中國考（同前一卷二期，）回教入中國之史略（東方雜誌廿五卷一期，）中西回史日曆。

方豪先生的研究亦多係宗教，且在明清之際，有中國天主教史論叢，嘉靖間葡萄牙人在寧波被屠問題（以下俱見中外文化交通論叢，）明季西書七千部流入中國考（文史雜誌，）拉丁文

傳入中國考，浙江外來宗教史略。

馮承鈞先生和張星烺先生的貢獻多在史籍的翻譯。馮先生譯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四編，史地叢考三編，西突厥史料，交通印度兩道考，崑崙南海古代航行考，蘇門答臘古國考，所著有中國南洋交通史，王玄策事輯（清華學報四卷一期）樓蘭鄯善問題（輔仁學誌）。張先生輯有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六册，其中外國史料均自亨利玉爾（Henry yule）及亨利高狄埃（Henry Codier）的契丹及其通道（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中譯出，對於不識歐文的人便利不少；更著有中世泉州狀況（史學年報第一期），斐律賓史上李馬奔 Limabong 之眞人考（燕京學報八期）中國史書上關於馬黎諾里使節之記載（燕京學報三期）。

馮先生及張先生均譯有馬可波羅遊記，前者所譯的爲法人沙海昂本，後者所譯的爲亨利玉爾本及拜內戴拖本。惟亨利玉爾本僅刊印有第一册及導言。

黃文弼先生對西域史亦有極深湛的研究，著有高昌疆域郡城考（國學季刊三卷一期），樓蘭之位置及其與漢代之關係（史學年報三期）均發明不少。

姚枏先生，張禮千先生，許珏先生曾創辦中國南洋學會，對南洋史之研究貢獻不少。姚先生與許先生合作有古代南海史地叢考一册，所收論文有憍陳如王扶南考，緬王莽氏考，辨元成宗平緬考，鄭昭貢使入朝中國紀行詩譯註，黃金地考釋證，丹丹考，赤土考，古印度移民橫越馬來半島縱跡考察記，譯著並收，其中論文俱多精審。

第四章　俗文學史與美術史的研究

第一節　小說史的研究

中國小說向來是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其研究完全是由外來的刺激所引起。在歐美，小說是文學很大的一個部門；所以最初研究中國小說史的人，都是對於外國文學有很深湛的研究，如胡適及周樹人先生諸人。

胡適先生對於中國小說史的研究貢獻最大，在亞東圖書館所標點的著名舊小說的前面均冠有胡先生的考證，莫不有驚人的發現和見解。計有水滸傳考證，水滸傳後考，水滸傳續集兩種序，紅樓夢考證，跋紅樓夢考證，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吳敬梓傳，吳敬梓年譜，西遊記考證，跋四遊記本的西遊記傳，三國志演義序，鏡花緣引論，醒世姻緣傳考證，所論既博且精，莫不出人意外，入人意中。對於小說史作精密的研究，此為開山工作。

周樹人先生對於中國小說史最初亦有貢獻，有中國小說史略。此書出版已二十餘年，其中所論雖大半可商，但首尾完整，現在尚無第二本足以代替的小說史讀本出現。

鄭振鐸先生對於中國小說史的成就也極大，當為胡適先生以後的第一人。其論文有三國志演義的演化，水滸傳的演化，西遊記的演化，明清二代的平話集，巴黎國家圖書館中的小說與戲曲，

俱收入其所編中國文學論集及佝僂集中。

孫楷第先生的貢獻，則在中國小說史的目錄學方面，他有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附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等著作。

馬廉先生收藏中國小說極富，其論文有明代之通俗小說（孔德月刊二期）舊本三國演義板本的調查（北海圖書館月刊二卷五號。）

張政烺先生學問極爲廣博，即在小說史研究上亦有很高的成就，如所發表的封神演義的作者（獨立評論二〇九號）講史與詠史詩（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其見解均精確不易。中國小說史的研究雖已有相當的成績，但是還不會有大規模的探討。時局承平以後，這方面的研究，必將日趨興盛。因爲舊小說不但是文學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會史料，利用小說來考證中國社會史，不久的將來，必有人從事於此。

第二節　劇曲史的研究

關於劇曲史的研究，第一個有貢獻的，是王國維先生。他著有宋元戲曲史，是一本不朽的名著。有了這一本書，然後方有後此許多人的成就。在劇曲史的研究上，這一本書是有鑿空之功的。王氏除此書外，更有錄鬼簿校注二卷，唐宋大曲考一卷，戲曲考原一卷，古劇腳色考一卷，優語錄一卷，錄曲餘談一卷，曲錄六卷。都是極有貢獻的著作。

鄭振鐸先生的研究是多方面的，其有關劇曲的論斷多見於所著中國文學史中；論文有雜劇

的轉變（小說月報廿一卷，）傳奇的繁興（同前）等。

吳梅先生爲曲學大師，其研究不在史的方面，故此類論文極少。他著有元曲研究，顧曲麈談，南北曲簡譜等。

盧前先生爲吳氏的門人，得其所長；其在史的研究上，貢獻亦不多，著有明清戲曲史，簡單而極爲扼要。

馮沅君先生在劇曲史的研究上，偏重於劇場的結構，服裝及演出。在這一方面，馮先生的貢獻很大，有古劇四考（燕京學報二十期，）古優解；元明孤本雜劇鈔本題記。他另外還同陸侃如先生合輯有南戲拾遺。

錢南揚先生對劇場史亦極有研究，有宋金元雜劇搬演考（燕京學報二十期；）又輯有宋元南戲百一錄。其他輯錄宋元南戲及元人雜劇的，有趙景深先生的宋元戲文本事，元人雜劇輯逸。孫楷第先生亦有吳昌齡與雜劇西遊記（圖書季刊新一卷二期，）所論極爲精確。還有吳曉鈴先生對於劇曲史有很深邃的研究，如所發表的元曲作家生卒新考（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油印論文十四，）說旦（國文月刊，）均多精論。

元明雜劇以明代臧晉叔元曲選所著錄的爲最多；但臧氏對這些史料任意加以刪改之處亦很不少，使人不足以窺知其本來的面目。最近鄭振鐸先生在上海發見大批新的史料，爲明人趙琦美所鈔校共二百四十二種：元人著作凡九十二種，有二十九種爲人間孤本，其他的異文亦不少；明

人著作凡三十五種；其餘亦爲元明人所作，尚待詳細考證。這批史料，已由商務印書館開始影刊流行，名元明孤本雜劇。

第三節　其他俗文學史的研究

所謂俗文學，其範圍極廣，凡屬一切用口語寫作而明白易曉的，均應在其列。但鄭振鐸先生曾說，小說劇曲雖應屬於俗文學，然而本身太大，以之包括於俗文學中，殊覺不稱，應行析出。故此節所謂俗文學除小說劇曲外，其他一切口語文學的研究均包括其中。

胡適先生是白話文運動的開創者，對俗文學極有研究，除小說部分已在第一節敘述外，更有白話文學史上册，國語文學史；其中多論及俗文學，惜前書僅出上册而止。

鄭振鐸先生有中國俗文學史，上起先秦歌謠，下迄清代的東西調，所包甚廣，爲俗文學史一本劃時代的名著。

李家瑞先生專究中國俗文學，造詣甚深，曾與劉復合編中國俗曲總目稿，計所搜集的徧及河北、江蘇、廣東、四川、福建、山東、河南、雲南、湖北、安徽、江西共六千餘種。其所作論文更有打花鼓（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五本四分）說彈詞（同前六本一分）。趙景深先生亦有彈詞考證，大鼓研究等作品。

唐代俗講，爲俗文學中很大的一個部門，向達先生有唐代俗講考（文史雜誌三卷九十期）一文，研究精審。

研究歌謠是北京大學所發起的。自民國六年起，北大日刊上即逐日登載歌謠。後來研究所國學門組織歌謠研究會，發行歌謠週刊，雖時斷時續，而搜集編刊歌謠及其他民俗史料的風氣已造成。民國十六年，廣東中山大學亦組織民俗學會，發行民俗週刊，出版「歌謠」「諺語」「謎語」「婚喪禮」「進香」等册子數十種。

第四節　美術史的研究

美術史的研究，方今正在萌芽之中。美術是一種專門的技術，非內行人，是無法深究它的歷史的，而中國美術家，新的一派所學的是西洋的美術，對於本國的美術史，研究起來，當然有相當的困難；而舊派的美術家，又往往缺乏歷史的觀念和方法，所以中國美術史方面研究的成績，並不十分豐富。現在我們把中國美術史的研究分爲書畫、雕塑、建築、音樂四門來敍述，因缺乏參考的書籍，疏陋之譏，知所難免！

關於書法史的研究，著述極少，祇有幾篇零碎的論文，散見於各雜誌中，如東方雜誌二十七卷二號所載沙孟海先生的近三百年的書學，便算是較有系統的作品了。繪畫史方面的著述，則比較來得多，而且已有相當的成績。全史的著作有潘天壽、俞劍華兩先生的中國繪畫史，鄭昶先生的中國畫學全史，滕固先生的唐宋繪畫史，童書業先生的中古繪畫史（未刊）等，其中以中國畫學全史較爲完備，唐宋繪畫史和中古繪畫史較有見解。論文有陳師曾先生的中國人物畫變遷（東方雜誌十八卷十七號）滕固先生的關於院體畫和文人畫之史的考查（輔仁學誌二卷二期，）葉

季英先生的中國繪畫之骨法與輸入凹凸法（金陵學報二卷一期，）中國山水畫之南北宗（民族雜誌二卷九期，）童書業先生的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說辨僞（考古社刊四期，）重論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說兼答啓功先生（大美晚報文史副刊，）中國山水畫南北分宗說新考（齊魯學報二期，）沒骨花圖考（齊魯學報一期，）啓功先生的山水畫南北宗考（輔仁學誌），向達先生的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東方雜誌二十七卷一號）等。滕葉童啓四先生的論文解決了繪畫史上山水畫南北宗和花卉畫徐黃異體兩個大問題，較爲重要。

關於雕塑史的研究，顧頡剛曾在甪直保聖寺發現唐代楊惠之的塑像，經過詳細的研究，才知道這塑像已不是原蹟；但在雕塑史的研究上，仍極有價值，關於這方面，顧頡剛曾著有多篇論文，發表於小說月報及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等雜誌中。又趙邦彥先生有調查雲岡造像小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四分）一文，爲研究雕塑史必讀的著作。

關於建築史的研究，朱啓鈐梁思成諸先生在北平曾有營造學社的組織，其著作出版的，除中國營造學社彙刊以外，另有梁思成先生編著的營造算例，清代營造則例，和劉敦楨先生編著的牌樓算例等書；其已辦或已定的計劃，有山西大同及河北古建築的調查，清代建築年表的編輯，明代營造史料及圓明園史料之蒐集，對於建築史的研求，已有不少成績。

關於音樂史的研究，全史有王光祈鄭覲文兩先生的中國音樂史，孔德先生的外族音樂流傳中國史論文有劉復先生的從五音六律到三百六十律（輔仁學誌二卷一期，）呂氏春秋古樂篇

昔黃節解（文學雜誌，）賀昌羣先生的漢唐間外國音樂的輸入（小說月報二十卷一號，）邵茗先生的唐宋樂舞考（劇學月刊二卷十二期，）元明樂舞考（同上三卷四期，）清代樂舞考（同上三卷六期，）舞器舞衣考（同上三卷七期，）等，都有相當的貢獻。

以上幾門美術史的研究，以繪畫建築兩門爲較有成績，以書法史的研究最爲貧乏。希望國內專家對於各方面美術史的研究，加緊繼續努力，以便著作通史的人有材料可以採用。

第一節　古史研究興起的背景

最近二十多年來古史的研究，可說是當代史學研究的核心之一。當代的史學界中，有許多學者集中於古史的研究上，已得到了相當的成就，對於中古史以及近代史的研究，反而熱心較差。這種畸形的發展，可說是史學界不良的現象，但古代史是後此歷史的根源，不從根源着手，支流的眞相確也不易尋得，而且古史上的問題比較繁複，史料的搜集和批判比較困難，研究上所牽涉的各科學問也比較多，不分工合作是不易見效的，所以最近的歷史家分別對於古史作各種不同的研究也有他們的不得已的苦衷。

中國人向來有個「歷史退化觀」的謬見，以爲愈古的時代愈好，愈到後世便愈不行，這種觀念根深蒂固地種在每個國人的腦海中，使大家對於當世的局面常抱悲觀，而去幻想着古代的快樂。目前我國民族文化的不易進步，這也是一個大原因。海通以來，西洋的新科學和新史學輸入到中國，使國人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刺激，開始發現過去歷史觀念的錯誤，於是對古史傳說便漸漸開始懷疑了。

遠在清代中葉，大膽的崔述已經本其宋學的「衞道」精神和漢學的考據方法，把一部份荒

誕不經的古史傳說一筆削去，他所著的考信錄，眞是清代史學研究上的一部奇書，其目光的敏銳和史學方法的謹嚴，在近代的史學界上可說已發生了鉅大的影響，雖然他因爲限於時代，一切的研求還是不夠徹底。

到了清代後期，經今文學派興起，疑古的精神大熾，劉逢祿懷疑左傳，魏源懷疑毛詩和漢古文尚書，邵懿辰懷疑逸禮，都是懷疑古文經的先擧，等到廖平康有爲崔適等繼起，更大擧對古文經攻擊，而且又聯帶地懷疑到古史傳說上，認爲古史傳說多出諸子的創造，用來達到他們「託古改制」的目的的，這樣一來，「疑古」的學風便一發而不可遏了。

民國以來，西洋的治學方法和新史觀不斷的輸入，更予人們以莫大的啓示。胡適先生在北京大學講學，常根據他從西洋得來的治史方法，考證中國歷史上的問題，於是古代史的威信更爲搖動。顧頡剛等身逢其會，便開始提出古史上諸問題加以討論，「古史辨」便在這種情態之下出現了。

同時古金文和甲骨文的研究，在清末已發其端，到了民國時代，王國維先生首先利用這類考古學上的材料參酌了文獻來研究商周史的眞相，及門諸子和近世諸學者多能繼續他的精神不斷探求，於是古史的研究又開一新紀元，眞古史的骨幹也已漸漸豎立起來了。

要而言之，古史研究興起的背景是（一）史學上尋源心理的發達；（二）西洋的科學治學方法和新史觀的輸入；（三）清代中葉以來疑古學的漸次興起；（四）考古學的抬頭。

第二節　古書著作年代的考訂

研究史學，第一步的工作該是搜集史料和批判史料。研究古史，自然應該先把古書的著作年代弄清楚，使這些古書得到史料上適當的價值，所以這方面的工作頗為一般古史研究者所重視，至今也已得到了相當的成績。

最值得注意的，要算尚書各篇著作年代的考訂了。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中最先為人所懷疑的是金縢，程頤已認這篇非聖人之言，後來王廉、王夫之、袁枚都曾對此懷疑（袁枚著有金縢辨。）其次為人所懷疑的要算堯典禹貢了，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就認為堯典為孔子所作，不是堯舜時的實錄。顧頡剛在民國十二年答適之先生論今文尚書時代書中（收古史辨第一册）曾全盤討論到今文尚書的著作年代，認為這書各篇可分三組：

1 盤庚、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在思想上文字上都可信為真。

2 甘誓、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無逸、君奭、立政、顧命——文體平順，或為後世假作，或出史官追記，不過決是東周間的作品。

3 堯典、臯陶謨、禹貢——決是戰國至秦漢間的偽作，與那時諸子學說有相連的關係。

這些見解在今日看來，當然很欠精密。關於堯典，顧頡剛後來編有尚書研究講義，從制度上疆域上文辭上證明今本堯典為漢人所作，童書業先生的評顧著尚書研究講義第一册（浙江圖書館館刊三卷六期）又補充了許多見解。關於禹貢，顧頡剛提出了著作在戰國時代的見解，以後丁文江

先生翁文灝先生都曾表示贊同，（丁說見答顧頡剛論禹治水不可信書，翁說見師大地理月刊演講錄，）郭沫若先生在金文叢考中也主張此說，後來馬培棠先生著梁惠王與禹貢（禹貢半月刊二卷五期、）大梁學術（同上二卷六期、）禹貢與禹都（同上二卷八期、）禹貢與紀年（同上二卷十期，）又斷爲梁惠王後元十六年所作，這也還有商榷的餘地。關於洪範，劉節先生曾作洪範疏證（見東方雜誌二十五卷二期及古史辨第五册，）從用字上音韻上證明這是戰國末期作品，童書業先生在五行說起源的討論一文（古史辨第五册中，）曾根據古史傳說的演變來證明洪範決非戰國末期作品，認爲作在戰國的初期。張西堂先生在尙書研究講義（廣東省立勷勤大學講稿）中也支持童先生的主張，認爲今本洪範訓王的「皇」字，在史記、尙書大傳本作「王，」不足證明洪範的晚出。關於高宗肜日，郭沫若先生的先秦天道觀之進展，根據天字與帝字的用法以及民本的觀念，也認爲不足信。關於柴誓，余永梁先生曾有柴誓的時代考（已收古史辨第二册，）以爲是春秋時信公所作。關於呂刑，郭沫若先生在金文叢考中曾因金文中無天地對立的觀念，而懷疑呂刑的著作年代，但證據還不夠堅強。此外各篇近人雖也常討論到它的著作年代，但都沒人作專門的研究發表。我們希望各篇商周書都能考定它的時代，因爲這於古史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除了尙書以外，比較地爲中外學者所深切注意的，便是左傳和國語的著作時代問題，因爲這個問題已爲晚淸今文家所提出而沒有解決的。國外學者對於這問題有研究的要算高本漢了，他著有左傳眞僞考，從文法上證明左傳非魯人作，而左傳與國語確爲用同一方言人所作，但決非一

人之作品。此外卜德著有左傳與國語一文，由二書的引詩多寡上及用「帝」與「上帝」的多寡上，證明二書原非一物。國內學者對此問題作考論的很多，馮沅君、童書業、孫海波、楊向奎諸先生對此問題都曾作比較研究，馮先生的左傳與國語的異點一文（附馮譯左傳眞僞考後）比較二書共說一事而文不同的凡十五則，並從「於」「于」與「與」「及」等字的用法上證明二書全不相干。孫先生的國語眞僞考（燕京學報第十六期）也認二書記一事而事實多不同，又以爲司馬遷曾據左傳而未引國語，國語在當時尚未成書。童先生的國語與左傳問題後案（浙江圖書館館刊四卷一期）承認左傳並非春秋的傳，又把史記、周本紀所載國語之語與國語對照，知道鄭語等篇在史記前已成立，又從記事上文法上文體上古史傳說上證明左傳、國語非一書分化，而國語中的齊語、吳語、越語等篇是晚出的。楊先生的論左傳之性質及其與國語之關係（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第二期）又反駁晚清今文家的主張，認爲左傳確是春秋的傳，而國語與左傳非一書的割裂。關於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得到定論，總之，左傳和國語二書決非春秋時代的作品，是可以無疑的了。

關於三禮的著作年代，還急待我們去作深切的研究。比較上有成績的，有錢穆先生的周官著作時代考，他從祀典、刑法、田制各方面證明周禮是戰國時代晉地的著作。還有郭沫若先生的周官質疑（見金文叢考），從金文中的官名來考驗周禮，同樣地證明周禮是戰國時代的作品，而且還認爲『荀卿子弟子所爲，襲其師「爵名從周」之意。』禮記方面，有童書業先生的二戴禮記輯於

東漢考（浙江圖書館館刊四卷二期）和洪業先生的禮記引得序，都考定今本禮記輯成於東漢時代；關於專篇的考證，有楊寬先生的月令考（齊魯學報第二期）認爲月令是晉太史之學，經春秋戰國時代陸續補訂而成的。在這方面我們希望有人出來作更進步的研究，因爲這些問題還不能算完全解決，沒有討論到的問題還多着呢。

關於諸子的著作年代，近人考辨得很是熱烈，因已收入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留待後詳說。

此外日人研究中國古籍的也很多，比較有價值的論文也不少，江俠庵先生選譯的先秦經籍考（商務出版）雖不夠完善，也足供我們的參考。

第三節　古代民族史的研究

最近古史上的研究，以民族史方面的探討爲最有成績。我國的古史傳說本來非常紊亂，這方面的研究確實給我們在長夜漫漫中找到了一線曙光，使我們在紊如亂絲的古史傳說中摸到了真實的邊際。

古代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所以到今天會有這樣的成績，我們不能不歸功於劉師培和王國維兩先生。劉先生曾在古代姓氏的傳說上，先研究出古代民族史的一個面目來，他在偃姓即嬴姓說（見左盦集）中曾證明熊盈偃嬴依爲一姓的分化，這是很寶貴的見解。王國維先生用他的二重論證法研究甲骨文和文獻的結果，又主張殷以前的帝王宅京皆在東方，只有周獨崛起於西土。接

眷徐中舒先生便作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一文（清華大學國學論叢，）以爲「由載籍及古文字說明殷周非同種民族，約有四證：一曰，由周人稱殷爲夷證之，……二曰，由周人稱殷爲戎證之，……三曰，由殷周城內之地稱夷者證之，……四曰，由箕子遜於朝鮮證之。……綜此四證觀之，周人之視殷人爲東方異族明矣……」這個結論對於古代民族史的研究確是個重大的啓發。等到傅斯年先生作夷夏東西說（刊慶祝蔡元培六十五歲紀念論文集）更鋪張古代民族有東西二系之說，不僅以爲周興於西土，連夏也是興於西土的；只有殷是興於東方，從祖先神話證明殷與東北民族同出一源。至於虞夏商周的朝代系統只是周人的觀念，東方人卻另有其朝代觀念。傅文一出，給予古史學界的影響更大，從此古代民族有東西二系的說法幾乎成爲定論了。其後傅先生又作姜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姜亮夫先生作夏殷民族考（民族雜誌一卷十一、十二期二卷一期二期，）胡厚宣先生作楚民族起於東方考（北京大學潛社史學論叢一期，）都爲此說增加了證據不少。胡先生從卜辭金文以及傳說中的地理和文化禮制來證明楚民族本和殷商同族，本在黃河流域，在殷周之際給周人所逐而南遷的，這些說法都很有見地。最近楊寬先生作中國上古史導論（古史辨第七册）集合諸說，主張：殷、淮夷、徐戎、楚、郯、秦、趙等爲東系民族，周、羌、戎、蜀等爲西系民族，所謂華夏民族，即此二系民族的混合體，一切古史傳說亦皆由此二系民族之祖先傳說交混錯綜而成，他較劉師培先生更進一步，不僅認熊、盈、偃、嬴、依爲一姓之分化，又認殷也即是盈，又即是依（殷古或作郼，讀如衣）更認爲姬姓和姒姓也是一姓的分化，戎

和蜀又是一聲之轉，古代只有這東西二系的民族。楊先生又主張歷史上並無夏國的存在，以為夏代的古史傳說無非是周人依託宣傳而成，著有說夏、說夏補二文，並見中國上古史導論中。童書業先生又著鳥夷一文載楊先生伯益考（齊魯學報第一期）後，補證傅楊諸先生殷為東夷之論，並著姬姜與氐羌一文（未刊）主張姬姜二姓由氐羌來。東西二系民族之論，至今日差不多已漸臻家喻戶曉的地步了。（承認有夏代而又主張夏族起於東方的，有楊向奎先生所作夏民族起於東方考一文，載禹貢半月刊古代地理專考。）

關於古代其他民族的研究，近人也著有論文很多，如王國維先生作鬼方獯鬻玁狁昆夷考（見觀堂集林，）考證薰育、鬼方、昆夷、玁狁、狄、匈奴等皆為一族，其說頗為精確。此外錢穆先生著有西周戎禍考等文，蒙文通先生著有赤狄白狄東侵考、犬戎東侵考、秦為戎族考等文，均載禹貢半月刊中。顧頡剛亦著有九州之戎與戎禹一文，載禹貢半月刊古代地理專考。

關於中國民族由來的討論，自清末以來，討論也很熱烈，雖然這問題到現在還無定說。大家如要知道他們辨論的內容，可參看繆鳳林先生的中國民族西來辨（學衡第三七期）、中國民族由來論（史學雜誌二卷二期及三、四合期。）這兩篇論文中已把中國民族由來的各說大略都引徵和評論到了。

古史辨以外，關於古史研究的專著，近年頗有新作，如呂思勉先生的先秦史（開明書店出版），童書業先生的春秋史，楊寬先生的戰國史（均未刊）都有很新的發現。蒙文通先生的古史甄微

（商務出版）也是一部極有見解的作品，他從地域上分剖古史傳說一部份的眞相。對蒙先生著作提出反證明的，則有張崟先生的古史甄徵質疑（史學雜誌二卷三、四合期）一文。

第四節　「古史辨」與古史傳說的研究

自從頡剛在努力周報的讀書雜誌上發表了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曾引起了師友們熱烈的討論，因爲頡剛提出了堯舜禹等古史傳說中的帝王有神性的問題，史學界便開始注意到古史傳說的研究。頡剛由於師友的督促，毅然編著了古史辨第一册，於民國十五年出版。在這一册裏，許多論證，在今日看來是不夠堅強的，但主要的見解，到今日，頡剛還很堅持着。

頡剛所編著的古史辨第二册，可以說是承繼第一册的研究的，上編討論的是古史問題，中編討論的是孔子和儒家的問題，下編是關於第一册的評論，在民國十九年出版。其中頡剛所作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主張三代國境只在黃河流域，周是氐羌中的一種，到今日已無可疑，劉復先生的帝與天，魏建功先生的讀帝與天，認帝之原義爲上帝，這個說法確是開啓古史傳說的一個鑰匙。

古史辨的第三册是討論易經和詩經的，第四册和第六册是討論諸子的，這留待下節來論述。現在所說到的便是頡剛所編著的古史辨第五册。這册上編談的是漢代經學上的今古文問題，下編論的是陰陽五行說起源問題及其與古帝王系統關係問題。這册古史辨雖然也研究到古史傳

說，可是主要的卻在替漢代經今古文問題重新加以估定。自從晚清今文家提出了「新學僞經」的說法以後，許多古書像左傳周禮甚至於史記漢書都有了劉歆作僞和竄入的嫌疑，同時許多古史傳說像月令一系的五帝說左傳郯子所述的古史傳說，羿浞代夏以及少康中興的故事，都有劉歆等人僞造的嫌疑。

顧頡剛認爲古史的傳說固然大半出於自然的演變，卻着實有許多是出於後人有意的僞造。新莽爲了要奪地位，恰巧那時五行的學說盛行，便利用這學說來證明新的代漢合於五行的推移，以此表明這次的篡奪是天意。劉歆所作的世經分明是媚莽助篡的東西，而世經裏排列的古帝王的五德系統，也分明是出於創造和依託的，這其間當然會造出許多僞史來了。對這問題，顧頡剛曾著了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來加以重新估定。錢玄同先生所著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標點本新學僞經考序）可以代表錢先生對於經今古文問題的見解，對於晚清今文學家的主張徹底反對的有錢穆先生，他著有劉向歆父子年譜，也已收入了這冊古史辨。在這冊中，又因討論今古文的問題而連帶地討論到陰陽五行的起源，因此又收入了梁啓超先生的陰陽五行說之來歷和劉節先生的洪範疏證等篇。

自從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上提出了古史傳說的見解以來，這十多年中關於古史傳說的研究確實有了相當的成績，紊如亂絲的古史傳說，到今日確已研究出一個線索來了，這不能不算是當今史學界上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因此在民國三十年便有古史辨第七冊的結集，古史辨第七冊，

是呂思勉、童書業二先生合編的。這册書分爲上中下三編，上編是古史傳說統論，收了顧頡剛所著的戰國秦漢人的造僞與辨僞和楊寬先生的中國上古史導論；中編是三皇五帝考，以顧頡剛與楊向奎先生合作的三皇考和呂思勉、蒙文通、繆鳳林諸位先生關於三皇五帝討論的論文爲中心；下編爲唐虞夏史考，以顧頡剛與童書業先生合作的幾篇論文和呂思勉、陳夢家、吳其昌諸位先生的論文爲中心。這確是近十餘年來古史傳說批判的一個大結集。

在古史辨第七册中，最應注意的，是一支生力軍的加入，那便是楊寬先生的中國上古史導論的發表。他一方面贊成我們的古史神話演變說，一面又反對自康有爲以來的「託古改制」說和「新學僞經」說。他認爲古史傳說多是古代東西二系民族原有神話的演變和融化，它的演變多是自然的演化，而很少是人爲的改造。他竭力主張神話傳說分化說，認爲一個神話會分化演變成幾個神話，這便是古史內容日趨複雜的主要原因。童書業先生曾說：「所謂累層地造成的古史觀，乃是一種逐漸造僞的古史觀，我們知道古史傳說固然一大部份不可信，但是有意造作古史的人究竟不多，那末古史傳說怎樣會「累層」起來的呢？我以爲這得用分化演變說去補充它。因爲古史傳說愈分化愈多，愈演變愈繁，這繁的多的那裏去安插呢？於是就「累層」起來了。所以有了分化說，累層地造成的古史觀的眞實性便越發顯著；分化說是累層說的因，累層說則是分化說的果（古史辨第七册自序二。）童先生對於楊先生貢獻的介紹和批評是相當正確的，楊先生把古史傳說大部份還原成爲古代東西二系民族的神話，每一個古史傳說中的人物也都指出了他在神

話中的原形雖然有許多地方還有待於修正，大部份的體系可算是確立了。

拙作戰國秦漢人的造僞與辨僞只是一篇通論式的文章，可以代表個人近年來的見解。我覺得過去造僞的人往往兼任着辨僞的工作，辨僞的人也往往兼任着造僞的工作。例如儒家感覺古代神話的不可信，用人事去解釋它，這一方面是辨僞，一方面就是造僞。劉歆王肅一輩人的僞造古書古史，也是因爲當時流傳的古書古史不盡可信，所以想用自己認爲可信的「古書」「古史」去辨正它。這一方面是造僞，一方面也便是辨僞。這個見解，我現在還認爲是正確的！

至於第七册古史辨的中下編，從三皇一直討論到夏桀，都是近年來國內古史傳說研究者的成績，雖不十分完全，但也可以鳥瞰一斑了。三皇的問題經過這樣的探討，大部份可說是解決了。三皇傳說出於「太一生兩儀」哲理的神話化，同時泰皇的傳說又出於黃帝（即上帝）等神話的演化，也已成定論。五帝的傳說雖然還需要作進一步的綜合研究，可是五帝的前身都是神話中的上帝，也已可斷定。昔年頡剛認爲五帝傳說起於五色天帝的神話，到現在還堅持着這個主張。夏史傳說也很多出於神話的演化，昔年頡剛認禹爲社神的見解，現在已有童書業楊寬諸先生提供了不少堅強的證據。關於古史中的朝代傳說，童書業先生的帝堯陶唐氏名號溯源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篇文章。

這裏附帶地要說的，就是近年來因爲古史傳說的研究，引起了學者們對於古代宗教和神話的研究。在古代宗教和神話研究中，楊寬童書業兩先生和頡剛大都着眼於古史傳說的探索上，而

專門對古代宗教和神話作研究的，以郭沫若聞一多陳夢家諸先生的貢獻爲最大。

郭沫若先生的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一書和釋祖妣（見甲骨文字研究）等文，對於我國古代的宗教和宗教思想曾有很新穎的見解。郭先生認爲「祖」即是「高禖」「高唐」又即「郊社。」聞一多先生的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並補記（淸華學報十卷四期），更進一步認爲古代各民族的高禖即是各族的先妣，楚的先妣高唐與其祖先高陽實是一人，自母系社會轉變爲父系社會，先妣也就由女性變爲男性了。接着孫作雲先生作九歌山鬼考（淸華學報十一卷四期）更認爲九歌中的「山鬼」便是高唐傳說中的「巫山神女。」陳夢家先生關於這方面的研究，發表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燕京學報十九期），商代的神話與巫術（燕京學報二十期），祖廟與神主之起源（燕京大學文學年報三期）高禖郊社祖廟通考（淸華學報十二卷三期）對於商周的宗教和神話很多新的發見。

更有值得一提的，是蔣大沂先生的與楊寬正書，（亦載古史辨第七冊中，）他根據了楊先生研究古史傳說的結果，提供了研究古代神話的一個很可寶貴的見解，他認爲我國古代神話也有光明與黑暗兩境界，有關崑崙的傳說原是天堂的神話，有關幽都的傳說原是地獄的神話，而黃帝伐蚩尤以及堯舜伐共工和誅鯀等故事，就是光明和黑暗之爭的象徵，我們希望在這方面能有更精深的研究，那麼古史傳說的初相就更可以明瞭了。

第五節　「古史辨」與古書的研究

古書的研究其實就是古史的研究，因爲古書是古史的史料，研究史料就是建築研究歷史的基礎。所以有人說「古史辨」變成了「古書辨」是一種怯退的表示，這句話是不對的！

古史辨的第三册是專門研究易經和詩經的，上編易經部分，收了十五篇論文，除顧頡剛自著的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論易繫辭傳中觀象制器的故事，論易經的比較研究及彖傳與象傳的關係書二文外，比較重要的論文有胡適先生的論觀象制器的學說書，錢穆先生的論十翼非孔子作，李鏡池先生的易傳探源，余永梁先生的易卦爻辭的時代及其作者，容肇祖先生的占卜的源流等文。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在積極方面，研究了王亥喪牛羊於有易、高宗伐鬼方、帝乙歸妹等故事，在消極方面說明了卦爻辭中沒有堯舜禪讓和聖道的湯武革命等故事，所得到的結論是：作卦爻辭時流行的幾件大故事是後來消失了的，作易傳時流行的幾件大故事是作卦爻辭時所想不到的；從這些故事的有與沒有上，可以約略地推定卦爻辭的著作時代當在西周的初葉。論易繫辭傳中觀象制器的故事，主要在說明這故事是出於漢人京房一派所僞託的。論易經的比較研究及彖傳與象傳的關係書是請李鏡池先生對於周易本文作比較的研究，同時說到彖傳和象傳的關係，我覺得象傳的爻的部分原與彖傳相合，象傳的卦的部分則是後出的。

胡適先生的論觀象制器的學說書，認爲觀象制器之說本來不是歷史，易繫辭傳此章雖有稍後出的可能，但象傳各條皆有觀象制作之意，當是同一學說，他反對我的觀象制器之說作於京房一流人的意見。錢穆李鏡池二先生的論易傳文章都從思想及其他方面說明易傳非孔子作。李先

生更認爲彖傳與象傳的著作年代當在秦漢間；繫辭與文言的著作年代當在史遷之後，昭宣之前；說卦、序卦、雜卦的著作年代在昭宣後。余永梁先生的易卦爻辭的時代及其作者，也主張卦爻辭爲周初作品。容肇祖先生的占卜的源流把占卜的起源和流變考證得清清楚楚，讀了此文，更能明白易經在占卜史上的地位了。此外如錢玄同先生的讀漢石經周易殘字而論及今文易的篇數問題和李鏡池先生的左國中易筮之研究周易筮辭考等文，也都解決了易經上的許多問題。這裏連帶地要提到的，便是郭沫若先生對於易經的見解。郭先生在金文叢考的金文所無考裏因爲「乾」「坤」二字爲金文所無，天地對立的觀念亦爲金文所無，認爲經部的著作在春秋以後。郭先生另有周易之制作時代一文（見靑銅時代）認爲經部作於戰國初年的楚人馯臂子弓，而傳的大部份是秦時荀子的門徒楚國人所著。

第三册下編詩經部分收了五十九篇長長短短的文章，頡剛自著的有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瞎子斷扁的一例——靜女，論詩經所錄全爲樂歌等文，對於春秋戰國時代人的用詩，孔孟二子對於詩的態度和詩經所錄是否全爲樂歌等較大的問題曾有所考證，對於詩經中的各篇如靜女、野有死麕、褰裳、碩人各篇也曾有所解釋。同時胡適俞平伯劉大白魏建功董作賓諸位先生對我的見解都有所補訂討論。此外鄭振鐸先生的讀毛詩序對於詩序痛加抨擊，是批評詩序的最有力的一篇文章。陳槃先生的周召二南與文王之化，說明二南與文王毫無關係，大多數只是東周時代江漢民族的作品。俞平伯先生的葺芷繚衡室讀詩札記，對於周南、卷耳、召南、行露、小星、野有死麕、邶

風、柏舟、谷風等篇都有新見解發表。胡適先生的詩三百篇「言」字解，是以科學方法研究詩經文法的第一聲。他的談談詩經也有許多新穎的見解。其他關於「起興」「六義」等問題也有鍾敬文、朱自淸何定生諸位先生的討論。總之對於詩經的研究可說是相當的熱鬧了。

古史辨第四册和第六册都是專門討論諸子問題的，編輯者是羅根澤先生。第四册內容也分上下兩編，上編爲儒墨兩家，下編爲道法兩家；第六册仍分上下兩編，考證偏及先秦各學派，範圍更擴大了。

這兩册古史辨中所收的論文極多，不勝一一介紹。較重要的有胡適先生的諸子不出於王官論，詳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梁啓超先生的論老子書作於戰國之末，錢穆先生的荀卿考，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再論老子成書年代，馮友蘭先生的大學爲荀學說，中庸的年代問題，老子年代問題，張壽林先生的老子道德經出於儒後考，張季同先生的關於老子年代的一假定，孫次舟先生的跋古史辨第四册並論老子之有無，譚戒甫先生的二老研究，唐蘭先生的老子時代新考，郭沫若先生的老聃關尹環淵，唐鉞鄭賓于二先生的論楊朱，門啓明先生的楊朱篇和楊子之比較研究，容肇祖先生的韓非的著作考，王正己先生的孝經今考，蔡汝堃先生的今文孝經成書年代考；更有羅先生自著的戰國前無私家著作說，荀卿遊歷考，由墨子引經推測儒墨兩家與經書之關係，老子及老子書的問題，晚周諸子反古考，商君書探源，再論老子及老子書的問題等篇；顧頡剛所著的，亦有從呂氏春秋推測老子之成書年代一文。

胡先生的諸子不出於王官論，是近今研究諸子學轉變風氣的第一篇重要文章。過去的學者都承認劉歆班固等的說法，認爲諸子之學都是王官之學之餘裔。胡先生否認此說，謂諸子之學皆春秋戰國之時勢世變所產生。此說一出，諸子之學之眞價值和眞地位乃完全顯著。此後錢穆馮友蘭羅根澤諸位先生都受此說的影響（不過馮先生雖否認諸子皆出王官的舊說，但他另有其諸子之學的源起說，謂諸子學與王官之學也有相當的關係，其說後出而很近情）。羅先生的戰國前無私家著作說，晚周諸子反古考等文，都是繼承胡先生的說法而作更進一步的探討的。

這兩册古史辨所討論的，無非是諸子的「人」和「書」的問題。最可注意的，是老子及老子書的年代問題。其間可分爲三派：第一派是主張老子及老子書晚出的，代表的論文很多。最早提出此問題的爲梁啓超先生，其後如錢穆、馮友蘭、張壽林、張季同、與羅先生及顧頡剛本人都竭力主張此說，雖然各人的主張也不盡同，但大致都認老子和老子書晚出，不能代表春秋末年的思想。還有孫次舟先生，他不但懷疑老子書，並認老子並無其人。第二派是維持老子和老子書年代的舊說的，胡適先生爲其中主張最力的一人，他認爲主張老子和老子書晚出的人所持的證據和所用的方法都很危險；他和錢穆馮友蘭二先生曾有所辨論。此外如張煦馬敍倫諸先生都是這一派的代表。第三派是折衷派，例如唐蘭先生主張老聃與孔子同時，老子爲老聃遺言，但與墨子孟子同時成書；郭沫若先生又說老子確係孔子之師，老聃老子書確爲老聃之語錄，集成此語錄者爲環淵，即是關尹。總之關於老子問題，現在還在討論之中，最後結論還不能馬上得到，但老子和老子書的舊說之必

應修正則是無問題的。

其次爲近人爭辨得熱鬧的，是墨子的姓氏問題。自從清末江瑔提出墨子之「墨」非姓的見解後，受他影響的人也很多。較近情的，是錢穆先生墨本刑徒之稱非墨子之姓說。關於這個說法，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中也採取了。但我們覺得這個說法雖有相當的價值（揭露了墨學一部分的眞相，）但不無可疑，因爲從墨子書中看，其接受傳統的貴族學說處很多，墨子本人也有相當的貴族色彩，舊說墨子爲宋大夫，而宋人的愚笨素爲先秦諸子所稱道，墨學的有宗教色彩以及兼愛非攻等種種難於實現的理想都是宋人思想的表現。童書業先生發現宋公子目夷之「目夷」古書或作「墨台」，而墨子爲墨台氏之後又明見於古籍，再從墨子與宋國關係之深一點觀察，墨子很有爲公子目夷之後的可能，因此童先生就與顧頡剛合著了一篇墨子姓氏辨（載北平研究院史學集刊第二期，）除提出墨子爲公子目夷之後的見解外，又駁評了江錢二先生的說法。近來頗有人贊同我們的見解，但這個問題的論定仍須俟諸異日。